

学术研究

XUESHU YANJIU



1

一九七八年



3 0478 5760 6

目 录

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传播和发展作出贡献

——在广东省社联第一届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陈越平(3)

略论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孙 孺(7)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是新时期治国的迫切任务.....王 珉(15)

马列主义两条战线斗争的科学理论不容篡改.....胡汉平(20)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

——评“四人帮”的超级“革命”.....黎克明 董伍伦(28)

“四人帮”实用主义的剖析.....齐 云(35)

评为篡党夺权服务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核心

.....卓 炯(42)

驳“四人帮”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二重性”的谬论

.....黄 震 周 树(47)

奖金制度与按劳分配.....施 烈(52)

就黄埔港的实践斥“四人帮”对计件工资制的攻击.....曾牧野(56)

驳梁效对贾谊“集权”思想的歪曲.....罗东升(60)

“四人帮”破坏教学工作的一根大棒陈 飘 (67)

“四人帮”的反“写真实”论和阴谋文艺

——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楼 栖 (71)

评某教授大搞影射史学的实质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邝 实 (75)

古为帮用的丑恶表演陈周棠 谭 超 (82)

评广东某教授的实用主义史学蒋相泽 (86)



招牌的效用廉 钙 (90)

忠肝涂地牧 惠 (91)

剥画皮原 璞 (93)

形象思维续谈李泽厚 (94)

形象思维是文艺创作的规律和方法饶芃子 (103)

再说比兴王季思 (103)

论林则徐的历史地位陈胜彝 (112)

《柳如是别传》缘起陈寅恪 遗稿 (123)

西瓯族源初探梁钊韬 (129)

谈西汉软体尸保存问题

——从马王堆到凤凰山商承祚 (136)

动态: 广东社联恢复活动 (46) 广东哲学界揭批“四人帮”的假左真右 (70) 广东省
史学工作者进一步批判某教授 (92) 关于中国近代史问题的讨论 (111) 广东
图书馆学会狠批“黑线专政论” (66) 《杜国庠文集》重印 (106)

致读者编者 (140)

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 传播和发展作出贡献

——在广东省社联第一届第二次全体
委员(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陈 越 平

广东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是在广东省委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在六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成立的。社联成立以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团结、组织我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学习、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中心，贯彻社会科学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学术思想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我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运动，促进了我省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但在“四人帮”法西斯专制主义大棒的摧残和打击下，我们社联和各个学会停止活动达十一年。今天，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抓纲治国，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大好形势下，我们社联和各个学会的活动又恢复起来了，活跃起来了。一届二次社联委员（扩大）会议，就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这次会议，是我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实现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发出的号召，为“大力开展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创造性的学术研究，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潮”而努力奋斗的一个新起点。

—

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中心。抓住这个斗争，就是抓住了纲。……不但要从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加以清算，而且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彻底肃清‘四人帮’在各方面的流毒和影响。”这是摆在我们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多年来，“四人帮”在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理论搞乱，把思想搞乱，把学风搞乱。特别是全面篡改了毛主席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流毒尤为严重。他们颠倒社会主义时期革命与反革命、革命动力与革命对象的关系，炮制所谓“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新变动”论，“党内存在一个资产阶级”论以及所谓“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等等，都是为他们推行“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阴谋篡党夺权服务的。他们篡改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革命与生产的辩证关系，否定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挥舞“唯生产力论”的大棒，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破坏四个现代化，妄图搞垮整个国民经济，为害极大，流毒很深。他们篡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大搞历史唯心主义的影射史学，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四人帮”在广东的资产阶级帮派势力，也到处抛售和宣扬“四人帮”的这一套，他们按照张春桥的“理论”，捏造了一个所谓“主要矛盾变动”论，胡说什么“造反派与老干部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反对党内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问题”，“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正确”等等。他们还恶毒地把社会主义的光明的中国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划等号，胡诌一套所谓“党内特权阶层”论、“权力资本”论，等等。我省社会科学界中也有人胡说什么“现代的孔子死而不已”，“孔老二不肯改悔，现代的孔老二也不肯改悔”，等等，丧心病狂地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和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摇旗呐喊，大效犬马之劳。“四人帮”的反动世界观，是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他们随心所欲，大搞实用主义，严重地侵蚀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历史学、教育学、文学等各个学科领域推行一整套极端反动的思想体系，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我们一定要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以及在今后较长的时间内，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特别是坚持毛主席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从理论上深入批判“四人帮”篡改、歪曲、阉割毛泽东思想，妄图砍倒毛主席伟大旗帜的罪行，粉碎他们的反动思想体系，把他们颠倒了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纠正过来，肃清其流毒和影响，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牢固地占领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阵地。最近，各个学会都先后开展了对“四人帮”的批判，这是个很好的开端。我们社联和各个学会，就是要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恢复，在斗争中整顿，在斗争中前进。

“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帮，是假左派真右派。他们挖空心思把自己装扮得比马克思主义更“左”、更“革命”，借以掩盖其右得不能再右的反革命实质。这种假左伪装，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我们要在揭露他们假左派真右派的反动面目的斗争中，进一步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还要看到，在“四人帮”的毒害和影响下，这一套精神枷锁长期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得死死的，不敢独立思考，不敢敞开思想，不能广开言路。张春桥所炮制的“凡事左三分”这一套，在不少的人们头脑中形成了一个无形的

框框，叫做“‘左’比右好”，流毒甚广，影响极坏。它破坏了我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束缚了我们理论工作者的头脑，传播了一种极坏的学风、文风，障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和发展。我们在理论战线上同样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粉碎“四人帮”从“左”、右两个方面向马克思主义的进攻。

揭批“四人帮”是一场亿万群众参加的伟大斗争。它不但涤荡着“四人帮”的污泥浊水，而且将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更加普及和发展。我们要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更好地更多地学习马列主义，准确地完整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大大提高我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开展创造性的学术研究工作，繁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事业。

二

在理论工作方面，当前最迫切需要的是，遵照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完整地而不是零碎地、准确地而不是随意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基本原理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运动，同时，大力开展各个学科领域的创造性的研究。这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共同任务，是我们社联和各个学会的共同任务。

要开展创造性的学术研究，一定要坚持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总结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深刻分析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的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的“双百”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过去，省社联和各个学会，在贯彻“双百”方针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广东的学术活动总的说来是搞得比较活跃的。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他们根本篡改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思想，推行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和禁錮政策，“双百”方针长期没有得到贯彻。张春桥就曾露骨地叫嚣：“百家争鸣还是一家做主。”他们所谓的“一家做主”，就是资产阶级一家做主，“四人帮”一帮做主，主宰舆论。在他们控制下的舆论阵地，大肆放纵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极力扼杀社会主义的香花。“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梁效、罗思鼎之流说的话，就是真理，根本不容怀疑和讨论。扣帽子、打棍子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在“四人帮”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专制主义和禁錮政策压抑下，不要说百家争鸣的方针得不到贯彻，就是老老实实搞点社会科学研究，也会招来一大堆帽子和一连串棍子，什么“只专不红”、“白专道路”、“给走资派涂脂抹粉”等等，大大压抑了广大知识分子、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发展。在他们的严重干扰破坏下，与省社联所属各个学会停止活动的同时，作为我省学术界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争鸣园地的《学术研究》杂志，也停刊了十一年。

打倒“四人帮”，社会科学工作得解放。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十分重视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工作，十分重视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非常关怀广大知识分子和学术工作者，一再强调要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双百”方针。我们必须充分认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发展的规律，是党的群众路线在科学文化工作方面的运用和发展，是一个有利于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针，是调动科学文化工作者积极性的好方法，也是一种发展科学文化的好方法。它的精神是要在坚持毛主席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的前提下，在人民内部采取放的方针，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今后，在我们社联和各个学会的学术活动中，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深入批判“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和禁锢政策，坚持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项政治标准，坚持“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只有这样，才能在比较和斗争中锻炼人们识别香花和毒草的能力，发展正确的东西，克服错误的东西；才能使学术上各种观点和学派，在互相讨论、互相促进中得到发展；才能出人才，出成果。我们一定要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在省委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积极开展创造性的学术研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传播和发展作出贡献。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已初见成效。随着经济建设新高潮的到来，一定会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新高潮。我们社会科学界的同志，一定要认清形势，明确任务，不要辜负华主席、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在新的征途上，鼓足干劲，扎扎实实地为加速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多作贡献。今年，是抓纲治国的重要的一年，我们社联和各个学会恢复活动后，首先要组织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方面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从理论上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打好第三战役；并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整顿、锻炼、壮大、提高我们的理论队伍。这是今年工作的中心。其次是要组织社会科学工作者有计划地、系统地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各个方面阐明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当前，尤其要着重学习、研究和宣传毛主席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与此同时，社联和各个学会要积极开展各种学术活动，进行学术讨论和交流，以活跃我省学术空气。再次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实行专业理论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和工农兵业余理论队伍的密切结合，互相学习，交流经验，逐步建设一支宏大的又红又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此外，还要协助有关方面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到人和著作），以进一步调动广大学术工作者的积极性，为加速发展社会科学事业贡献一切力量。

一九七八年一月四日

略论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孙 孺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全党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就是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且指出：“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归根到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要不要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经济有没有可能高速度发展？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曾经同“四人帮”进行了尖锐而激烈的斗争。他们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有高速度，社会主义只能低速度。所以他们叫嚷：“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你一提高速度，那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就是“还在走的走资派”。他们把实现四个现代化诬蔑为“资本主义化”，嚎叫：“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对于“四人帮”这些诬蔑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舆论和所作所为，必须彻底揭露，严加批判，肃清其影响和流毒。

—

要不要高速度发展我国国民经济？

社会主义建设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华主席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革命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迅速发展生产力，实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而消灭阶级、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这就深刻地说明了，无论从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或是共产党人的根本任务来说，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不仅是重大的经济任务，而且是十分迫

切的政治任务。

从国内来说，我们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毛主席指出：“‘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的时候，标志工业生产发展水平的主要工业产品钢的产量，只有十六万吨左右；以当时五亿五千万人口来计算，每人平均只有六两。农业中主要的粮食产量，只有二千一百多亿斤，平均每人只有四百斤不到。这就说明，当时我国工农业生产发展水平是很低的，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是比较低的。建国二十八年来，虽然我国的工农业生产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但是与世界上工业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比较，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近年来，“四人帮”为了梦想实现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残酷地迫害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疯狂地破坏我国国民经济，摧残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华主席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一千亿元，钢产量二千八百万吨，财政收入四百亿元”。这就导致我国国民经济这几年来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倒退的局面，特别严重的是造成劳动生产率不仅没有提高甚至下降，与世界先进水平比较，远远落在后面。以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来说，我们要几亿人口搞饭吃，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年产粮食不过二千斤左右，就是说，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只能养活三个人。而美国农业劳动力平均年产粮食达十多万斤，可以养活五十多个人。由于劳动生产率低，以至我国的农业生产水平相当低，粮食按人口平均的产量只有六百多斤，只等于缅甸的水平，和美国、加拿大等国比较，差距很大。从工业劳动生产率来看，每个钢铁工人的平均年产量，在一九七〇年，美国为238吨，日本为326吨。我国钢铁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几十分之一。这些状况都说明，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努力提高工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是亿万群众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

从最后战胜资本主义的需要来说，也要求我们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把提高劳动生产率看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他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②并且认为“不这样就不可能最终地过渡到共产主义”。^③只有这样做，才能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才能增强社会主义的物质力量，最后战胜资本主义，并逐步创造物质条件，缩小三大差别，向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前进。

从国际形势来说，世界上还存在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它们的本质就是战争。

当前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各地到处争夺霸权，而且越来越剧烈，总有一天要打起仗来。苏美两霸是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我国和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都面临着社会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干涉和颠覆的威胁，特别是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因此，我们必须争时间，抢速度，尽可能快地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才能对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立于不败之地。正如斯大林所说：“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④毛主席也指出：“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又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⑤毛主席在这里极其深刻地阐明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四人帮”拚命反对高速度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拚命破坏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要使我们挨打，使我国重新沦为半殖民地，企图复辟资本主义。

二

能不能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有可能自觉地利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创造比旧社会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是社会主义建立起来的新的生产关系的优越性。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就指出：“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⑥建国二十八年来实践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二十八年间，我国工业生产每年平均增长13.5%，其中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长18%，第三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各为11.7%和9.1%。农业生产的增长平均每年也在5%左右。如果不是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严重破坏，我们的发展速度还要更快些。尽管这样，比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增长的速度，也仍然是快的。从一九五〇到一九七〇的二十年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只有5.5%。

为什么有这种可能呢？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首先在于解决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在小商品经济的基础上生长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原来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使之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一系列的社会行动；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为必须顺次经过许多工人的手才成为成品的共同产品。这种社会化的大生

产，造成了强大的生产力，以过去所没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起来。但是，这种社会化的大生产在它自己发展的过程中，却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占有形式发生了冲突，从而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必须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的生产关系，使之适合于生产力的社会性质，才能解放生产力，使社会生产得以持续地高速度地发展。

首先，由于社会直接占有和掌握了生产资料和产品，直接管理社会生产，就能够有计划地组织整个社会的生产、交换和分配，从而消除了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现象。这就是列宁所说的：“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整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几万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⑦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避免了对现有生产力的破坏，同时不再会有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劳动力脱节的现象，而是可以使它们密切地结合起来。

其次，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即劳动者本身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首先获得解放，他们已经不是劳动力的出卖者，而是社会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已经由雇佣奴隶变为社会的主人；他们已经不是为资本家生产，而是直接为社会生产。在产品的分配上，消除了人剥削人的现象。根据全社会成员的利益，社会总产品在作了各种必要的社会基金的扣除之后，个人消费品是按照“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进行分配。这就可以充分发挥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够最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指出：“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新社会的基本因素。”^⑧“我们的革命所以远远超过其他一切革命，归根到底是因为它通过苏维埃政权发动了那些以前对国家建设漠不关心的千百万人来积极参加这一建设。”^⑨

再次，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比资本主义制度提供更多的积累用以扩大社会再生产。积累是一切社会进步的职能。积累的源泉，是个人劳动产品超出维持自身生活的需要而形成的剩余，也即是个人的剩余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剩余产品）以剩余价值的形式落在资产阶级的手里，有一部分还被土地所有者瓜分了去，资产阶级取得的剩余价值只有一部分转化为追加的资本用以扩大再生产；一部分却被用来过骄奢淫逸的生活，大肆挥霍浪费掉，不能成为社会的生产基金。社会主义社会根本改变了这种情况，劳动者的个人剩余劳动并不落到任何私人的腰包，而是社会的公共财富。它就有可能根据社会的需要，统筹安排，尽可能多地把剩余产品用以扩大社会再生产。

这些都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为我们创造了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持续地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客观条件。

我们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我们可能比资本主义国家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并不等于说我们的生产发展水平已经超过了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斯大林曾经指出：“不能把工业发展速度和工业发展水平混为一谈”。^⑩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证明，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无产阶级不是首先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是在世界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首先突破，取得社会主义

革命的胜利。因而这些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生产发展水平一般都落后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以我国来说，必须承认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发展水平都还落后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因为如此，华主席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发出号召：“要求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到二十世纪末，我国农业主要产品的单位面积产量要达到或者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工业主要产品产量要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三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我们提供了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可能条件。毛主席指出，我国国民经济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但这决不是说，国民经济会自流地实现高速度发展。“自流”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毫无共同之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机械的唯物论者，深知可能并不等于现实，要实现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还得经过我们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付出极大的努力，从各方面进行艰巨的工作。当前，就是要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坚持党的十一大路线，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实现安定团结，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在经济工作中，还必须响应华主席的号召：“要刻苦钻研，认真实践，总结经验，进一步掌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学会领导和组织现代化生产建设的本领，提高经济管理水平，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密、越深入、越实际、越科学，推动国民经济高速度地向前发展。”“还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认真解决好一些关系到国民经济全局的问题。”

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推动国民经济高速度向前发展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灵魂是高速度。毛主席一九五六年在光辉的著作《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这篇著作中论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是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要解决好的关系到国民经济全局的问题。

毛主席首先提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就是“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⑩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是少数人、一个党所能实现的。正如列宁指出的：“只有比先前多十倍百倍的群众亲自参加国家建设、新经济生活建设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建成。”^⑪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国内来说，就是调动九亿人口的积极性，首先是广大工人和农民的积极性。这就要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解决好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把人们从各种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敢于抓革命促生产，大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调动九亿人口的积极性，就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坚决贯彻执行各项经济政策。政策是党的生命。群众说得好：“不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就是不要命！”这几年来，由于“四人帮”干扰破坏了我

们党的各项政策，大大打击了广大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因而必须拨乱反正，重申党的各项政策，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东西纠正过来。调动九亿人口的积极性，在当前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在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前提下，贯彻执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既要反对高低悬殊，又要反对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消除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干和不干一个样的不合理现象。在农村人民公社中，要实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制度和男女同工同酬。在国营企业中，职工的工资要贯彻以计时为主、计件为辅，计时加奖励的制度；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要把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结合起来，以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对于按劳分配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权利所表现出来的实际上的不平等，一方面要承认这是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一方面又用积极兴办集体福利事业的办法逐步对这种不平等的状况加以限制和改善。

总之，要关心广大群众的疾苦，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使广大工农群众的收入逐步都有所增加，才有利于调动九亿人口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持续地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有计划按比例地组织整个社会生产的可能性。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能够协调，发展的速度就会快些，反之，就会慢些。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几个经济方面的关系，是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全局性的问题，是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实现高速度必须首先解决好的关系问题。

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毛主席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关系。就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中国和外国关系”。谈这些关系，就是为了要走自己工业化的道路，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其中，特别是解决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即解决好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的关系，是体现着我们执行什么样的经济建设路线，能不能协调地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的问题。毛主席明确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⑬以后，毛主席进一步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并提出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必须以农、轻、重为序，要以发展农业为出发点，从发展农业着手，来开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马克思说过：“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⑭“社会用来生产小麦和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愈少，用来进行其他的生产——物质和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愈多。”^⑮列宁也讲过：“粮食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基础”。^⑯毛主席也指出：人是每天要吃饭的，不论办工业、办交通、办教育、搞基本建设，办任何一项事业都离不开粮食，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当忘记这个最简单的千真万确的道理。所以在考虑国民经济计划时，决不能离开这一条马克思主义

的原理。毛主席指出，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上，必须注意加重一点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多发展些农业和轻工业。这样，就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快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我们必须遵循这个指示，来实现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还必须正确认识和解决好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的关系。邓小平付主席最近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精辟地阐述了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都认为生产力中是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我们都知道，生产力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生产资料，一个是人。而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这里说的人，是指具有一定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以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生产资料也总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生产资料也就不断改变其性质和不断改革。社会的科学技术愈发展，劳动生产者掌握的生产资料愈先进，劳动生产率就愈高，社会生产力就得到愈大的发展。十八世纪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由于蒸汽机的改进，机器代替了手工业时代的生产工具，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大大向前发展，这是科学技术的一次大革命。近几十年来，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现代科学技术又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科学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以及它在生产上的应用，特别是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使工业生产的面目一新，出现了一系列新兴的工业，使劳动生产率比过去提高了几十倍几百倍，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这些都说明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在解放以后的近三十年来，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发展，这是旧中国无可比拟的。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我国的科学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还是很大，远远不能适应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如果我们不快步赶上去，迅速改变科学技术落后的状况，就不能摆脱挨打的局面。因此，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技术并应用于生产上，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保障，也是全国人民的迫切期望。

要迅速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除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自觉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发挥我国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之外，还有一个学习外国长处的问题。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不能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为此，华主席最近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也指出：“为了提高我们中华民族的科学技术水平，有必要重申毛主席提出的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

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我们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那种认为外国一切都好，中国一切都不好，我们只能落后于外国的洋奴哲学，我们要反对。同时，也要反对那种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拒绝向外国学习的思想。我们就必须善于吸收一切外国的好东西，实行“拿来主义”，把它们拿过来为我所用。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加快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8页。

②《列宁选集》第3卷，第509页。

③《列宁选集》第3卷，第748页。

④《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7页。

⑤见1978年3月7日《人民日报》。

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页。

⑦《列宁全集》第27卷，第78页。

⑧《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9页。

⑨《列宁全集》第31卷，第452页。

⑩《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40页。

⑪《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8页。

⑫《列宁全集》第28卷，第381页。

⑬《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8页。

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85页。

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第67页。

⑯《列宁全集》第30卷，第159页。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是新时期 治国的迫切任务

王 珉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五届人大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实现天下大治，必须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要广泛宣传，教育人们树立遵守社会主义法制的观念。”叶付主席在修改宪法报告中也指出：“我们要通过实施新宪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我们的国家各方面的工作更加有秩序地向前发展。”这些指示表明，党中央十分重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工作，这是完整地准确地体现毛主席关于法的思想，是根据党的十一大路线和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提出的，也是从总结同“四人帮”斗争的经验作出的。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是人民的需要，是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只有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才能进一步发展当前的大好形势，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保障我国各族人民从事革命、生产、工作、学习所必需的安定团结的良好秩序，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这个迫切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是坚决贯彻执行还是漫不经心对待，这是检验我们有没有坚强的党性、有没有对革命事业的责任感问题，也是对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态度问题。我们认为，能不能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只要各级党委真正重视革命法制工作，把它摆在主要的工作议程上，广泛地发动群众，坚决采取必要措施，并且一抓到底，就一定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护和支持，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作出应有的贡献。

社会主义法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社会主义法制体现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意志，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对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敌人是无情的铁腕，对违法犯法的人是压力和束缚，而对广大人民群众则是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是民主权利和人身自由的切实保障，也是维

护合法的经济利益的可靠保证。对敌人实行专政和对人民实行民主是辩证统一的。要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就必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强有力的专政，这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性质所决定的。

无产阶级在掌握国家政权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根据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总结斗争的成果，制定自己的法律，并运用法律这个武器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建国二十八年来，我们正是这样做的。一九五四年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诞生后，根据宪法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令、条例、章程、决议等社会主义法规。虽然还不尽完善，但对于维护革命秩序，保护人民利益，加强民族团结，保障一系列的革命运动的顺利进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我们现在说的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就是指上述这些已经制定的法律和今后还要制定的法律，如何正确地执行，按照法律办事，维护法律的尊严。人人严格遵守，同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作坚决的斗争。从整体讲，立法、执法和守法，不能有所偏废，都应全面地加强，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制的性质和作用。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法的思想体系中，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毛主席指示我们：“法律是上层建筑。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法制要遵守。按照法律办事，不等于束手束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3—359页）毛主席关于遵守革命法制的教导，是一贯的思想，我们应该完整地准确地学习领会。

社会主义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并积极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社会主义的法律必将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相应地发展，逐步地完善，而不可能一下子就制定完备的全部法典，这一点同一切剥削阶级的法律是根本不同的。我国的法律所以有力量，正是因为它是在摧毁旧的法律的斗争中产生的，是实事求是地总结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贯彻了群众路线，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清楚地认识这一特点，才能够有坚定正确的看法。我们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不就是有过一些人认识模糊，至今还心有余悸，对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缺乏应有的热情吗？他们或者对法律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或者埋怨无法可依，而期待一个早晨使法律完备起来，忘记了围绕着法律问题的斗争从来是十分尖锐的。凡是对人民有利，对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为人民拥护的，总是要遭到敌人的反对。建国以来，一切阶级敌人总是在法律问题上从“左”的或右的方面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

林彪、“四人帮”出于反革命的需要，继承托匪“打着革命的口号取消革命”的衣钵，竭力在自己脸上加涂一层“左”的油彩，喋喋不休地咒骂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是“修正主义的”，叫嚣要“突破旧框框，闯出新路子”，全盘否定我国社会主义的法，要代之以他们的法西斯专制的帮规帮法。他们倒转法制的锋芒指向党

内，指向广大革命群众，就是要为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排除障碍。

“四人帮”在“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反革命口号掩护下，公开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到处搜罗社会上的阿飞流氓，大搞打、砸、抢、抄、抓，闹得乌烟瘴气，无法无天，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惨遭迫害。他们肆意搞乱无产阶级的天下，妄图乱中夺权。“四人帮”已经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所粉碎，但是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却不能低估。至今还有帮气十足的人，袭用帮规帮法，为非作歹，欺压群众。也有思想糊涂的人，在法律面前，软弱无能，以为法律可有可无，法制没有作用了。这些，都必须引起我们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足够的注意。“四人帮”大乱天下的手段之一，就是从破坏法制入手。我们要大治天下，就要从加强法制作为起点。我们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保障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就非加强法律秩序不可。只有紧紧地掌握这把刀把子，才能同一切违法犯罪行为作坚决的斗争，也才能长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妖风。我们要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在“一批二打”的斗争中，搞得深入，斗出成绩和水平来。这是我们搞革命、搞建设、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的需要，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中心环节是依法办事

要实现天下大治，在党的领导下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是重要的一条。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中心环节，则是依法办事。

我们的宪法和法律，不是凭主观臆想出来的，而是在党的领导下，总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成果，根据客观的需要制定的。宪法和法律的制定，都是体现和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是党在各个时期的政策通过国家机关以立法形式加以条文化。遵守宪法和法律就是服从党的领导。而党对法制工作的坚强领导，又是监督国家机关特别是执法机关工作人员正确地执行法律。因此，服从党的领导同依法办事是一致的。所谓依法办事包含两层意思，就是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

我们是有法可依的。二十八年来所制定的法规，以及各条战线根据这些法规所制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章制度，都是行之有效的。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有些条文需要修改，但其中大部分还是适用的。任何法律文件在未经修改以前，只要没有明令宣布废除，就继续生效，就应坚决执行。至于个别条文需要修改的，应向最高国家机关充分说明情况，提请的案由批准后才能着手修改。在未修改以前不能各行其是，执行时仍应一本原法律文件的基本原则办理。这次五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既是新时期的治国总章程，也是今后进行其它立法的依据。华主席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逐步制定和完善各项社会主义法律”。叶付主席在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中也具体阐述这一点，指出“我们还要依据新宪法，修改和制定各种法律、法令和各方面的工作条例、规章制度”。这些表明，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对立法工作抓得很及时，中央交给我们加强社会主

义法制的任务是迫切而又艰巨的。

现在应该强调的是有法必依。有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法律，就得自觉地遵守和执行。这是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也是树立共产主义道德所需要的。通过法律的约束力，逐步克服不良习惯，树立崇高的风尚，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风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执法机关人员，不认真遵守和执行法律，就是严重的失职。执行法律，有时同党委或政权机关的决定，也可能出现不很一致的情况。我们认为，执法机关人员事先应就法律的条文和精神详尽地请示汇报，请党委考虑。经过党委、党组集体讨论作出的决定，有不一致的当然也应执行，但应允许保留自己不同的意见，根据党章的规定精神，可以把自己保留的不同的意见报告上级直至中央，任何人不得阻挠。至于党委、党组中如有个别人利用职权，玩弄特权，强制执法机关人员营私舞弊，破坏法制，就应该坚决抵制和斗争，不能徇私包庇。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法制的严肃性。

新宪法把遵守宪法和法律作为公民的义务规定下来，并赋予公民对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控告的权利。同时，还赋予人民检察院对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以是否遵守宪法和法律，行使检察权。这些条文和其它有关条文的规定，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有法必依，包含着人人守法的内容。华主席指出：“干部要守法，群众要守法，人人都要守法。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加强社会治安，同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作坚决的斗争。”人人要守法，就是人人要受法律的约束。如果守法不严，特别是干部不能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就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列宁说得很好：“极小的犯法行为，极小的破坏苏维埃秩序的行为，都是劳动者的敌人立刻可以利用的漏洞”。（《列宁全集》第29卷第510页）因此，要特别强调执法干部在遵守法律上的模范作用。执法干部如果忘记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就会在群众中丧失威信，就会给坏人大开绿灯，就不能正确地执行法律。《人民日报》揭发黑龙江省克山农场的打击报复事件，就是最有力的说明。克山农场的执法机关干部屈从于某些坏人的权势，成为压制民主、打击报复的工具，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头脑中只有特权，没有起码的法制观念。这种恶劣现象，难道仅仅是克山农场的个别现象吗？现在，新宪法充分保护公民的控告权利，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奉劝那些耍特权的帮气十足的人物，还是引以为诫为好，不要再自掘坟墓。某些庸俗的捧上压下的人，也该及早扫除邪气。

这里还应该强调一下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问题。青少年生长在红旗下，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中断了好多年法制宣传教育，许多青少年不懂得有什么法律，守法是怎么一回事，更不知道违法又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其中有些青少年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很深，放荡不羁，流氓成性，铤而走险，走向犯罪的道路。现在亟需及早挽救青少年，要大张旗鼓地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深入到学校、工厂、街道、农村，并结合一些青少年犯罪案例，讲清守法光荣，违法耻辱的道理。以宣讲新宪法为起点，使法制

观念在青少年的思想中深深扎根。这样才能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交给我们的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才能卓有成效地完成。

新宪法的实施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有力保证

五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公布了，这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史上新的里程碑。

叶付主席号召我们：“宪法通过以后，从宪法的原则精神到具体条文规定，都要保证全部实施。不论什么人，违犯宪法都是不能容许的。对于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侵犯人民权利的行为，必须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要依法制裁。”这就清楚说明，新宪法的全部实施，就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有力保证。

为了动员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来保证宪法的实施，就要结合深入揭批“四人帮”，把他们践踏、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罪行和反革命目的——戳穿，把他们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纠正。要把他们的倒行逆施、复辟资本主义、实行社会法西斯手段残害干部和群众的血腥事实作反面教材，结合我们加强法制所要达到的目的和作用，进行一次普遍的法制宣传教育，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混乱的思想得以澄清。这样，才能树立热爱法制、维护法制的思想，加强自觉遵守法制的观念。同时，还要借宪法实施的东风，推动目前在城市和农村所开展的“一批二打”运动深入发展，使一切阶级敌人感到只有老老实实去邪归正，归附国法，才是唯一的出路。只有使革命的正气压倒歪风邪气，革命人民才能扬眉吐气，更好地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

为了动员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来保证宪法的实施，在一切基层单位，更要经常表彰先进，教育后进，团结互助，蔚然成风。同时采取有力措施，恢复、健全治保组织和人民调解组织，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保持和发扬革命队伍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所有这些，就是要把保证宪法的实施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统一起来，善于结合不同单位、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真正做到家喻户晓。

应当承认，“四人帮”破坏法制，用封建主义的“有罪推定”来迫害干部和群众的恶劣影响，现在有的执法机关还严重存在着。什么“凡事左三分”呀，“办案立足于有，着眼于于是”呀，“大棒底下出材料”呀，都是为大搞逼、供、信寻找借口。这种流毒，应该引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密切注意。谁要是敢于利用干部职权进行违宪违法，破坏党同群众的密切关系，就必须严肃依法惩处。在人民群众内部，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则要把思想工作做细、做深，把教育面做宽、做持久，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

我们相信，在保证宪法的实施中，必将发扬我国革命法制传统，从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以利再战。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必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法制的威力，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革命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马列主义两条战线斗争的 科学理论不容篡改

胡 汉 平

“四人帮”是阴险狡猾的反马克思主义骗子。他们不仅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装扮自己，还特别擅长于用极“左”的一套来冒充马克思主义。为了维护他们极“左”的那一套，他们捏造了一种谬论，叫做社会主义时期反修只能反右不能反“左”，谁反“左”谁没好下场，“反极左就是反对革命”。这种谬论，在思想和理论上造成极大的混乱，必须彻底清算，才能解放思想，理直气壮地投入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

—

“四人帮”说社会主义时期反修只能反右不能反“左”，就是说社会主义时期的修正主义只有右没有“左”，社会主义时期的“左”，都变成马克思主义了。这是为他们用极“左”来冒充马克思主义辩护的，实际上是对马列主义两条战线斗争的科学理论的根本篡改。我们必须正本清源，恢复马列主义两条战线斗争理论的本来面目。

在社会主义时期，修正主义是否只有右没有“左”？反修要不要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这是关系到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原则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两条战线斗争的科学理论是一个普遍真理。它告诉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同各种错误的倾向、思潮和路线作不调和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总是从两个方面向马克思主义进攻，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在两个方面作战。因此，“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戒‘左’戒右”。①“我们党是在反对两种倾向，既反对右倾又反对‘左’倾的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②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总是从两个方面向马克思主义进攻呢？这是因为真理只有一个，而错误则有“左”有右，或者说有过头有不及、有太急有太慢两种。“左”、右倾就

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从这方面或那方面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这种错误倾向集中表现为路线和政策就是机会主义。所以，毛主席说，“机会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慢机会主义，一种是急机会主义。”^③“所谓机会主义，就是这里有利就干这件事，那里有利就干那件事，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章程，没有一定的方向，他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那样。”^④所以机会主义必然是主观主义实用主义的，而且必然忽“左”忽右，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这种随波逐流的无定性，“缺乏任何明确和坚定的原则”，正是列宁所指出的“机会主义的特色”^⑤。“风派”，其实就是缺乏原则，忽“左”忽右的表现。有真理就有谬误，有马克思主义就有“左”右倾。所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就必须反“左”反右。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一万年都是这样。

“左”右倾机会主义都不利于无产阶级而只有利于资产阶级，因此它们是统一的。斯大林说，“哪里有右倾，那里就必定有‘左’倾。‘左’倾是右倾的影子”。^⑥“左”和右不是孤立存在的，根本不可能只有右没有“左”。所以机会主义者才能忽“左”忽右，“左”、右倾分子也能时分时合，从两个方面反对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拉向后退。斯大林说，“‘左’倾实质上就是右的机会主义倾向”，不过“左”右倾之间又是有差别的，“差别就在于它们的政纲不同，要求不同，办法和手段不同”。^⑦正因为它们之间有差别，一种倾向才能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所以要善于分清“左”右，不能指“左”为右，或指右为“左”。如果把“左”当作右来反，或者主要倾向是“左”，却大反其右，就会越反越“左”，把正确的东西也当作右来反。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过深刻教训的。

机会主义既然有“左”、右两种，修正主义是否也必然有“左”、右两种？正是这样。列宁在一九〇八年把当时出现的各种修正主义思潮分为“从右面来的修正主义”和“从左面来的修正主义”。当时，首先出现的是“从右面来的修正主义”，这是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它已形成相当严整的观点体系，并已国际化，在一系列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引起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分化，普遍形成机会主义派别，成为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但是，正如列宁后来指出的，“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的。”^⑧随着“从右面来的修正主义”的出现，也出现了“从左面来的修正主义”。当时，这是一种表现为“革命工团主义”的半无政府主义，列宁说它“也依附于马克思主义，同时把它加以‘修正’”；只是由于它还没有形成比较严整的观点体系，“还远不如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那样成熟，还没有国际化，甚至还没有和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作过一次巨大的实际战斗”^⑨，所以不是主要危险，列宁才没有着重去分析批判它，而把斗争主要锋芒指向“从右面来的修正主义”。正因为这样，列宁往往把右倾机会主义直接称为机会主义，而把“从左面来的修正主义”称为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但是，列宁观点的实质正在于把修正主义看作是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倾向在理论上“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右倾机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社会沙文主义等等）企图从右面来“修正”马克思主义，而“左”倾机会主义则企图从左面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两种修正主义的实质都是机会主

义。所以，列宁还着重指出，修正主义由于其机会主义实质，“可能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而每一个稍微‘新颖的’问题，每一次稍微出人意料和没有预先觉察到的变动……都不可避免地总要引起某种形式的修正主义”。列宁还说，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将使一切争论问题尖锐化，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将来“还一定会在大得无可比拟的规模上再次经历到。”^⑩七十年来的历史，完全证明了列宁这一科学预见，同时也说明，在社会主义时期，修正主义并非只有右没有“左”，恰好相反，两条战线的斗争变得更为复杂、更为重要了。

如果说，十月革命前，“从左面来的修正主义”还远没有成熟，那么，在十月革命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深入发展，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当列宁粉碎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取得了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就出现了托洛茨基主义，从“左”面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反对列宁主义，它不仅有比较系统的观点体系，而且后来也逐步国际化，实际上是“从左面来的修正主义”的一个典型。斯大林粉碎了托洛茨基主义，取得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出现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现代修正主义。在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出现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毛主席领导我们的党粉碎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以后，又出现了林彪、“四人帮”的修正主义。无论是赫鲁晓夫或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还是托洛茨基或林彪、“四人帮”的修正主义，都有比较系统的观点体系，用不同的形式来“修正”马列主义。赫鲁晓夫或刘少奇的那种修正主义，有时也有极“左”即形“左”实右的表现形式，但大量的、主要的表现是极右。托洛茨基或林彪、“四人帮”的修正主义，有时也有露骨的极右表现，但大量的主要的公开表现形式则是极“左”即形“左”实右的。这就说明，修正主义既可以表现为象伯恩斯坦、考茨基、赫鲁晓夫、刘少奇的那样的形式，也可以表现为象托洛茨基、林彪、“四人帮”那样的形式。两种形式的修正主义，从其实质、目的或后果来说，都一样是极右的；但从其表现形式来说，从其纲领、要求、办法和手段中表现出来的公开倾向来说，则明显有所不同。这种情形，又恰好是在社会主义时期才出现的。这里究竟有没有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正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

既然修正主义由于其机会主义实质而必将随着马列主义的胜利和革命事业的深入而不断改变形式更换手法，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进展，都是马列主义最辉煌的胜利，也是社会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必然要引起修正主义在形式和手法上的变化。每当马列主义战胜一种右的修正主义，使其在工人群众中破产，从而使革命前进一步时，往往就会出现“左”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一方面，从小资产阶级极端革命性中生长出来的“左”倾思想情绪倾向于把革命引向极端，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另一方面，已经破产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右的修正主义者也力图改变形式更换手法，转而利用小资产阶级极端革命性把革命引向邪路，使其受到破坏而声誉扫地，从而达到其毁灭革命，保护和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这种情况，在小资产阶级如汪洋大海般的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所以，在苏联出现了托洛茨基主义，“用‘左’的荒

唐的‘不断革命’”来冒充马克思的不断革命思想，从左面来反对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完全不是偶然的。斯大林正是针对托洛茨基主义这种特点指出：“用‘左’的假面具来掩盖机会主义的行为，是取得政权以后我们党内所有一切反对派别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而这正是由于苏联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他们不会相信和根本仇视反革命分子和露骨的机会主义分子，“因此，‘革命的’假面具就是反对派用来至少在表面上吸引工人注意并使工人信任他们的钩饵”。^⑩在我国，一贯是极右的刘少奇修正主义也曾被迫一再改用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路线来破坏“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而在刘少奇的修正主义破产以后，则出现了林彪和“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转而利用人民内部的小资产阶级极端革命性，用极“左”即形“左”实右的无政府主义来冒充马克思主义，以伪装自己、欺骗群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也完全不是偶然的。

所以，毛主席在总结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经验时深刻地指出：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周总理在“十大”报告中阐述毛主席这一教导时指出：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掩盖着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纠正王明的“左”倾，又掩盖着王明的右倾。“反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又掩盖着林彪的修正主义。”这种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的情形，今后还可能出现。这里不是清楚地指明了林彪的修正主义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是两种不同的倾向吗？林彪和“四人帮”，正是利用反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搞另一种形式的修正主义。从而，林彪、“四人帮”的修正主义，就代替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成为我们党的主要危险。林彪、“四人帮”这种用极“左”的、“最最最革命”的假面具伪装自己破坏革命的修正主义，比刘少奇那种露骨的修正主义确实具有更大的欺骗性。这就说明，修正主义用极“左”来伪装自己，破坏革命，正是社会主义时期修正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进攻的一个重要新特点。

二

“四人帮”鼓吹社会主义时期反修只能反右不能反“左”，也是对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的伟大思想的根本歪曲。我们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恢复毛主席思想的本来面目。

“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喜欢引用毛主席如下科学论断：“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⑪然后就振振有词地宣称，毛主席这一指示说明：（一）修正主义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可见，修正主义没有“左”的）；（二）修正主义亦即右倾机会主义就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经常的主要危险”；（三）借攻击“教条主义”来攻击马克思主义，“用反极‘左’来搞复辟倒退”，就是“一切修正主义者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共同特点”。

这一套东西，来自那个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托派、反共分子陈伯达的“发明”。

陈伯达在一九五九年一篇题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的文章里，就引用了毛主席这一科学论断，歪曲说，毛主席这一指示说明了，右倾机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危险。从此以后，所谓“右倾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经常的主要危险”之类的说法就流传开来了。人们从此也就不敢再谈反“左”，不敢再谈两条战线的斗争。这样一来，陈伯达在一九五八年所搞的那套假共产主义极“左”货色，也就似乎成了“马克思主义”。林彪也就得以推销他那套“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谬论。“四人帮”发展了陈伯达的谬论，把主要危险变成唯一危险，根本否定了“左”的危险和反“左”的必要，还把反极“左”打成“反革命”，达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

毛主席的这一指示，能作这样的解释吗？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第一，毛主席这一指示并不是把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划等号。毛主席这一段话，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前说的。当时，无论是国际上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还是国内的刘少奇修正主义，确实都是右倾机会主义，都是当时的主要危险，都是借攻击“教条主义”来攻击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的。毛主席的话是针对这种修正主义说的，它概括了这种修正主义的本质和特点。但这里根本没有包含“一切修正主义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意思。毛主席之所以把修正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并提，是因为当时已经出现的比较系统“修正”马克思主义并成为当时的主要危险的，就是这种形式的修正主义。这就象列宁把伯恩斯坦、考茨基的右倾机会主义、“从右面来的修正主义”称为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而未加上“右倾”的字是一样的。因此，把“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说成是毛主席的思想，完全是强加于毛主席的。

只要细读一下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著作，就能发现：正如列宁在一九〇八年指出“从右面来的修正主义”是当时的主要危险的同时，也指出存在着“从左面来的修正主义”一样，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指出表现右倾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是当时的主要危险的同时，实际上也指出存在着“左”的倾向。固然，这种“左”的倾向当时突出表现为教条主义，而没有形成严整的观点体系来“修正”马克思主义。这种“左”的教条主义，毛主席指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一个思想派别，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观点”^③，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④，因而，它主要是思想方法上的错误。而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则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⑤的。由于“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于教条主义作过很多批判。这是应该的。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右倾机会主义就借攻击“教条主义”来攻击马克思主义。这是修正主义在特定条件下所采取的一种策略手段。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才把右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同“左”的教条主义相比较，指出：“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⑦，“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号召“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⑧。毛主席还反复指出，“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⑨。毛主席就在反右派斗争中还指出：“真正的教条主义

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但是对于革命事业的损失说来，‘左’比右并没有什么好，因此应当坚决改正。”^⑬可见，毛主席就是在右倾机会主义是主要危险的情况下，也还是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右倾，也反对“左”倾；既反对修正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既重视主要倾向，也不放过非主要倾向，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很明显，“四人帮”歪曲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指示来否定两条战线斗争，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来反对毛主席，必须彻底揭露批判。

第二，毛主席的指示，不能说明右倾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经常的主要危险”。毛主席的著作，根本就没有对“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经常的主要危险”是右倾还是“左”倾，是极右还是极“左”的问题作出论断，也不可能作出这种论断，因为这种论断是根本违反马列主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陈伯达和“四人帮”说毛主席的指示是说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是极右，这完全是强加于毛主席的。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指明当时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指明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更有害、更危险，都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说的。怎么能够把一个时期，一种历史条件下的主要危险毫无根据地说成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经常的主要危险”呢？怎么能够把一个时期，一种历史条件下修正主义的一种形式和手法说成是“一切修正主义”的“共同特点”呢？这种以偏概全、以特殊代替一般的手法，把相对的、特殊的、有条件的、暂时的东西夸大为绝对的、普遍的、无条件的、不变的东西，正是修正主义篡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手法。

这里还要指出，陈伯达在引证毛主席上述那段话时还特别引了毛主席关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修正主义者是社会上复辟势力的最好的助手这一论断，借以证明“右倾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危险”。这也是一种诡辩，是混淆了修正主义的共同实质和表现形式，用修正主义的极右的共同实质来否定修正主义有极“左”的表现形式。这种手法也为“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所袭用。

毛主席指出修正主义者是社会上复辟势力的最好的助手，这就指明了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左”的修正主义也是如此。这里也并未牵涉到哪种形式（是极右还是极“左”）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更危险的问题。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错综复杂，修正主义必然随着斗争形势、条件而改变形式更换手法，“左”和右的主要危险不可能永远固定不变。右倾可以在一种条件下成为主要危险，“左”倾也可以在另一种条件下成为主要危险。问题取决于历史条件和斗争的具体发展。既然机会主义有右的和“左”的两种表现形式，这就决定了机会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进攻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至于在一定时期，主要从那个方面进攻，那就要看条件，要具体分析。捏造一个万古不变的主要危险的公式来套在错综复杂的反修斗争上面，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有主要危险就有次要危险，它们又是会依一定条件而互相转化的。所以才必须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

第三，借攻击“教条主义”来攻击马克思主义，“借反极‘左’来搞复辟倒退”，这只是

一种形式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特点，不能夸大为“一切修正主义”的“共同特点”。毛主席指出修正主义者是社会上复辟势力的最好助手，这就从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上来说明它比教条主义更危险。这里说的教条主义，也是指那种作为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的教条主义。在这种意义上，作为复辟势力的最好助手的修正主义者当然比还要革命的教条主义者更危险更有害。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修正主义没有“左”的，而教条主义则有右的。就是说，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之间的这种差别和对立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即只在一定范围内说的。决不能把它们绝对对立起来，否认它们之间有互相贯通的一面。毛主席当时就指出，“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⑭；“教条主义走向反面，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修正主义”^⑮。就是说，教条主义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修正主义。所以，毛主席在批判林彪、陈伯达一类骗子时就进一步指出，教条主义也是“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可以导致政治上的“左”、右倾，为“左”、右倾机会主义服务，就是说，可以成为机会主义反对正确路线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手段和方法。而坚持教条主义就可能走向反面，变为修正主义，从“左”面或从右面“修正”马克思主义。所以，教条主义不仅有“左”的，也有右的。列宁就说过有“左”的教条主义学理主义，也有右的教条主义学理主义。王明搞教条主义，先是“左”倾，后是右倾，最后投靠苏修，叛党叛国。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也利用过教条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抓住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一切或大多数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同时举行才能获得胜利这一旧公式，攻击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获得胜利的新结论，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变成木乃伊”^⑯。历史经验证明，修正主义有时表现于借口历史条件变化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过时”，把坚持这些基本原理攻击为“教条主义”；但是，修正主义“有时还表现于企图抱住马克思主义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个别原理不放”，“抱住这些公式和结论的每一个字句”，“把它们变成教条，以便阻碍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从而也阻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⑰。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一类修正主义者不就是时而攻击马克思主义“过时”，时而又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木乃伊”吗！

同样，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既可以打着“反极左”的旗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搞复辟倒退，也可以打着“反右”、“反修”的旗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搞复辟倒退。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不就是最擅长于打着“反修”的旗号来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来搞复辟，打着“反政变”的旗号来搞反革命政变的吗！他们歪曲毛主席指示，一方面把修正主义同教条主义、右倾同“左”倾绝对对立起来；另一方面又把修正主义同右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同“左”倾绝对等同起来，这是他们形而上学猖獗的突出表现。他们把修正主义的共同实质同其表现形式完全混同起来，把一种表现形式的修正主义夸大为绝对，根本否定另一种形式的修正主义，就是为了要掩盖自己的修正主义。“四人帮”把所有反对教条主义和反极“左”统统当作“修正主义”来攻击，这实际上是借攻击“修正主义”来反对毛主席，反对马克思主义。

因此，在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在当前，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必须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才能识别和抵制日益巧妙地伪装起来的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全面地正确地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胜利地实现五届人大提出的新时期的总任务。

-
- 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52页。
 - ②《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243—244页。
 - ③《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04页。
 - ④《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03页。
 - ⑤《列宁全集》第五卷第496页。
 - ⑥《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238页。
 - ⑦《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239页。
 - ⑧《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89页。
 - ⑨《列宁选集》第二卷第8页。
 - ⑩《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9页。
 - ⑪《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18页。
 - ⑫《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92页。
 - ⑬《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24页。
 - ⑭《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7页，着重点是引者所加。
 - 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8页，着重点是引者所加。
 - 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23—424页。
 - 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

稿 约

(一) 本刊欢迎投稿。

(二) 本刊欢迎下列稿件：

1.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理论上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研究的成果。

2. 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反动理论的文章，在当前，特别欢迎结合第三战役，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分别对“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理论进行深入批判的文章；

3. 完整地、准确地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问题的文章；

4. 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本地区的调查报告；

5. 国内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评价和国内外社会科学动态介绍。

(三) 来稿一般不超过一万字，请用稿纸誊写清楚，并附详细通讯处，望勿一稿两投。不采用的稿件，本刊负责退还。

(四) 来稿发表后，即奉稿酬。

(五) 来稿请寄：广州市越秀北路222号《学术研究》编辑部。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

——评“四人帮”的超级“革命”

黎克明 董伍伦

现在，真相已经大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打着最最“革命”旗号的“四人帮”，原来是一伙祸国殃民的反革命黑帮。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但是，绝不要上那些高喊“革命”的“超级革命家”的当。革命党人必须搞清楚什么是革命，提高识别真革命和假革命的能力。

（一）

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历来都说，为了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这完全正确。实现共产主义同发展生产力本来是一致的，但是，“四人帮”打着最最“革命”的旗号反对发展生产，从反面教育了人们，必须重新明确宣布：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

可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谁要是把发展生产力提到纲领的位置上来，谁就被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四人帮”用“唯生产力论”的棍子打人，弄到“革命”同生产势不两立，只准谈“革命”，不准讲生产。张春桥的“只要抓好阶级斗争，颗粒无收也不要紧”的谬论，概括了“四人帮”的“革命”定理——革命就是破坏生产力。但是，世界上难道有这样的革命吗？

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生产力要求解除过时的生产关系和那维护过时的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对它的束缚，使自己得到解放。马克思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马克思这段话在人类历史上第

一次深刻地阐明了革命的最深刻的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发展，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毛主席非常精辟地概括了马克思这个光辉的思想，毛主席曾经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见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这些道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但是由于“四人帮”长期控制舆论工具，给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进行批判，才使得今天人们对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如此陌生，需要反复论证。

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人类本身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革命活动。因此，历史上一切革命的终极原因，都必须从生产力的发展和它所决定的经济结构中寻找。

无产阶级为什么要起来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已经严重束缚了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的发展，只有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够解放生产力。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把高速度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提到共产党的纲领的地位上来，号召“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共产党宣言》第44页）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继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是要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那部分生产关系；改革那些维护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不仅如此，还必须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迅速发展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和变革。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归根到底，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所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总纲中明确规定：“在本世纪内，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宪法序言中也明确规定：“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两个大会都把高速度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定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历史任务。

为什么显赫一时的“四人帮”，一朝败亡，迅即土崩瓦解？根本原因在于“四人帮”推行的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严重地阻碍和破坏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不容许“四人帮”长期阻碍它的发展，只有粉碎“四人帮”，生产力才有可能重新迅速发展。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和生产资料这两个基本因素。社会主义革命解放生产力，首先就是解放劳动者，使劳动者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物质生活和文化科学水平，真正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的主人。其次，就是解放物质生产资料，使自然科学理论和先进科学技术日益进入生产过程，使生产工具飞速进步，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四人帮”倒行逆施，骑在劳动者头上作威作福，不顾人民死活，妄图把社会主义劳动者变成愚昧的奴隶，因此，他们的覆灭是不可避免的。

让“四人帮”一伙反马克思主义的小丑们咒骂我们是搞“唯生产力论”吧，我们公开声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力。

(二)

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那么，革命的目的达到了没有，革命的效果如何，就必须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作为衡量的标准：凡是革命，就必然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发展；反过来说，凡是不解放生产力，不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就不是真正的革命，而只能是假革命或者是反革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就自封为“最最革命的左派”。但是，马克思主义判断一个集团或派别在历史上起的是革命作用还是反革命作用，毕竟不是根据它自己的标榜，而是根据一个客观标准，就是看它的政治纲领和经济文化纲领实施的结果，是解放生产力还是束缚生产力。毛主席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选集》第980页）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七六年夏，“四人帮”公然攻击毛主席这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所谓“唯生产力论”。

为什么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叫做革命？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名称特别好听，而是因为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主义却能够容许生产力以资本主义所不能有的速度向前发展。

在社会主义时期，在正确路线指导下的革命一定是直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在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毛主席就指出：“一切合作社，都要以是否增产和增产的程度，作为检验自己是否健全的主要的标准。”（《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37页）在“四清”运动中，毛主席主持制订的《二十三条》，就把是否增产作为“四清”搞得好不不好的标准之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主持制订的《十六条》也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

“四人帮”严重破坏了生产力，疯狂摧残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全国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一千亿元，钢产量二千八百万吨，财政收入四百亿元，使我国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反革命实践所造成的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完全证明了他们是打着最最“革命”旗号的反革命黑帮。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扭转了生产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下降的局面，工交财贸全面上升，完全证明了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路线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正确路线。

(三)

在“四人帮”猖獗的日子里，毛主席完整地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歪曲篡改得不成样子。“四人帮”把继续革命归结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又“同物质基础无关”。在“四人帮”这一伙历史唯心主义者看来，“革命”只受他们的意志支配，他们想怎么革就怎么革，根本不受生产力的制约。但是，世界上难道有这样的“革命”吗？

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阶段，是由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要建立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会发生什么性质的革命。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历史已经证明，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当机器大工业还未出现的时候，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发生，是社会化的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机器大工业要求各部门各企业分工协作，按比例地协调生产。社会主义革命就是“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7页）

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以后，之所以还要进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目前，我国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同时并存，这主要是我国工业和农业这两大部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所造成的。全民所有制同社会化程度较高的生产力相适应，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同社会化程度较低的生产力相适应。目前，我国农业方面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绝大多数还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的制度，这是由于农业主要还是手工劳动这种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什么时候从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人民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不能凭主观愿望，而取决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成熟，归根到底，取决于农业机械化的水平。“四人帮”这伙“超级革命家”，根本不管生产力水平如何，异想天开，提出“穷队用穷办法过渡”，还大打棍子，大扣帽子，胡说：“不想过渡，就是不想革命，反对所有制革命。”在“四人帮”的恶劣影响下，一些地方巧立名目，强制实行变相过渡，把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搞到名存实亡，结果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

在我国现有生产力水平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必然存在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直接生产者和生产管理者的相对固定的分工。这种情况即使在我国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之后，仍将继续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是生产力发展不足的必然结果。这种带有旧社会痕迹的分工，正如马克思和列宁所指出的，只有在“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哥达纲领批判》第14页）和“大大发展生产力”（《列宁选集》第4卷第11页）之后才能消失。现在，我们能够做到和应该坚决做的是，在发

展生产力的过程中，通过毛主席提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途径，逐步缩小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直接生产者和生产管理者的差别。如果过早地急于消灭这种差别，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反而推迟了这种差别的消失。“四人帮”提出“知识分子和工农划等号”的蛊惑人心的口号，其实质就是要在一天早上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消灭。“四人帮”就是用这种超阶段的“革命”口号为幌子，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摧残我国科学技术事业，严重破坏我国生产力的发展。

我国现正处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对于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实行按劳分配的政策。按劳分配保证了劳动者多劳多得，维护了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因而能够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者一贯认为：在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展的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只有通过按劳分配，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有可能到达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用按需分配来取代按劳分配。至于在哪一种情况下，采取哪一种按劳分配的形式，应该通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去解决。凡是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分配形式，就会保留下来；那些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分配形式，终将被淘汰。在按劳分配的具体形式问题上，应该容许多种多样形式存在。列宁就提倡过计件工资和奖金。“四人帮”污蔑按劳分配“是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攻击实行奖金或者计件工资的工资形式，是搞修正主义，在我国城乡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使我国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在社会主义时期，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不可避免地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来说，在我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状况下，劳动群众绝大部分工作时间要用于生产劳动，能够用于提高政治、文化水平以及参加管理国家和企业的时间不多。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虽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还不可能由全体劳动者直接管理，而只能由少数人代表多数人来管理。再拿人的思想改造来说，在目前生产力水平的情况下，生产劳动还是艰苦的单调的体力劳动，因而在多数劳动者的思想上，劳动还不可能成为生活的第一乐趣，而不能不带有谋生手段的性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对于农民的思想的制约更加明显。尽管我国农民已经是人民公社的社员，但是在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力状况下，生产集体的规模很小，私有制的残余还存在，人民公社社员不可避免地仍然保留着小生产者固有的一些特点。列宁说过：“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是需要经过几代的事情。只有有了物质基础，只有有了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规模地实行电气化，才能解决这个关于小农的问题，才能使他们的可以说是全部心理健全起来。”（《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5页）当然，在中国，农民的情况比当时的俄国要好得多，但是，列宁的这个观点并没有过时，只有大大发展生产力，才能显著改变农民中残存的私有观念，这是毫无疑义的。

“四人帮”鼓吹超越生产力水平的“革命”的一个重要论据，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变革。”（程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生产力一旦离开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它就不发展了，所以，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一刻不

倒地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四人帮”完全颠倒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在他们看来，不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最终决定上层建筑，而是恰恰相反，上层建筑决定生产关系并最终决定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力是比较活跃的经常变动的因素，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则是相对稳定的因素。在历史上，即使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它取得统治地位之前和取得统治地位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因而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中。至于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确立起来的崭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比历史上一切处于相对稳定时期的私有制生产关系，不知要优越多少倍。它适合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它也有不完善的部分，需要人们自觉地及时地恰当地加以调整和改革，以逐步完善起来，并且逐步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但是，这同“四人帮”所鼓吹的“继续革命”根本不同。“四人帮”的“继续革命”，不是革资本主义的命，也不是改革和调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完善部分，而是革社会主义的命。他们污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产生资本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攻击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是“旧政府”、“黑线专政”，“要彻底砸烂”，“要改朝换代”等等，使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天空一次又一次地乌云密布。现在，是到了彻底批判和肃清“四人帮”这一套反社会主义的超级“革命”谬论的时候了。

（四）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中，是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革命，经过革命，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革命成果得到巩固，又进一步引起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新的革命，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法。由此可知，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首先是生产促进革命，然后是革命促进生产，革命的发生，是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在一定条件下依赖于革命的发展，这就是革命和生产的辩证法。只有搞清楚革命和生产的辩证关系，才能够真正懂得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在发展生产力中巩固，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在发展生产力中防止；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才能保证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在发展生产力中才能真正巩固，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在发展生产力中才能有效防止？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归根到底，必须体现在它能够造成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能够向人民群众提供比资本主义制度下好得多的生活上。列宁早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就明确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造成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

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毛主席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提得更加尖锐。毛主席在一九五六年就说过：如果社会主义中国，在革命胜利后五六十年生产力还赶不上资本主义美国，就应该开除球籍！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就指出：“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2页）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口号“四人帮”喊得比谁都响。但是，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发现“四人帮”讲的同我们讲的是根本对立的两码事。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高速度发展生产力，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四人帮”却认为高速度发展生产力就是他们所要防止的“复辟”，他们认为：“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张春桥正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提出“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谬论，胡说：“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四人帮”就是这样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

发展生产力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还因为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从而取得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毛主席在十年内战极端困难的时期，就号召全党“关心群众生活”，认为只有改善人民生活，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建立起保卫革命根据地的真正铜墙铁壁。革命在全国胜利了，还要不要关心群众生活呢？要！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就告诫全党：

“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毛泽东选集》第1318—1319页）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了，还要不要关心群众生活呢？要！任何政党，无论它功劳多大，威信多高，一旦脱离群众，不再为人民谋利益，这个政党就要被人民所唾弃。革命者绝不可学“四人帮”，自己过着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而把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攻击为“福利主义”、“物质刺激”，加以讨伐。

由于我国还面对着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高速度发展生产力，增强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以有效地对付他们对我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更加显得刻不容缓。

“四人帮”的“革命”是建立在历史唯心论基础上的“超级革命”。“四人帮”自以为他们的“革命”可以任意破坏生产力，可以摆脱生产力的制约，可以随心所欲地摧毁社会主义事业而不受惩罚，但是，这只能是他们的主观幻想。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抗拒的。一切破坏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四人帮”，连同他们的“超级革命”和“超级革命论”一起，被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人民群众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又一次证明了这个真理。

“四人帮”实用主义的剖析

齐 云

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为了彻底揭露‘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必须深入批判他们那条路线的反动理论基础。”实用主义是“四人帮”的修正主义极右路线的主要哲学基础，是“四人帮”的反动世界观的集中表现。揭露、批判“四人帮”的实用主义，是深入揭批“四人帮”的一个重要战斗任务。

实用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变的时期中，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而出现的一种主观唯心论哲学。它否认现实事物的客观存在，否认客观规律和客观真理，以对主体的“效用”作为解说各种问题的基本原则。这种哲学是适应帝国主义的政治需要，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动思想武器。

实用主义的阶级本质同“四人帮”的极右派本质是完全一致的。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论十分适合“四人帮”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需要。因而，“四人帮”把实用主义作为他们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理论，炮制、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主要武器。尽管他们竭力遮盖、掩饰，但只要细加剖析，就可以看清他们的实用主义的反动嘴脸。

（一）

“四人帮”大搞修正主义、大搞分裂、大搞阴谋诡计时，往往打着“从斗争需要出发”的旗号。叛徒江青在指使其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炮制他们的“批林批孔”材料时，郑重其事地嘱咐说：“材料要从斗争需要出发，不是从有什么材料出发。”他们如此强调的“从斗争需要出发”究竟是什么货色，是首先需要弄清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认识问题，进行活动，必有一个出发点。从客观实际出发还是从主观出发，这是两种基本的而又根本不同的出发点。出发点的不同，不仅表现了不同的态度和方法，而且反映了两条哲学路线的对立。列宁指出：“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主张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马赫主张第二条

路线，即唯心主义的路线。”^①主张唯物主义路线，必然坚持从实际出发。主张唯心主义路线，必然坚持从主观出发。

“四人帮”打着“从斗争需要出发”的旗号，力图把自己装扮成唯物主义路线的执行人。因此，我们必须把“四人帮”的口号同从实际出发作一番分析对比，看看他们搞的究竟是那条路线。

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坚持从实际出发，反对从主观出发。从实际出发，首先是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要正确认识、改造客观事物，就必须解决主观同客观的矛盾，即是使我们的思想符合客观事物的规律性。革命事业是群众的事业，它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又要依靠人民群众去进行。因此，从实际出发，就必须从广大群众的利益出发。通过对客观事物和群众利益的真实情况的充分了解和研究分析，从中找出其固有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解决问题和进行工作的指导，这是从实际出发的具体内容。“四人帮”鼓吹的“从斗争需要出发”，完全不讲尊重客观存在的事实，不讲尊重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显然和马克思主义的从实际出发是根本不同的。

在如何对待材料的问题上，同样存在着从实际出发同从主观出发的斗争。“四人帮”有时为了装璜门面，也收集一点材料，但从不强调要详尽地占有材料。更为严重的是，他们不是对材料进行客观的具体的分析研究，而是把材料作为空想出来的现成结论的证明工具，合“需要”者则取，不合“需要”者则去。江青在向“梁效”交代如何“从斗争需要出发”处理材料时表白得十分清楚：“从现实的斗争需要考虑，应该有些什么题目，然后寻找材料，这样材料的运用就活了。”不是从分析材料中得出结论，而是主观先想象出结论，然后去寻找材料来说明。由此可见，“四人帮”的“从斗争需要出发”，是十足的唯心主义，是从主观出发的，这是实用主义的“效用就是一切”的变种。

实用主义极其强调主观效用，实用主义也可以称为效用主义。实用主义哲学的一个创始人詹姆士这样说过，实用主义“是一个决定方向的态度。这种态度离开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虚拟的必然性，而向着最后的事物，结果，效果，事实”。这些话表明，实用主义评论问题，不是从客观存在的事物出发，不要理论原则的指导，不管思维的逻辑要求，不承认客观外界的规律性，而只看最后的结果对主体的效用如何。效用就是一切，这是实用主义的基本原则。

这个效用就是一切的原则，贯串实用主义哲学的各个方面，在其关于认识问题、社会问题、道德问题、教育问题、宗教问题的论述中都表现出来，而在其关于真理的问题上表现得最为集中、突出。实用主义否认真理是主观对客观的符合，声称“真理即效用”，有用即真理；否认真理的内容是客观规律性的正确反映，宣称真理的意义在于它发挥效用的能力。“无论那个观察，只要它能安安稳稳把我们从一部分的经验，引到另一部分，把事物联络得满意，应用得妥贴、简单、省力；这观念能这样做到什么地步，便真到这个地步。”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实用主义否认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鼓吹“成功”是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它们成功了，它们就是可靠，健全，有效，好的，真的。……

坚信、确证、证实在于作用和效果。”这种效用就是一切的原则，充分暴露了实用主义的极端主观唯心论的本质。

“四人帮”大肆鼓吹的“从斗争需要出发”，和实用主义的只讲效用，从对主体的效用来衡量、取舍一切的观点和做法，完全是一路货色。再进一步揭露他们的“斗争需要”的具体内容，这个口号在政治上的反动性就更加暴露无遗了。他们的“斗争需要”是什么，国民党特务张春桥曾有过说明。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即张春桥写下反革命黑文《二月三日有感》后的第三天，他单独召见于会泳，说：“现在很需要安排文艺界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有深度、有广度的戏。这是当前斗争的需要。”原来，“四人帮”的“斗争需要”，就是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政军各级革命领导干部，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和各级领导权，建立法西斯专政的“帮天朝”；就是“新桃换旧符”，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需要。他们的“从斗争需要出发”，也就是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动主观需要出发。

正是由于这样“从斗争需要出发”，“梁效”按照江青的黑指示炮制的所谓“批林批孔”的材料中，竟然不顾林彪向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猖狂进攻的铁的事实，别有用心地列出什么批判“中庸之道”的条目，含沙射影地大批什么“不偏不倚”、“折衷调和”、“平庸保守”等等，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四人帮”打着“从斗争需要出发”的旗号，贩卖的是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论的黑货，干的是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勾当。这同他们的假左真右是完全一致的，是为了适应他们以极“左”的形式来推行修正主义极右路线的需要。

（二）

一切实用主义的忠实信徒，在其活动中大搞实用主义，把“效用就是一切”进而为“一切为了实用”，即用任何可能的手段使各种事物为达到其主观的目的服务。“四人帮”在其反党活动中，也把效用就是一切的原则恶性发展成一切为了实用的原则。这个原则成为他们这个新老反革命结成的反党集团大搞修正主义、大搞分裂、大搞阴谋诡计的一切行动准则。

主观随意地歪曲事实甚至捏造“事实”和随心所欲地臆造“规律”，是“四人帮”奉行一切为了实用的原则的主要表现。

实用主义否认现实事物不依赖于人的主观而存在的客观性质，公然宣称事物、实在是和人的意识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是人的信仰的产物。詹姆士说：“当实用主义谈到‘实在’时，原则上是指人有效地认为是实在的东西，是人那时当做实在来承认的东西。”实用主义有一个所谓“制造实在”的论断，就是鼓吹认识过程不是事物被认识的过程，而是事物被制造的过程。实用主义究竟承认那个实在，制造那个“实在”，决定的仍然是效用。詹姆士又说：“我们用这个方法或那个方法想象一个实在，去适合我们的目的，而这实在就被动地服从这个概念。”实用主义制造“实在”是为了让它发挥效用，或者说是为了让它发挥效用才把它制造出来。这种极端唯心主义的谬论，真是骇人听闻。

“四人帮”对这种“制造实在”的谬论心领神会，运用自如。他们在其反党活动中，大肆捏造“事实”，制造“实在”，发挥它们在篡党夺权中的效用。他们炮制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就是典型的例子。我们党的绝大多数老干部，是抱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参加革命的。他们从事民主革命，是为了经过民主革命，而达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们中的一些人入党时虽然带着不同程度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但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在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教育下，在革命斗争的长期实践中，逐渐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国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和民主革命顺利地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更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四人帮”全盘否定这些客观事实，从打倒革命老干部的反革命需要出发，凭空编造“事实”，把革命老干部硬说成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以为这个“实在”既然被制造出来，就会被动地服从他们的概念，可以发挥他们所期望的反动效用。这真是白日做梦！

“四人帮”这种“制造实在”的实用主义行径，在他们的所谓“批儒评法”中同样表演得淋漓尽致。为了打倒敬爱的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制造了“党内有大儒”的“实在”。为了江青要当女皇，他们制造了吕后“帮助”汉高祖“打江山”的“实在”。历史上只有一个孔丘，但他们为了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和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主观臆造出了各种各样的“孔老二”：有“端着手臂”的，有“卧病在床”的，也有当“农业部长”、“代理宰相”的，等等。“四人帮”一切为了实用，把事实说成是谣言，把谎言说成是事实。真假颠倒，荒谬至极。

“四人帮”在其反党活动中，还肆意否认客观规律和客观真理，随心所欲地臆造“规律”，这同样是以实用主义的原则为指导的。实用主义从效用就是一切的原则出发，鼓吹理性除了要求知道试验成果之外，并不再要求什么，完全否认客观规律的存在和认识客观规律的必要。杜威就说什么“诉诸必然性永远是教条的结果”。他们把必然性看作是虚拟的，即由主观按照一定的需要创造出来的。杜威还攻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发现和阐明的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规律，不是“从历史事件的研究中引申出来的，甚至不能设想，它是这样获得的。它是从黑格尔的辩证的形而上学中抽引出来的”。实用主义否认事物的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也就必然否认客观真理，而宣扬真理是主观的。詹姆士说：“事实上，真理大半存在于一种信托制度上。我们的思想和信念不拒绝使用它们，就‘通行’无阻，好象银行钞票只要没有人拒绝使用，就可以流通一样。”在实用主义看来，真理的存在完全取决于个人是否承认和是否使用，把真理当成是纯粹主观的东西，从而容许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真理。这种否认客观真理，鼓吹规律可以创造的谬论，对于妄图扭转历史车轮的“四人帮”来说，当然是很合乎心意的。

“四人帮”鼓吹的“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必然规律”，就完全是他们主观臆造出来的。我们党的老干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后，大多数是自觉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虽然有一些人也存在对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准备不足的问题，但经过党的教育、帮助，仍能跟随毛主席继续革命。总之，党的绝大多数老干部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在社会

主义历史阶段经过学习和实践的锻炼，更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带头人，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这就是革命老干部所经历的客观发展进程。“四人帮”却对此一概抹煞，按照他们的反动需要，胡诌出什么“必然规律”，妄图把革命老干部当作走资派统统打倒。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出现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是一小撮，他们大多数是由混在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等演变来的。这才真正是客观的必然规律。“四人帮”走过的罪恶道路和可耻下场，就是很好的证明。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实用，在各个领域都随心所欲地臆造“规律”。在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上，他们否认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客观真理，主观臆造了什么“两千年的儒法斗争延续到现在，影响到将来”的“规律”。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上，他们否认经济最终决定政治的客观真理，主观臆造了什么“政治决定经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的“规律”。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上，他们否认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必须有强大的物质基础才能巩固和发展的客观真理，主观臆造了什么“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的“规律”。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问题上，他们否认“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②的客观真理，主观臆造了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规律”。“四人帮”的主观唯心的头脑里，似乎塞满了形形色色的“规律”，一遇实用，呼之即出。列宁指出：“从思维中引出必然性、因果性、规律性等等，这是唯心主义。”^③事实证明，“四人帮”和他们的实用主义先辈一样，都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者。

（三）

对于实用主义的方法，胡适曾经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公式加以表述。这个公式，可算是道出了实用主义方法的精髓。

假设，是实用主义经常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杜威说：“所有观念、理论、思想体系，不管他们是怎样精致的和首尾一贯的，都应该看作是假设。”实用主义如此突出假设，把包括科学在内的所有理论都看作假设，目的是为了把实用主义的所有假设都当成科学。

实用主义把思维的过程区分为暗示、问题、假设、推理和试验五个阶段。实用主义的所谓“暗示”，不是由客观外界的事物作用于人们的感官引起，而是纯粹在观念中自行产生的。观念产生暗示，有了问题，于是提出假设。实用主义的“假设”起源于暗示，也就是起源于观念。假设既然是来自观念，那当然可以“大胆的假设”，即由主观任意地提出假设。实用主义的“推理”，就是推演假设中的涵义，弄清假设的内容。实用主义的“试验”，就是试验假设，使假设发生效用，以求得证明。而“有功效的假设是真实的假设”，也就是“真理”。实用主义的“推理”和“试验”，正是“小心的求证”，即根据假设的

内容要求去挑选材料，进行试验，以证明假设。这种实用主义的方法，完全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

假设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作用。恩格斯指出：“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一个新的事实被观察到了，它使得过去用来说明和它同类的事实的方式不中用了。从这一瞬间起，就需要新的说明方式了——它最初仅仅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进一步的观察材料会使这些假说纯化，取消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最后纯粹地构成定律。”^④由此可见，科学假设是由于新的事实发现并以这些事实作基础而提出来的，它提出后还必须根据进一步的实验和事实加以修正和丰富，直到经过反复的实践的检验，发展为定律。这是科学假设产生、演变的过程。实用主义则对这一切都加以歪曲、篡改。一方面，它任意抹煞了假设同客观事实、科学实验的联系，把假设说成只和观念有关；另一方面，它又把假设在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片面地夸大，从而得出所有理论都是假设的荒谬结论。

“四人帮”大搞实用主义，同样采取这种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他们从打倒革命老干部以便篡党夺权的反动需要出发，完全否认客观事实和客观真理，随意地把老干部说成是“走资派”，这不纯属“大胆的假设”吗！为了给这个大胆假设出来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寻找一些“根据”，他们也做了一番“小心的求证”。

首先是夸大非本质的东西，用非本质的东西冒充本质的东西。毛主席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⑤走资派是作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出现、存在和起作用的，它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是社会的资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一小撮走资派的阶级本质。但是，走资派又有它的特殊性。它处在执政的共产党内部，顶着共产党员的名号，披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外衣；它是通过大搞修正主义、大搞分裂、大搞阴谋诡计，来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为资产阶级效劳的。这是走资派的本质特征。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是识别走资派的根本标准。“四人帮”不是从走资派的阶级本质和本质特征去识别走资派，而是别有用心地抓住走资派担负领导工作和级别高、工资多的这些非本质特征加以夸大，把它们当作决定走资派的本质的东西，当作划分走资派的标准。这样，就完全篡改了走资派的阶级内容，歪曲了走资派的科学概念。“四人帮”运用这种主观的“小心的求证”出来的划分“走资派”的标准，既便于把广大革命老干部打成“走资派”，又可以保护象他们那样的真正的走资派，这就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制造了一个“根据”。

其次，“四人帮”的“小心的求证”，是夸大部分的东 西，用部分代替全体。毛主席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对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作了科学的分析，指出：“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⑥又说，“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⑦革命老干部，就是这个干部队伍的中坚。“四人帮”对干部队伍中出现走资派的问题不作具体分析，抓住出现一小撮走资派的局部现象拼命夸大，胡说“走

资派有一层人”，是“上下都有，到处在走”，以此否定整个革命老干部队伍。“四人帮”把革命老干部都打成“走资派”，这就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制造了又一个“根据”。

再次，“四人帮”的“小心的求证”，是歪曲特殊的东西，用特殊否定一般。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关系在发生变化。毛主席早就科学地分析了这些变化，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党内出现走资派，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决定的，是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四人帮”借口“研究”阶级关系“新变化”，极力加以歪曲。他们把出现走资派说成是出现一个“党内资产阶级”，鼓吹“革命的对象在党内，革命的动力在党外”。鼓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造反派同走资派的矛盾”，把“走资派”当成是“革命的主要对象”。他们通过歪曲、夸大特殊的东西，完全颠倒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篡改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否定了党的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否定了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四人帮”篡改了走资派的科学概念，扩大了“走资派”的范围，又把“走资派”全部当作敌我矛盾，当成“革命的主要对象”，这就用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取代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他们把革命老干部统统打倒，篡党夺权，再炮制了一个“根据”。

列宁指出：“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①“四人帮”的“小心的求证”，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抓住事物的某一点、某个方面、某些部分，加以曲解和夸大。这样，他们得出的结论必然是荒谬的，必然歪曲事物的性质和全貌。毛主席批判“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正是极其深刻地揭露了他们这种方法的基本特征。“四人帮”的形而上学的片面性是同实用主义紧密相联的。他们大搞实用主义必须借助于片面性，大搞实用主义又必然陷于片面性。同时，他们大搞片面性，割裂事物的相互联系，割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整体系，择其所“要”者而“用”之，也是以他们的一切为了实用的原则为指导的，是为他们大搞实用主义，推行其反革命政治纲领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四人帮”的反动世界观就是以实用主义为中心，以片面性为表现特征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结合。这也就是“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哲学基础。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6页。

② 《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348页。

③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67页。

④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1页。

⑤ 转引自华国锋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⑥ 同上。

⑦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7页。

⑧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评为篡党夺权服务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核心

卓 炯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炮制了一套假左真右的理论。这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理论，集中反映在他们组织编写的、在上海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一部反党反社会主义、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的政治经济学。这本书，在广东流传颇广，流毒甚深。我们有责任进行批判。这是捍卫马克思主义，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需要。

“四人帮”这伙不学无术的政治骗子，虽然不懂得半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是很知道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及其重要性，如果能在在这方面提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根据，对于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很有好处。他们自我招供地说：“这本书如能站得住，其他问题就好办了。”在这本书中，“四人帮”打着宣传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幌子，居然恶毒地把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实质，歪曲成为一个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胡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既有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也有衰亡着的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资产阶级法权“存在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存在于商品制度和按劳分配中，也就是存在于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整个过程中”，因而它成为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所谓“党内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并由此得出一个政治结论：要“对资产阶级实行长期的全面的专政”。可见，“四人帮”的这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就是以所谓“资产阶级法权”为核心的理论体系。

要揭穿这个理论体系的反动实质，必须正确理解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极其精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个人消费品分配方面实行按劳分配的必然性。当他在谈到按劳分配的平等权利时说：“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

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页）。在分析资产阶级权利的实质之前，我认为应该把资产阶级权利理解为上层建筑的东西。因为马克思明白说过：“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恩格斯也说，权利起源于经济关系，起源于人们的生活条件。列宁进一步把法权说成是“规范”，他指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按劳分配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之后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以外，没有其他规范。所以在这个范围内，还需要有国家来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可是，“四人帮”为了搞政治阴谋，竟然把作为上层建筑的资产阶级权利，说成是经济基础。其次，我们应该明确，马克思说按劳分配这种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权利，是同历史上早已存在的“商品等价物的交换”进行对比分析而作出的论断，它并不体现资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权利，反映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在按劳分配方面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即在资本主义所有制条件下的资产阶级权利。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按劳分配，首先是一种平等的权利关系，即劳动平等和分配平等的关系。但是，每个劳动者的劳动是不相等的，大家都以同一的劳动尺度来计量报酬，对于不同的劳动者来说，就是不平等的，就会产生富裕程度的差别。这种生活富裕程度上的差别，不是阶级剥削的结果，而只是按劳动分配个人消费品的结果。可是，“四人帮”炮制的这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却把“资产阶级权利”同“资本主义因素”等同起来，把它塞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去，胡撰了一个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二重性”的谬论，说什么“刚刚从资本主义母胎中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一种不成熟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它一分为二，既有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又有衰亡着的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这是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理论”。

为了进一步攻击、丑化社会主义制度，这本书还根据一九七五年张春桥的那篇反党文章提出的论点，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大做所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为了清除流毒，这方面的问题必须多说几句：

第一，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这本书胡说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还没有完全取消”。这个问题，列宁早有定论，说社会主义已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已经不存在了。可是这本书却提出一个与列宁完全相反的论点，说：“长期以来流行一种看法，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一旦建立，所有制问题就完全解决了。这种看法的错误是，把所有制仅仅看成是一种物，是单纯的厂房、土地、机器、工具、原料等生产资料，以为这些物原来在资本家手里或者在私人手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把它拿过来，问题就解决了。”马克思主义者从来认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且，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起来之后，还有进一步完善、巩固的问题，围绕着所有制问题，存在着尖锐复杂的两个阶级、

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主张在经济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逐步地从公有化程度比较低的形式过渡到公有化程度比较高的形式。“四人帮”炮制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所有制问题上进行毫无根据的攻击，是反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行为。

他们为了证明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公有制范围内没有完全取消，便捏造了两个论据，一是说：“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结合，还要受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这一旧社会分工的束缚，只要这种旧社会分工仍然存在，管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就仍然是‘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二是说：“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在生产、经营上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相互之间存在着你我界限，要取得对方产品仍然要通过商品交换的方式。……这种情况表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还保留着某些旧社会的传统或痕迹，保留着反映这些传统或痕迹的资产阶级法权。”这两个论据都是荒唐的、站不住脚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它确实是旧社会分工的痕迹，斯大林同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本质差别”。但是这种“本质差别”，不是阶级差别，因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都是社会主义劳动者，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是党的依靠力量，绝不是什么统治劳动者的“特殊阶层”。“四人帮”炮制的这本书如此恶毒咒骂、攻击脑力劳动者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党在社会主义企业中的管理人员以及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打成“特殊阶层”，当作“资产阶级”而对他们实行法西斯的“全面专政”。至于谈到国营企业仍然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来说，试问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难道可以把一个社会变成一个不要核算的单位吗？国营企业的“相对独立性”，是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实行统一的计划经济的需要，是实行经济核算的必要。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之间的“你我界限”，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个资本家的企业之间的“你我界限”，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能相提并论，是非常明显的。

对于商品生产和交换，也应该同一定的所有制联系起来考察。是商品，就有价值；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一点，不管是哪一个社会形态都一样，就是说必须等价交换。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交换，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商品制度，同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这是说商品的共性。但是区别事物的性质，就应该研究事物的个性。众所周知，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交换，跟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本质上是不同的。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计划按比例地进行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它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互相竞争和无政府状态中进行的，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它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四人帮”对商品生产、交换及其中通行着的资产阶级权利，不作任何分析，并借此作为攻击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丑化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论据”，完全是枉费心机！

第二，在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方面，这本书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不表现为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认为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既然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那么新

的资产阶级就会不断地从一部分工人、农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党员中产生，以致在执政党内产生资产阶级。这个“党内资产阶级”，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越来越成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和主要力量，因而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主要是无产阶级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些谬论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社会主义社会，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如何产生出来，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地下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存在着资本主义因素。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是从这个旧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本书把新的资产阶级说成是从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中产生出来。试问：叛徒江青、国民党特务张春桥、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是从社会主义相互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吗？他们都是打进共产党内或从共产党内拉出去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典型的正在走的走资派。这一类走资派，包括他们的死党、余党、亲信之类在内，也只是一小撮，不能也不可能构成一个“党内的资产阶级”。毛主席作出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是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阶级属性，绝不是说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如果党内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那就意味着党的性质已蜕变了，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了，变成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政党了。“四人帮”捏造的所谓已经形成一个“党内资产阶级”的“理论”，完全是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打倒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而制造的口实。

第三，在分配方面，这本书歪曲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特别露骨、猖狂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在阐明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时，明明白白地说：“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权利’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51页）“四人帮”却把列宁的这一思想，篡改为“资产阶级法权”在整个分配领域中占统治地位。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按劳分配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当然是主要的原则；除此之外，还有对劳动者的物质保证原则，如举办各种劳动者的集体福利事业，等等。“四人帮”炮制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方面，最恶毒的还是竭力歪曲马克思、列宁的按劳分配理论，竭力歪曲按劳分配存在的资产阶级权利，胡说什么“资产阶级法权”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命根子”，把级别高、工资多当作划“走资派”的经济标准，把党政军某些干部同广大工农群众在工资收入上的某些差别，同阶级剥削混为一谈，这是他们推行的“老干部 = 民主派 = 走资派”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我们已经日益看清了“四人帮”的恶毒用心。他们用假左的手法，大肆鼓吹平均主义，破坏按劳分配，极大地挫伤了工农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已造成多年来国民经济的停滞甚至倒退的严重后果。

这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二重性”的反动观点贯串全书。当他们谈到“二重性”时，又特别突出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当他们谈到社会主义的经济范畴时，也不惜加以歪曲、丑化，给它盖上资本主义的图章。这样一来，在社会主义的

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过程中，“资产阶级法权”无处不在，新的“资产阶级”无处不生。按照这个反动透顶的逻辑，社会主义一无是处，社会主义“必然”倒退，资本主义必然复辟。什么社会主义的前途、党的伟大理想都不存在了。所以说，这本书完全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毛主席早已教导我们：“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页）当然，“四人帮”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恶毒之处，不仅仅在于不择手段地诋毁社会主义制度，其要害是打着批判所谓“资产阶级法权”以及“党内资产阶级”的旗号，进行其反革命活动，打击、诬陷我们的革命领导干部，以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这本书作为“四人帮”的殉葬品，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它告诉人们，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一件多么重要而又迫切的工作。我们一定要通过批判、斗争，把毒草变成肥料，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切切实实地使我们的经济科学研究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实现我国宏伟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服务，为实现我们共产党人的伟大理想服务。

广东社联恢复活动

在广东省委的领导和关怀支持下，广东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于今年一月初恢复了工作。

一月四日至五日，举行了社联全体委员（扩大）会议，揭批“四人帮”，讨论、制订一九七八年工作计划，并补选广东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和各学会的领导成员：社联主席：陈越平；付主席：李超、张江明、林江、黄庄平、聂菊荪、王越、商承祚、陈健、张华明、廖建祥、孙儒、黄礼、李又华、梁集祥、汪涛，常务付主席兼秘书长王致远，付秘书长叶于林。哲学学会会长张江明，第一付会长王致远，付会长刘嶸、梁木、史丹、潘若、龙世雄；经济学会会长黄庄平，第一付会长孙儒，付会长杨繁、陈应中、郑黎亚、王琢、梁钊、卓炯、蔡馥生；历史学会会长金应熙，付会长李锦全、宋维静、郑文霞；教育学会会长梁嘉，第一付会长梁集祥，付会长李又华、王越、罗潜、饶璜湘、黄焕秋、汪德亮；语文学会会长商承祚，付会长吴三立、戴镛铃、王起、高华年；图书馆学会会长梁家勉，付会长赵平、连珍、叶佩华。

社联遵照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伟大战略决策，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在今年二、三月间，组织了多次座谈讨论，从理论上对“四人帮”进行深入批判。哲学学会组织了对“四人帮”假左真右的批判；经济学会组织了对“四人帮”诬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复辟资本主义的批判；历史学会组织了对“四人帮”大搞影射史学的批判；教育学会和语文学会分别组织了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和“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图书馆学会组织了对“四人帮”破坏图书馆工作罪行的批判，等等。

在上述活动基础上，社联最近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批判会，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对“四人帮”进行深入批判，揭发批判了我省那个曾以研究中国哲学史著称的教授的丑恶表演，以求正本清源，把被颠倒了理论纠正过来，进一步砸烂精神枷锁，解放思想。

为了繁荣学术，促进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在各项学术活动中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联各学会分别举行了有关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和任务等问题的讨论，并邀请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林子力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荣孟源同志、北京图书馆副馆长丁志刚同志分别作了学术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尹达同志来穗时，也曾与我省部分史学工作者举行了座谈。

驳“四人帮”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二重性”的谬论

黄 震 周 树

“四人帮”授意原上海市委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株彻头彻尾的大毒草。这本书开宗明义宣称，编书的目的是要“分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形成发展和消灭的过程”，而“认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二重性，则是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新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形成的前提”。可见，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二重性”的“理论”，在这本书中占着何等重要地位。因此，有必要加以剖析。

一

这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写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表现出二重性；一方面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一方面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传统和痕迹，由此形成一个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此长彼消或彼长此消的矛盾运动过程。”他们硬说这是从列宁那里找来的论点。其实，这是对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的公然歪曲。

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与政治》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列宁选集》第四卷，第84页）列宁这段话，精辟地论述了过渡时期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深刻地说明了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基本特点。什么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列宁写道：“说劳动在俄国已按共产主义原则联合起来了，第一是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废除；第二是因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在国有土地上和国营企业中组织着大生产，把劳动力分配给不同的经济部门和企业，把属于国家的

大量的消费品分配给劳动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85—86页）可见，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就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至于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列宁指的是资本主义的投机商，同时也指出小商品经济是一个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这种衰亡着的资本主义明明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外，“四人帮”却把它塞进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内；明明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你死我活的斗争，“四人帮”却把它说成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彼消此长的斗争。这是多么无耻的歪曲！

必须指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的整个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不仅存在着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且还会存在非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革命导师从来没有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混同起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理论，着重地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为的要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要消灭资本主义。而当他论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存在的旧痕迹时，则明确指出这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人们思想觉悟还未达到共产主义高度的结果。他根本没有把过渡时期必须打击和消灭的资本主义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中需要保护的资产阶级权利等同起来。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大量著作中反复地指出，要战胜资本主义，不仅要依靠无产阶级政权，还要依靠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他总是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看作是同衰亡的资本主义斗争的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

“四人帮”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歪曲了列宁过渡时期的学说，也歪曲了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它写道：“刚刚从资本主义母胎中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一种不成熟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它一分为二，既有生长的共产主义因素，又有衰亡着的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它们一面相对立，一面相联结，由此构成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的特点。”在这里，他们居然把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所分析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歪曲成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同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又相对立、又相联结的矛盾。其实，他们的谬论，同毛主席的光辉论断，毫无共同之处。

第一、毛主席说的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又相适应又相矛盾，而相适应是基本的。而“四人帮”说的“二重性”，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同衰亡着的资本主义的矛盾。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有这个矛盾，它怎么能和生产力有相适应的一面呢？

第二、当毛主席讲到不相适应时，讲的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某些环节的不完善。毛主席说：“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74页）这里讲的，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完善与不完善的问题。而“四人帮”所讲的则是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根本不是

什么完善不完善的问题。

第三、毛主席明确指出，这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73页）这就是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也会相应的提高，共产主义在它自身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会不断地从不完善到完善。而“四人帮”却把这些不相适应的部分，说成是“此消彼长”或“彼消此长”，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的对抗性矛盾。

“四人帮”这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明明存在的资本主义经济残余闭口不谈，却硬说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有资本主义因素，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诬蔑为半是共产主义半是资本主义的混合物。这就充分说明，它是一本保护资本主义，诽谤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

什么是“四人帮”所说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因素？这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写得很明确的。他们说：“这种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存在于商品制度和按劳分配中，也就是存在于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整个过程中”。这就是说，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等于资产阶级法权，而这个资产阶级法权，又存在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和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四个环节中。这样一来，衰亡的资本主义因素不但存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而且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

到底应该怎样看待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旧痕迹？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但是，“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0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详细解释了马克思的思想，他说：“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末‘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而这是因为，“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55—256页）显然，马克思和列宁在这里所说的“痕迹”，是新社会中的旧痕迹，是新生的婴儿身上的母斑。而“四人帮”却把它诬蔑为衰亡的资本主义因素，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借以产生和存在的经济基础。

其实，资本主义经济的残余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旧痕迹根本不同。前者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外的异己力量，它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只能起腐蚀瓦解作用。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旧痕迹却不相同，它存在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是新的生产关

系的一个特点。它的存在，并不是由于一时未被消灭，而是由于它具有存在的客观条件，有存在的必要性。就拿按劳分配所实行的等价交换的原则来说，尽管这种资产阶级权利所体现的形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事实是一种“弊病”，带有旧社会的“痕迹”，但马克思并没有把它说成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残余；相反，马克思一再说明，这种分配制度，由于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它同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1页）这就说明它完全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

列宁指出：“无论在自然界或在社会中，实际生活随时随地都使我们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56页）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否定，是指对旧事物的质的根本否定，而不是指对旧事物一切因素的全盘抛弃。既然一切新事物都是从旧事物内部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和旧事物之间必然存在着联系，和旧事物没有任何联系的新事物是没有的。辩证的否定不是简单的抛弃，而是扬弃。社会主义从根本上否定的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以及维护剥削制度的反动的上层建筑，并没有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一切东西。比方说，对商品生产，就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在其旧有的形式上赋予新的内容，使它成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这种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就是带有旧痕迹的社会主义新事物，它和旧事物是有本质区别的。

这里对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残存着旧事物同新制度中存在着旧痕迹（或旧形式）的分析，不仅有理论上的必要，并且有现实的意义。比如，我们对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利用城乡商品流通搞投机倒把，则坚决打击，而对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则大力发展，就说明这一点。

再就旧社会分工这个问题来说，本来，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早在奴隶社会就出现了。它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当然，在私有制社会里，它一般地体现为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脑力劳动被利用来为剥削阶级服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由于所有制变更了，它不再体现为阶级剥削的关系，而体现为劳动人民之间的分工协作的关系。就其形式来说，仍然是旧社会的痕迹，但就其阶级内容来说，根本不同于以往社会的分工。“四人帮”却抓住旧社会分工这个形式，诬蔑它是产生脑力劳动者统治体力劳动者的经济基础。他们胡说：“在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直接生产者（体力劳动者）接受少数管理者（脑力劳动者）的意志而进行生产活动的情况。”“这种旧的社会分工的存在，是产生‘一长制’这种脑力劳动者统治体力劳动者的经济基础”。接着就推出一个结论说：“一个在生产中处于统治地位的，按照资本主义原则组织生产活动的资产阶级，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出现了”。根据这个推论，就等于说，旧社会的分工 = 脑力劳动者统治体力劳动者 = 厂长和经理统治工人 = 走资派的所有制的产生。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企业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关系的性质，不是由社会分工决定，而是由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所以成为管理者，首先是因为他

是资本家。但是按照“四人帮”的逻辑，恰好相反，倒是因为他是管理者，所以才成了资本家。这是多么荒唐的逻辑！

当然，这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旧痕迹，随着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它是要逐渐消亡的。但这个过程，绝不象“四人帮”所说的那样，是什么“此长彼消”或“彼长此消”的矛盾运动过程，而只能象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是共产主义“在它自身基础上”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最终必将导致一切资产阶级权利旧痕迹的彻底消亡。如果按照“四人帮”那套“此消彼长”或“彼消此长”的逻辑否定按劳分配，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否定脑力劳动的积极作用，对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统统打倒，那就只能给社会主义带来灾难。

“四人帮”把它炮制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旧痕迹等于资本主义旧事物这个反动命题，塞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和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四个环节中，其阴谋就是妄图把社会主义经济都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旧事物，都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以达到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纵观这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全书，几乎社会主义经济各个领域，只要同旧社会分工，同商品交换、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权利有关系的，都被他们污蔑为资本主义因素，都成了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

“四人帮”这本书，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旧痕迹说成是资本主义因素，从而构筑它的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二重性，并引伸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再生产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制造理论根据。这就充分说明，它是一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书，是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一个罪证。

奖金制度与按劳分配

施 烈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原则。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和奖金是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所采取的形式。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硬要取消奖金制度，把社会主义奖金制度污蔑为修正主义奖金挂帅。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必须划清社会主义奖金制度与修正主义奖金挂帅的界限，给奖金制度恢复名誉。

奖金制度体现了按劳分配原则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决定分配。由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灭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劳动者成为国家和企业的主人，企业领导人与工人的关系不再是雇佣关系，消费品的分配不再是工人靠出卖劳动力、资本家按资本瓜分剩余价值。这是人类社会的一大飞跃。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物质财富还不丰富，人们的思想觉悟还没有达到把劳动作为第一需要，所以个人消费品的分配还不能实行按需分配，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所以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目前，在我国的一些企业中实行的奖金制度，是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一种补充形式。列宁早就指出：“在完全的共产主义制度下奖金是不需要的，但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代，如理论和苏维埃政权一年来的经验所证实的，没有奖金是不行的。”（《列宁全集》第29卷第91页）为什么必须以奖金制度作为贯彻按劳分配的补充形式呢？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是不依人们意志转移的客观规律。产品分配制度是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它也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社会主义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生产劳动仍然很繁重，各个工种工序之间的繁重程度、复杂程度、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仍然存在很大的差别，各个劳动者的科学技术水平、生产经验和劳动熟练程度也有差别。既然存在差别，就要在分配上承认这些差别，才能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有利于生产的发展。要做到这点，就

必须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上采取适当的形式，贯彻多劳多得的原则。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都是好形式。但是，在劳动时间相同，或完成工件相同的情况下，还存在原料、燃料、电力的消耗有多有少，安全操作有好有差，技术革新有大有小，协作精神有高有低等等的差别。因此，在原有的工资之外另发节约奖、安全奖、技术奖、协作奖等等，可以更准确、更及时根据劳动者的劳动表现给予补充报酬，弥补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的不足，大大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马克思说：“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哥达纲领批判》第15页）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同志关系，决定了劳动者个人与集体的根本利益一致的关系，因而决定了实行体现按劳分配制度的工资加奖励的具体形式。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工人是企业的主人，不再存在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关系。一个工人积极劳动，社会物质财富就增多。国家从增多了的物质财富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奖金，奖励那些先进生产者和劳动积极分子，显示了社会对积极劳动的表彰。这样就必然会带来连锁反应，贡献愈来愈大，创造发明愈来愈多，生产能手成批涌现，物质财富与国家积累就会加速增多。

第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关系调节权利概念。当社会生产力还没有达到“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生产关系还存在三大差别的情形时，必然决定着社会意识未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群众中的多数就很自然地把劳动作为谋生手段，作为计量权利的同一尺度。当然，也有不少先进分子把劳动作为第一需要的。但是不能因为有这些先进分子便认为社会全体成员都可以这样。应当看到，人们有关心个人物质利益的意识是必然的，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而且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关心个人物质利益，同关心自己劳动成果，是一致的，密切相关的。如果说有矛盾，也只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采取适当形式更有效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包括实行奖励制度，正是解决矛盾的途径。实行奖励制度时，只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好，把精神鼓励同物质鼓励结合起来，以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就必然会促进劳动者更加关心社会主义劳动成果，思想觉悟不断提高。

最后，多劳就多消耗，就应该有物质补充。那些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的先进工人，那些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钻研科技的革新者，显然付出了较大的体力、脑力劳动消耗。对他们除了精神上给予表扬外，再给予一定数量的奖金，从物质上补偿消耗，也是促进生产力发展所必要的，也是革命的需要。

许多事实证明，在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前提下实行奖金制度，进一步贯彻了按劳分配原则，有利于发挥职工的劳动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社会主义建设。

划清奖金制度与“奖金挂帅”的界限

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奖金制度与苏修叛徒集团推行的修正主义“奖金挂帅”，本来是

截然不同的。由于“四人帮”的破坏，搞乱了是非，一提奖金，就不分青红皂白统统视为修正主义。因此，搞清楚社会主义奖金制度与修正主义“奖金挂帅”的区别，是很重要的。

首先，政治路线不同。无产阶级在实行社会主义奖金制度时，强调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教育广大劳动者树立当家作主的精神，正确认识国家、集体同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利益的辩证统一关系，教育他们学习大庆人、大寨人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不怕苦、不怕死、不为名、不为利，各尽所能，为社会主义多做贡献。在这个前提下，国家和集体对于做出优秀成绩的劳动者给予表扬和奖励，是为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服务的。

资产阶级在推行修正主义奖金挂帅时，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根本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地位，以金钱为钓饵，用奖金作为刺激群众积极性的唯一手段。他们用金钱去腐蚀群众思想，瓦解他们的革命斗志，使他们斤斤计较个人利益，忘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胡里胡涂地沦为雇佣奴隶。苏修就是这样干的。

其次，所反映的生产关系不同。一个是奖金数量只占多作贡献中的小部分，体现着劳动人民和国家之间、获奖者和不获奖者之间利益一致的同志式关系，一个是奖金数量超过获奖者的贡献，体现着获奖者占取别人劳动的资本主义剥削关系。马克思告诉我们：“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化为质的区别。”（《资本论》第一卷第342页）苏联搞的“奖金挂帅”，反映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他们利用特权攫取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和高补贴，占去比劳动人民高出上百倍的收入，而广大劳动人民则重新沦为雇佣奴隶，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得微薄的工资和奖金。

斥“四人帮”对奖金的诽谤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目的，肆意攻击按劳分配原则，给奖金制度捏造了许多罪名，炮制了“奖金=奖金挂帅”的反动公式，公然否定社会主义的奖金制度。

“实行奖金制度会扩大等级差别，导致阶级分化。”这是“四人帮”一伙的一根棍子。什么叫阶级分化？个体小生产者两极分化为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是一种阶级分化。它必须有前提条件，那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商品经济和劳动力成为商品。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不容许存在的。按劳分配及其奖金形式，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等于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会产生资产阶级，这是来自如投机倒把之类的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来自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凭多劳而多得的货币工资和奖金，只能用来购买消费品，不准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不能转化为资本。有谁领了几元奖金便变成资产阶级分子？说什么实行奖金制度会导致阶级分化，扩大等级差别，都是无稽之谈。“马克思主义所了解的平等，并不是个人需要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平均，而是阶级的消灭。”（《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14页）差别的存在，是由现阶段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我们党历来反对扩大差别，而又承认一定的差别，为的是更好

地创造条件逐步缩小和消灭差别。如果借口防止生活上的差别，鼓吹搞绝对平均主义，那就等于奖励懒汉，就会挫伤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才真的是导致资产阶级复辟。

“实行奖金制度会腐蚀工人群众，滋长个人主义。”这是“四人帮”一伙的另一根棍子。他们竟然把属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按劳分配形式之一的奖金，跟属于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之一的个人主义扯在一起，真是荒唐。“四人帮”总是惯于把社会主义事物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土壤”、“基础”、“滋生基地”，抡起大棒打个精光，扫清道路，好让女皇登台，叫真正的资本主义畅通无阻。奖金果真是“腐蚀剂”吗？这要作具体分析。奖金有资本主义奖金，社会主义奖金。资本主义奖金象资本主义工资那样是一种剥削手段，一种更毒辣的钓饵。资产阶级玩弄着它，要工人为资本家卖命，创造更多剩余价值。他们还用它去收买工人贵族，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破坏工人运动。而社会主义奖金却是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具体形式之一。按劳分配正是个人主义的对立物，是消灭剥削、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强大力量。怎能颠倒黑白地说它腐蚀工人的思想呢？如果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反而不利于克服个人主义。

“实行奖金制度会造成工人内部不团结，分裂工人阶级队伍。”这是“四人帮”一伙的又一根棍子。有的单位在实行奖金制度中出现过一些不团结的现象，原因是领导掌握情况不全面，劳动生产定额不合理，不注意做过细的政治思想工作，等等。怎么能因工作没有做好就否定奖金制度呢？实践证明，正确地实行奖金制度，能够促使劳动者自觉遵守劳动纪律，努力钻研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先进帮后进，进一步加强工人内部的团结。相反，“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才真正是造成工人内部分裂的原因。

“四人帮”对奖金的百般污蔑，恰好证明了社会主义奖金制度是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是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有效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措施。

就黄埔港的实践斥“四人帮” 对计件工资制的攻击

曾牧野

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正确实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是一项重要工作。一九七三年十月，交通部广州黄埔港务局根据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指示，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原则，在装卸工人中重新试行计件工资制。至今已四年多，取得良好效果：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七年同一九七二年（实行计时工资制）比较，平均年港口吞吐量，增加了21%；装卸工人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0%；装卸工人年平均使用人数减少了403人；平均每千操作吨的工资成本（装卸总成本中的工资支出）下降了12.2%；装卸工人月平均实收工资增加了14.2%。四年来，该港增加了生产总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节约了劳力，降低了成本，还适当改善了工人的生活。这些成绩说明，在装卸工人中重新试行计件工资制，是一个有成效的社会主义实践。

可是，这件事情从开始到“四人帮”垮台，却一直遭到“四人帮”及其反动喉舌们的攻击。“穿新鞋走老路”、“物质刺激”、“修正主义路线回潮”、“强化资产阶级法权”等等帽子，铺天盖地压下来，流毒又深又广。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予以驳斥，分清路线是非、理论是非、思想是非。

—

“四人帮”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所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谁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正确的做法，就给谁扣上“复旧”的帽子，说是走“修正主义”的“老路”。这完全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诋毁无产阶级专政，诬陷革命干部的别有用心之徒的谬论。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在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尽管存在着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仍然占主导地位。在工资问题上，

也同样基本上贯彻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某些单位忽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政治思想工作做得不够，这只能说明工作上的缺点，不能归罪于社会主义的工资制度，不能归罪于按劳分配原则。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几年，黄埔港装卸工人的工资制度，一般采用有限制的计件工资制，其基本内容是：计件工资加奖励（以安全、优质作为考核的主要内容，每月评奖一次，得奖者发给十二元五角）加补差工资（老工人）。实践证明，实行这种工资制度，适合当时港口装卸作业的特点（以笨重的体力劳动为主），比较符合按劳分配的要求。情况最好的年分，是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六年间。当时在实行计件工资制的过程中，重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工人觉悟有所提高，干劲很大，港口面貌很好。

一九七三年十月，在装卸工人中重新试行的计件工资制，同文化大革命前比较，有点差别，有所创新，但基本精神是一样的。其做法是：计件工资加计时工资加补差工资。（一）计件工资部分：以班组为单位，按完成作业量的多少，按规定单价支付工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班组内部实行合理分工，使每个工人从事重活与轻活的作业机会力求均衡。班组将所得工资收入，按日或按旬、月在组内平均分配。对于难以计量的散装货，则实行“大集体计件”，以船为单位，把任务包给某一个作业中队（约二百人）去完成。（二）计时工资部分，即保留装卸工人原来的等级工资标准，作为支付一些难以计量或无量可计的任务的工资依据，以及支付工人因公临时脱产、伤病、探亲、节日加班等情况下的工资依据。这一条，与文化大革命前的做法有所不同。（三）补差工资，是保障老工人原来的工资水平不致因为重新试行计件工资制而降低。凡本人等级工资超过计件工资测算水平（交通部批准，定为七十元）的差额部分，每月给予固定的补差。例如，某个老工人原来的等级工资为八十九元，重新试行计件工资制以后，除计件的收入外，每月给予十九元的固定补差。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对劳动者的物质保证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样做，也有利于青年工人与老年工人之间的团结。

可见，黄埔港装卸工人重新试行计件工资制，根本不是什么走修正主义的老路，而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毛主席教导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0页）判断我们所采取的工资政策是否正确，也应如此。

二

“四人帮”及其喉舌们攻击计件工资制是什么“物质刺激”，也纯属污蔑之词。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要调动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当然应该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提倡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为革命多作贡献；但是，政治思想教育不能代替必要的物质鼓励。毛主席明确指出：“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

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2页）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按劳分配原则本身，就是对劳动者采取必要的物质鼓励的一种措施。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不论是计时工资，还是计件工资，都是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劳动报酬形式，都体现了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至于在企业中，采取何种工资形式，才能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应该根据企业本身的特点、条件以及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建国以来，黄埔港装卸工人的工资制度有过几次演变。实行计时工资制时，生产上不去，劳动效率低；改行计件工资制时，经济效果就好。这就说明，在不同的企业采取不同的或多种形式同时并存的劳动报酬形式，正确实行按劳分配，是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再说，革命导师也历来对计件工资制持肯定的态度。列宁一九一八年四月在《关于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的六条提纲》中写道：“现在，特别是加强劳动纪律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措施提到日程上来了”，要求对在这方面已经采取的步骤，“例如，实行计件工资”等等，“应当全力予以支持、巩固和加强”。（《列宁全集》第27卷，第292页）毛主席早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主张在边区公营工业中，实行计件工资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主席也明白说过，我国的工资制度，以计时为主，计件为辅；还肯定了基本工资（即计时工资）加奖励的工资形式。英明领袖华主席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阐述了毛主席这一思想，并指出要对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差的工种实行岗位津贴；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要把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结合起来，以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四人帮”及其喉舌们，污蔑计件工资制是什么“物质刺激”，完全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叫嚣。

我们同“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有着深刻的根源。历史唯心主义认为思想动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思想不是本原的东西，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是阶级斗争。而社会上敌对阶级的斗争就是由于它们的阶级利益是相互冲突的。共产党人公开宣布自己的一切行动都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所谓利益，归根到底是物质利益。当然，当我们讲到劳动者的物质利益的时候，是以整体的长远的利益为前提的，但不能忽视劳动者个人的、局部的、眼前的利益。实行按劳分配调动了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既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又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充分体现了把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的原理。“四人帮”把计件工资当作“物质刺激”加以攻击，实质上是在攻击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利益观。“四人帮”是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结成的反革命黑帮，他们不顾群众死活，自己却过着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他们是窃国大盗、吸血鬼，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死敌。

三

“四人帮”还攻击实行计件工资制会“强化资产阶级法权，扩大差别”。（按：“资产阶

级法权”一词，应该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讲到的这个权利，是指等量劳动和等量劳动相交换的权利。马克思把这种权利同历史上早已存在的商品等价物的交换原则进行历史类比之后，仅仅是当作一种形容词的比拟意义上，把这种等量劳动和等量劳动的交换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权利”。并不反映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四人帮”把“资产阶级法权”这个词的含义任意扩大，任意解释，把它说成是“资本主义的痕迹”、“资本主义因素”、“产生资本主义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其目的就是要为他们推行的“老干部 = 民主派 = 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提供经济理论根据。这方面已有人著文加以驳斥，在此不再多说。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强化资产阶级权利”的说法是不科学的。按劳分配中的这种权利——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相交换，是一种客观的要求，无所谓“强化”与“削弱”的问题。只能说：在实行按劳分配时所采取的某一种具体工资形式是否扩大了差别。从黄埔港的实践来看，重新试行计件工资制，装卸工人中工资收入的差别，不仅没有扩大，反而有了适当的缩小。过去在实行计时工资制时，作为生产骨干的中年工人与刚进港不久的青年工人每月工资都是五十元左右，存在平均主义倾向；中年工人与青年工人的工资收入同老工人相比，一般差别较大。重新试行计件工资制以后，青年工人平均每月工资收入约近六十元，中年工人平均每月工资收入约七十四元，老年工人平均每月工资收入约近八十元。差距不大。

至于“四人帮”所谓一搞计件工资，就会改变码头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使他们变成“吨位的奴隶”，更是荒唐的逻辑。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把工人阶级污蔑为“财迷”，不是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工作，而是为金钱工作，成为雇佣奴隶。其实，“四人帮”的这种“理论”，并不是新鲜货色。早在一九三六年托洛茨基写的一本书叫做《被背叛了的革命》，就是这样恶毒地咒骂按劳分配，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托洛茨基写道：“苏维埃国家就其一切关系来说，与其说接近共产主义，不如说远为接近落后的资本主义”，“甚至在苏维埃制度下，工资劳动也仍然带着令人感到羞辱的奴隶制标签。‘按劳分配’实行上牺牲体力劳动、特别是不熟练劳动而对‘脑力’劳动有利的一种工资支付办法，这种办法对多数人来说是不公平、压迫和强制的泉源”。“四人帮”在按劳分配问题上制造的种种谬论，不仅其思想观点，而且连语言也象托洛茨基。叛徒江青曾经向梁效们说：托洛茨基究竟怎么样，还不一定呢。这句私房话充分地表明他们同托洛茨基是一丘之貉。他们在分配问题上制造那么多假左真右的言论，是他们仿效托洛茨基，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进行反党反革命阴谋活动的表现。黄埔港的实践，以无情的事实，粉碎了他们的无耻污蔑。该港随着实行计件工资制，相应地加强了岗位责任制，建立和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从而有利于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工人作为码头的主人这一地位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他们说：港口运输增加了吞吐“吨位”，正是我们提高了觉悟，发挥了主人翁的革命精神的结果。“吨位”的增加，人民江山的巩固，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在。

驳梁效对贾谊“集权”思想的歪曲

罗 东 升

“四人帮”在大搞影射史学进行反党时，特别看中秦汉之际这段历史。他们连篇累牍地发表讲话、文章，歪曲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掀起了一阵阵篡改秦汉历史的恶浪，捏造了一场又一场的所谓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的神话，制造了复辟派都是儒家，反复辟派都是法家的谎言，把秦汉之际的历史践踏得面目全非。西汉前期地主阶级著名政治思想家贾谊，则是“四人帮”歪曲利用的主要人物之一。江青于一九七四年初，在一次黑会上，阴阳怪气地说：“文帝时有个很有名的法家”贾谊，“文帝这个人对贾谊是很欣赏的”。主子一开口，奴才满街走。“四人帮”的反动喉舌梁效，心领神会，立即接连抛出《法家人物介绍·贾谊》和《论贾谊》^①等黑文，狂叫贾谊无疑“是一个年轻有为的法家人物”，力竭声嘶地叫嚷贾谊主张维护中央集权制是“反复辟”，是执行同儒家“完全对立”的法家路线。事实果真是这样吗？否。这是“四人帮”别有用心的歪曲。

一

贾谊是西汉前期积极主张把统治权集中于中央，坚决制止和削弱与中央争权的各种势力的著名政治思想家。我们只要对贾谊“集权”思想的阶级本质，以及提出这种思想的背景和目的进行剖析，就可清楚地看到，贾谊提出“集权”的主张，是为了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加强和巩固地主阶级对人民的统治地位，以防止爆发农民起义，决不是什么“反复辟”。

秦汉之际是我国封建社会中阶级斗争波澜壮阔的一个时期。秦始皇“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统一了中国，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始皇极力强化这个国家机器，残酷地剥削农民，奴役人民，残杀人民，使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在短短十年左右就激化到白热的程度，终于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

地主阶级遭到农民起义第一次沉重打击之后，对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感到非常惊恐。它们的一些政论家都在总结秦亡的经验，寻求如何加强对农民的治疗。贾谊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指出，民治则国安，民乱则国危，与民为敌则国亡。他认为要解决当时的阶级矛盾，其根本办法在于为政“以民为本”^②，使“民治”。要使“民治”，首先，必须发展农业生产以“安民”，“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安民可与行义，危民易与为非”^③；其次，必须“轻赋少事”，“约法省刑”^④，同时，还必须“察吏于民”^⑤。他多次建议迅速采取这些“牧民”措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民乱”——爆发农民起义。

但是，当时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错综复杂，斗争十分激烈。有中央政权与地方诸侯王国的矛盾，有掌权的地主阶级与富商大贾的矛盾，有君与臣的矛盾，等等。贾谊认为矛盾很多，集中的表现是“天下之势方病大肿，一胫之大几如要（腰），一指之大几如股”，使中央政权，“平居不可屈伸”^⑥，国法不行，君令不施。而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本末舛逆”和“国制抢攘”^⑦。具体说，就是“诸侯王僭倨，地过古制”^⑧，和奸吏、豪强以及富商大贾“侈靡相竞”，“乱僭”“逐利”^⑨。贾谊认为，这种状况不改变，不但不利于贯彻实施他提出的“牧民”措施，加强对人民的统治，而且将进一步激化阶级矛盾，造成“万民离畔”^⑩的局面，很不利于加强和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

针对上述情况，贾谊积极主张必须“定地制”和“定经制”，使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势力，皆“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统治权集中于中央^⑪。

贾谊“定地制”的具体措施，就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为什么把封国分小，而不彻底废除分封呢？主要是由于贾谊认为诸侯王割据势力虽然可畏，但农民起义更可怕。他在总结秦兴亡的历史教训时指出：六国诸侯，“曾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仰关而攻秦”，结果，是“诸侯已困”，一败涂地。但这个“威振四海”的秦，却被“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的陈涉领导的农民起义所推翻。原因之一是，秦始皇在并吞六国之后，“废王道而立私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秦二世又不“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使“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⑫。所以，他批评秦始皇“不能分尺寸之地，欲尽自有之”^⑬；歌颂刘邦“割膏腴之地以王有功之臣”，“乃德至渥也”^⑭。但是，有一利却又生一弊。自汉初分王功臣子弟以来，先是异姓诸侯王“为逆者，乃几十发”^⑮，接着又“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向而击”，举行叛乱，“今吴又见告矣”^⑯，正在酝酿一场叛乱。又是什么原因呢？他说：“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⑰。诸侯之所以强，则是由于“制不定”，分封之地太大，不是分封制不好。他得出结论说：“地里早定，岂有此变”^⑱。在贾谊看来，如果象汉初那样，“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⑲，对中央集权是不利的；但若不分王功臣子弟，则中央一旦有难，农民起义一来，就会象秦一样孤立无辅，更加危险。他认为最“美”的办法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既实行分封制，又不让封国太大，这样，从消极方面说，可使诸侯王“势不足以专制，力不足以行逆”，从而“无背叛之心”，不敢反和不能反^⑳。从积极方面说，既可使“宗室子孙虑莫不王”，缓和统治阶级内部因争王而发生矛盾，又可使已被分封的诸侯

王“附亲轨道，致忠而信上”^②，奉公守法，为巩固中央政权加强对人民的统治效忠出力，更可以使“细民”看到统治阶级内部团结一致而“知安”和“向善”^③，不敢“犯上作乱”。可见，贾谊主张“定地制”，是要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加强对人民的统治，使汉免于重蹈秦之覆辙。

贾谊关于“定经制”的主张，则更加赤裸裸地暴露其防止农民起义的意图。所谓“定经制”，就是要确立严格的等级制度，“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维持皇帝的尊严，以达到“臣不逾级”，“贱不冒贵”^④，“奸邪盗贼自为止”^⑤，不发生农民起义的目的。

贾谊观察分析现状，认为有两种情况严重损害着皇帝的尊严，很不利于维护中央集权的权威，有导致“民乱”，发生农民起义的危险。

一是诸侯王的“等齐”。贾谊认为“别贵贱，明尊卑，等级、势力、衣服、号令也”，如果等级制度严密，“贵贱有级，服位有等”，即不同等级的人穿不同纹饰的衣服，臣属都“谨守伦纪，则乱无由生”（这里所说的“乱”，显然包括农民起义的“乱”）。而当时的情况却是“君臣同伦，异等同服”。“天子之相，号为丞相，黄金之印”，而诸侯王之相，也“号为丞相，黄金之印”；“天子卫御，号为大仆，银印”，而诸侯王的卫御，也“号为大仆，银印”；皇帝之妻，“号曰后”，而诸侯王之妻也“号曰后”。贾谊摆出这些现状后万分感慨地说：“妻既已同，则夫何以异？”意思说，诸侯之妻既可称后，那么诸侯王自己不就可称“皇帝”了吗？他认为，这样下去，必将导致臣“可以疑主”，即臣属敢与皇帝相比拟，相抗衡，和贱“可以冒贵”，即卑贱的人民敢反抗高贵者的统治阶级^⑥。

二是一些官吏、豪强和富商大贾的“侈靡”、“乱僭”。贾谊愤慨地指出：“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无制度”^⑦，弄得统治阶级内部礼义廉耻丧尽，一天比一天坏下去。皇帝身上只穿厚实的丝织物，大贾家里的墙壁却披着绣上花纹的绸缎；皇后用来镶衣领的花边，大贾们却用来装饰婢妾的鞋子^⑧，以侈奢浪费相夸耀；官场则十分腐败，大臣们对世风的变坏“恬不知怪”，无动于衷，一般的“刀笔之吏”，也只“务在筐箱”，写写公文，收收钱财，“而不知大体”^⑨，甚至出现了“居官敢行奸为富、为贤吏”的颠倒是非的怪现状^⑩；那些豪强，更是唯利是逐，毫不考虑自己的德行。他们为了“逐利”、“侈靡”，目无王法，巧取豪夺，甚至在白昼大都之中，抢劫金钱财物，无恶不作^⑪。

贾谊忧心如焚，指出这种恶劣风气，既使“君臣相冒，上下无别”，触犯皇帝的威严，削弱中央集权的权威，又将使“天下贫困”，导致“奸诈盗贼并起”，农民起义四处爆发。“故不可不急速救也”^⑫。贾谊开出拯救此弊的药方就是“定经制”，建立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设置这套制度，固然是要限制臣属的非法行为，加尊皇帝，但，也要使人民甘居“卑贱”的地位，束缚他们起来反抗的手脚。贾谊自己就讲得很露骨，他说：“等级既设”，又通过“建法以习之，设官以牧之（指人民）”，人民就会知道自己是天生的卑贱者，从而“定其心”，甘心忍受剥削和压迫。同时，限制他们的“侈靡”和巧取豪夺，也就可以缓和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这样，“乱”也就“无由生”了^⑬。显然，贾谊是要从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入手，进而加强对人民的统治，这哪里是什么“反复辟”。

因此,只要对贾谊的著作作全面的具体的分析,是完全可以看出他的“集权”主张的阶级本质的。梁效出于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一方面极力抹煞他的“集权”思想是在于解决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矛盾,加强对劳动人民统治的阶级内容,另一方面,又任意将汉初同姓诸侯王戴上“复辟”势力的帽子,从而虚构出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其实,汉初同姓诸侯王这股封建割据势力,虽然是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一个毒瘤,也是造成社会不安的一种媒介。但他们决不是梁效所胡说的奴隶主贵族的旧势力,也不是什么企图复辟奴隶制的复辟派。他们或是刘邦的兄弟,或是刘邦的儿子、侄子,依靠封建的地租剥削过活,是新的封建贵族。他们争为帝,只不外是封建地主阶级之间不断进行的财产再分配的斗争在政治上的表现。

二

贾谊主张限制和削弱诸侯王势力,建立等级制度,处理好君臣关系,把统治权集中于中央的“集权”思想,从思想渊源来说,虽杂有法家思想,但儒家色彩更加浓厚,是儒法杂揉的混合物,决非梁效所胡说的什么与儒家“完全对立”的法家思想。

战国末期,韩非集法家大成,首次提出以法、术、势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理论。秦始皇对韩非的理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接受这个理论,又总结春秋以来有些诸侯国建立郡、县的经验,在我国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西汉实行的基本上是秦的那一套政制。贾谊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虽积极维护这个政制,却提出了许多改进和完善这个政制,使它更能发挥加强统治人民的作用的措施。所以,他的维护中央集权的主张,既有别于韩非的理论,也不完全相同于秦始皇的做法。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所谓中央集权制,实际上就是君主专制独裁。法家韩非讲得最明白。他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②。他又强调说:“威势者人主之筋也”^③,“权势不可以借人”^④。要,就是权势,中央,就是君上。人君要统治天下,必须紧紧掌握权势,万不能假借于人。总之,韩非的集权于中央的主张,就是要君主实行独裁专制。秦始皇实践了这个主张,在统一全国之后,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建立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贾谊主张削弱诸侯王势力,又“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使君主“尊不可及”^⑤,神圣不可侵犯,也是为了维护君主专制。从这点来说,贾谊的“集权”思想似是继承韩非、秦始皇的法家思想。其实不然。

贾谊虽承认汉以来的既成事实,不反对实行郡县制,却强烈批评秦不封王功臣子弟是一个过失。说明他赞成分封制。梁效说贾谊虽在早年批评秦不实行分封,但后来在“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现实中”改变了观点。意思是说,贾谊在晚年就主张彻底废除分封了。事实并非如此。贾谊不仅在早年写的《过秦论》批评秦不“裂地分民”,到了晚年,在给汉文帝进献“长治久安”之策时,也仍然批评“秦不能分尺寸之地,欲尽自有之”。他死前一年,甚至还上疏建议汉文帝效法汉高祖“封建子弟”,扩大皇子在淮阳和代二国的封

地，以捍卫中央政权。

可见，贾谊在对待分封制的问题上，与秦始皇的态度显然不同。他在处理君臣的关系上，也与秦始皇、韩非有别。

贾谊、韩非都主张“忠君”，但不能因此说贾谊尊法反儒。因为，儒法两家都是主张“忠君”的。集法家思想大成的韩非说：“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上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如果“倍主强谏”，“臣不可谓忠”^⑤。主张绝对尊君。儒家的创始人孔丘也主张“臣事君以忠”^⑥。他们的主张都是要维护君主专制。儒法两家的思想，曾经代表两个不同的阶级，但他们都是剥削阶级，中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的思想是有共同之处的。所以，贾谊主张忠君，维护君主专制，就难以说是法家还是儒家的思想。

只有他在主张以“权势法制”对待一些臣属这一点上，颇有法家的精神。贾谊认为君如堂，臣如陛，等级分明。臣如“上僭者则诛”。他还说：“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对那些敢于“行逆”的诸侯王，决不能施仁行义，应当坚决以斤斧待之^⑦。梁效是很强调贾谊的“权势法制”的，但纵观贾谊的全部著作，可以看到这不是贾谊思想的主要方面。其主要方面是主张“刑不上大夫”。他分析秦亡的一个原因是秦始皇“酷刑法”，滥施权威，使“忠臣不谏”，“智士不谋”^⑧。所以，他大唱儒家的“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的调子，反对人君对臣施以“系、缚、榜、笞、髡、刖、黥、劓之罪”。他说，人君对臣随便“束缚之，系继之，输之司空，编之徒官”，让“司寇、牢正、徒长、小吏骂詈而榜笞之”，那么，老百姓看见君之臣可以随便被打骂，也就可以照样以系、缚等办法来对待君之臣了。这样下去，君之臣失去廉耻之心，那里还愿意为君效忠；君之臣威信扫地，那里还有君之尊严！因此，他与韩非的任臣以法，待臣以术的思想正相反，积极主张君待臣以礼。

韩非主张任臣以法，待臣以术。他说：“明君之蓄其臣也，尽之以法，质之以备（质其亲戚妻子以备其变）。故不赦死，不宥刑”，如果赦死宽刑，君的大权就会旁落，“社稷将危”^⑨。同时，他认为人君以法任臣还不够，还必须以术驭臣，才能保证人君的绝对专制，大权在握。他说：术者，“人主之所执也”，“君无术则弊于上”^⑩，故人君必须“固术而不慕信”^⑪。为什么呢？韩非认为“臣主之利相异者也”^⑫，君和臣的关系是利害对立的，君之利即臣之害，臣之利即君之弊，为了使君用臣随心和防臣害君，就必须驭臣以术。所谓“术”，就是人君“藏之于胸中”，不可公之于众的以驾驭群臣的阴谋手段。韩非认为，人君的意图绝不能让臣属知道，而群臣的一切言行，人君则应了如指掌。这样既能使臣尽心为君效劳，而又无害于君。秦始皇是信奉而且实践这一套理论的。有一次，秦始皇在山上看见丞相李斯“车骑众”，很不高兴。有人把秦始皇的心事告诉李斯，李斯即减车骑。秦始皇发现李斯的车骑突然减少，大怒说：“此中人泄吾语”，即“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⑬。

贾谊则多次指出秦亡的又一原因是君待臣“非礼”，又“不信功臣”。这实际上就是对

韩非、秦始皇以术驭臣思想的批判。因此，他继承孔丘“君待臣以礼”的思想^④。主张君要以礼待臣。他说，君若“迁之以礼”，则“群臣自喜”，一定“务节行而报其上”，使“法度之臣诚死社稷，辅翼之臣诚死君上，守卫捍敌之臣诚死城廓封境”，忠心耿耿为君效劳。如果“人主迁其大臣如迁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迁官徒（罪犯），彼将官徒自为也”。群臣都以犬马、罪犯自处，那么，一旦君上有危难，群臣就将袖手旁观或背叛他，甚至乘机起来争权^⑤。

由此可见，梁效鼓吹贾谊主张维护中央集权是与儒家“完全对立”的法家思想，全是一派胡言乱语，是别有用心的歪曲。

三

贾谊的“集权”思想是针对他所处时代的现实，鉴于秦始皇把统治阶级内部关系搞得太紧张，以至农民暴动一起，臣叛亲离和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而又“矫枉过正”，大封异姓同姓诸侯王，使“反者如翦毛而起”的教训提出来的。他主张集权于中央，但不主张权力过分集中于皇帝个人身上，他比较地着眼于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而不过分强调皇帝的个人专制独裁。所以，他既主张臣要事君以忠，又强调君要待臣以礼，既主张要使诸侯王没有足以行逆的政治力量，又强调要使他们有“足以奉养宿卫其身”的封地，能得到“饱粱肉之味，玩金石之声”的享受，以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强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使中央集权更能发挥统治人民的效用。因此，他的“集权”思想，比韩非、秦始皇的“集权”思想更适合西汉地主阶级加强和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需要。

虽然如此，我们应该尊重历史的辩证法，必须看到贾谊在所谓“太平盛世”的社会里，敏锐地发现统治阶级内部存在许多矛盾，认为这些矛盾将给国家、社会带来危害，从而勇敢暴露矛盾，揭露诸侯王割据势力的危害性，揭露豪强、富商的丑恶行为，提出要限制和削弱有害于维护中央集权的各种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总之，对贾谊的“集权”思想，既要有所肯定，又要有所批判。“四人帮”竭力掩盖西汉中央集权封建专制国家压迫人民的地主阶级本质，制造加强中央集权是反复辟的谎言，对贾谊的封建专制主义的集权思想顶礼膜拜，全盘肯定，把贾谊描绘成为一个“反复辟”的“年轻有为的法家”，除表明他们对马列主义和秦汉历史一窍不通之外，最根本的是他们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他们吹捧贾谊，是要借美化贾谊来美化他们自己，制造他们是当代“反复辟”“英雄”的假象，为他们大搞篡党夺权罪恶阴谋活动插上“革命”的标签。他们把汉初同姓诸侯王当作“复辟”势力来反，硬说诸侯王“为了复辟、倒退的反动政治需要，大都尊崇孔孟之道”，而孔孟之徒，有的成了诸侯王“阴谋叛乱的黑高参、黑顾问”，有的“投靠大地主阶级保守势力，钻进西汉中央政权”。极其卑鄙地以此影射攻击从中央到地方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四人帮”掀“现代儒”、“党内儒”和所谓

“走资派”、“复辟派”大造反革命舆论。这就是梁效炮制的《论贾谊》的要害所在。

① 载《北京大学学报》一九七四年第三、四期。

② 《新书·大政》(以下只注篇名)。

③ 《过秦论》。

④ 《修政语》。

⑤ 《大政》。

⑥ 《大都》。

⑦ 《数宁》。

⑧ 《汉书·贾谊传》。

⑨⑩ 《俗激》。

⑪ 《五美》。

⑫ 《过秦论》。

⑬ 《属远》。

⑭ 《亲疏危乱》。

⑮⑯ 《制不定》。

⑰ 《宗首》。

⑱ 《藩强》。

⑲ 《汉书·诸侯王表》。

⑳ 《五美》、《权重》。

㉑ 《数宁》。

㉒ 《五美》。

㉓ 《服疑》。

㉔ 《瑰玮》。

㉕ 《服疑》。

㉖ 《俗激》。

㉗ 《孽产子》。

㉘ 《俗激》。

㉙ 《时变》。

㉚ 《俗激》。

㉛ 《瑰玮》。

㉜ 《服疑》。

㉝ 《韩非子·扬权》。

㉞ 《韩非子·人主》。

㉟ 《韩非子·内储说下》。

㊱ 《阶级》。

㊲ 《韩非子·有度》。

㊳ 《论语·八佾》。

㊴ 《制不定》。

㊵ 《过秦论》。

㊶ 《韩非子·爱臣》。

㊷ 《韩非子·定法》。

㊸ 《韩非子·五蠹》。

㊹ 《韩非子·孤愤》。

㊺ 《史记·秦始皇本纪》。

㊻ 《论语·八佾》。

㊼ 《阶级》。

广东图书馆学会狠批“黑线专政论”

广东图书馆学会于二月一日召开了广州地区公共、高校、科研系统图书馆负责同志座谈会,联系图书馆战线的实际,愤怒批判“四人帮”精心炮制的“黑线专政论”,声讨他们对图书馆事业的干扰和破坏。

在座谈会上,一些两鬓斑白的老图书馆工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用新旧社会图书馆事业的鲜明对比,指出:十七年来,图书馆事业无论从方针任务、藏书建设、规章制度、干部队伍以及为社会主义三大革命运动服务和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等方面,毛主席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他们用大量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四人帮”的攻击和污蔑。

在座谈中,同志们揭发控诉“四人帮”大搞文化专制主义,对图书馆实行封、烧、抢的滔天罪行。多年来,“四人帮”把很多好书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打入十八层地狱。他们还以抓阶级斗争为名,极力反对图书馆为生产、教学、科研服务。在“四人帮”的摧残迫害下,图书馆无书可借,工农兵无书可读,广大教师科研工作者,也不敢登门。在“四人帮”一个亲信的所谓“没有图书馆照样搞科研”的谬论影响下,不少图书馆连续八年停订了各种专业期刊,造成了极严重的恶果。

到会同志一致表示,打倒“四人帮”,图书馆得解放,图书馆工作必须大于快上。他们决心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基础上,努力活跃图书馆学术活动,充分运用图书资料,积极为生产、科研和教学服务,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当好尖兵,作好后勤。

“四人帮”破坏教学工作的一根大棒

陈 飘

万恶的“四人帮”，为了使学校成为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在教育阵地上到处挥舞大棒，恣意践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极力破坏教育革命，造成教育质量严重下降。反“三中心”，就是他们经常挥舞的大棒之一。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运用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剖析“四人帮”所反的学校“三中心”，以分清是非，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对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迅速提高教育质量，为社会主义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材，是非常必要的。

“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抛出了“黑线专政论”和“臭老九论”，同时又把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学校教学工作归结为“三中心”加以攻击，力图全盘否定十七年教育工作成就。他们污蔑说：十七年学校的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是“资产阶级教育中那一套‘教师中心、课堂中心、书本中心’”，而这“三中心”则是“封、资、修教育制度的顽固堡垒”，是“培养‘三脱离’的精神贵族”。在“四人帮”流毒的影响下，批判“三中心”的叫喊喧嚣一时。结果，不少学校批了“教师中心”，教师的主导作用被取消了，教师不敢管学生了；一些学生“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乱冲乱撞，成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有棱有角的石头”。批了“课堂中心”，学校的课室关闭了，学生走出学校，开门办学变成开门捣乱，开门夺权。批了“书本中心”，课本搁置起来了，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书不读了，“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的黑文充塞学生的头脑，力图把学生变成“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交白卷的“英雄”。革命的教学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教学工作陷于混乱。“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兴高采烈地狂叫：“我们说就是要乱”，“学校秩序乱是正常的”！把学校搞乱，进而把社会搞乱，以便乱中夺权，这就是“四人帮”的罪恶目的。在“四人帮”反“三中心”大棒的挥舞下，我省不少学校深受其害，教学无计划，教师不敢教，课室满灰尘，课本不要了，学生四处跑，学校长满草，教学质量严重下降。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大家知道，学生是以学文化为主，教学工作是学校的主要工作。教学的任务，主要是系统地传授间接经验和理性知识。而间接经验和理性知识的传授，又主要是教师根据

教学大纲和教材的规定，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以课堂教学为主要教学形式进行的。在教学活动中，也要让学生参加一定的社会实践，取得直接经验，其主要目的还是为验证和巩固课堂教学所学的间接经验和理性知识，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统一。教学工作的特点，决定了教师、课堂、教材的重要性。学校教学之有教师、课堂、教材，正如工厂生产之有工人、厂房机器、原料一样，不可缺少。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广大学校坚持了教学工作的特点，取得了很大成绩。十七年并没有人提出和主张过要在教学工作中搞什么“三中心”。“三中心”完全是“四人帮”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现在，让我们剖析一下“四人帮”所反的“三中心”究竟指的是什么。

其一，“教师中心”。在教师和学生相互关系中，一般来说，教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教学活动中起主导作用。列宁说：课程的政治方向：“完全只能由教学人员来决定”。（《列宁全集》第15卷438页）毛主席说：“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这都是说，教师所处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教师是教育者，是对学生“传道、受业、解惑”的。教师一般都学有专长，能够指导学生进行学习。学生的学习活动，主要是在教师的组织指导下进行的。在社会主义学校中，教师和学生是平等的、革命同志关系，学生要向教师学习；教师也要向学生学习。但教师和学生担负的任务是不同的，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教，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教学既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也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主要是靠教师来调动的。教师是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执行者，在党的领导下，接受党和国家的委托，担负着培养学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任。因此，教师的主导作用完全是由教师所处的地位和担负的任务决定的。“四人帮”把教师在教学中起主导作用，名之为“教师中心”而一笔抹煞。他们把毛主席鼓掌称赞、华主席大力支持、体现教师主导作用的湘剧《园丁之歌》，诬蔑为宣扬“教师中心论”。他们岂止要抹煞教师的主导作用，还要取消教师，甚至把教师当做“苍蝇”、“教唆犯”、“臭老九”，予以残酷镇压。

其二，“课堂中心”。毛主席说：“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不然就会“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矛盾论》）学校教学活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课堂教学、现场教学、课外辅导、批改作业，根据教学的要求进行的实验、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实习、参加生产劳动等等。在这些活动形式中，课堂教学是中心一环，其他活动居于次要的服从的地位。学校设置的课堂，具有较好的教学条件，它是教师对学生集中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传授文化科学知识的主要教学形式。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引下，组织学生适当参加社会上的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使学生“在学习期间就成为推翻剥削者这一斗争的参加者”，以便理论联系实际和向工农学习，是完全必要的。任何时候，学校忽视这方面的工作都是不对的。但做这方面的工作，只有在坚持课堂教学作为教学的主要形式这一原则的前提下，才能收到培养学生的好效果。“四人帮”用“课堂中心”这一罪名加在课堂教学上，叫嚷：“学校里留的人越少越

好，同济的都走光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好一个“伟大的胜利”！他们实际是取消课堂，不要学校，叫学生大部分时间在校外转来转去，荒废学业。这是这几年教学质量严重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书本中心”。他们指的书本，主要指学生学习用的课本，即国家统一编的教材。毛主席指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实践论》）学生在学习的时间有限，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事事直接经验”，他们学习的绝大部分是间接经验的知识。我们的社会主义学校所使用的国家统一编写的教材，正是这种“间接经验”知识。它根据党的教育方针的要求，编进了系统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这些理论、知识是学生毕业后继续学习和从事工作所需要的基本工具，是使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和基础。毛主席历来对教材十分重视。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把教材不足看成“抗大”遇到的主要困难之一。解放后，毛主席对教材的编写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要求教育部把编写教材作为最基本的任务来抓。由此可见，教材在教学工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当然，教材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断吸取新的科学成就，修改补充，逐步完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应当随时注意让学生学习当前三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新鲜经验，特别是最新的科学成就。但是，要使学生学到系统的而不是片断的、完整的而不是零碎的文化科学基础知识，达到国家对教学质量的统一要求，教师进行教学必须以国家规定的教材为主要依据。“四人帮”把教师主要依据国家规定的教材进行教学说成是“书本中心”而疯狂反对。他们提出了什么理科“结合典型产品进行教学”，文科“以战斗任务组织教学”，名为结合实际，实则严重破坏了学生对系统的基础知识的学习。这是造成教学质量低下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从上面的剖析可以看出，“四人帮”所反对的“三中心”，指的就是：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起主导作用；课堂教学是学校教学的主要形式；教材是教师进行教学的主要依据。而这些实际上是学校教学最一般的特点和规律，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学校教学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按照“四人帮”的反动逻辑，教师、课堂、教材都成了可有可无或者都可以不要了，那就没有什么教学可言，学校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如果说这三个基本原则（以下简称“三原则”）可以叫做“三中心”的话，那么这样的“三中心”是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客观存在，总是有主有次，有中心与非中心之分。这是不以“四人帮”的反动意志为转移的。

坚持教学过程的“三原则”即“四人帮”所谓的“三中心”，就一定会使社会主义学校变成“封、资、修的顽固堡垒”吗？否。问题在于执行什么路线，为那个阶级服务，用什么思想教育学生。十七年学校坚持了“三原则”，由于广大干部和教师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使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同生产劳动结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统帅教学，培养了大批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四人帮”胡说十七年教学工作是封、资、修的顽固堡垒，完全是无耻的诬蔑。相反，在他们大反“三中心”，树立了他们的帮派中心的学校中，象他们精心培育的黑样板朝阳农学院那样，才真正成了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据点。

坚持“三原则”，是否一定“培养‘三脱离’的精神贵族”呢？回答同样是否定的。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引下，在坚持“三原则”的同时，教材编写、教师讲授和课堂教学内容都注意理论联系实际；重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教师随时注意向学生学习，做到教学相长；组织学生参加一定的三大革命运动实践，接触工农，接触社会，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当时当地的实际，用三大革命运动中涌现的新人新事新经验新成就来不断丰富教学内容。这样做，不但不会“三脱离”，而且能够使学生在德智体几方面更好地发展。二十八年来，广大学校在这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一些学校曾经不同程度地存在过脱离实际、脱离劳动和忽视政治的倾向，但这只是支流而不是主流，而且绝不能把它归罪到坚持“三原则”上。“四人帮”诬蔑“三原则”是“培养‘三脱离’的精神贵族”，完全是颠倒黑白，别有用心。

“四人帮”打出的反“三中心”的破旗，并不是他们的创造发明，而是从他们老祖宗杜威那里拣来的破烂。垄断资产阶级的走狗、实用主义的吹鼓手、反动教育家杜威，也曾打着反对传统教育“三中心”的旗号，贩卖“儿童中心论”，为日趋衰亡的帝国主义服务。“四人帮”同杜威一样，都是主观唯心主义者。他们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目的出发，随心所欲，只要对他们的帮派有用就是真理，实际上是按照实用主义行事的。他们从杜威那里学来了一套反革命伎俩，也打着反“三中心”的幌子，妄图使学校为他们的帮派利益服务。“四人帮”的上海余党狂叫的“学校要以学生为中心”，正是杜威“儿童中心论”的翻版。这就更加清楚地暴露出他们假左真右的丑恶面目和反动阶级本质。

广东哲学界揭批“四人帮”的假左真右

最近，广东哲学学会邀请部分哲学工作者举行座谈会，揭批“四人帮”的假左真右。

会上，许多发言的同志指出，“四人帮”是一伙新老反革命分子结成的黑帮，他们代表被推翻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利益，推行一条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在中国复辟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统治。但他们却又十分狡猾，惯耍反革命两面派伎俩，打着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歪曲、篡改和反对毛泽东思想，颠倒是非，炮制了大量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对他们的流毒和影响，我们决不能低估。因此，在当前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中，我们一定要抓住“四人帮”假左真右这个特点，深入进行揭批，戳穿他们“左派”的伪装，彻底暴露其真右派的反动面目。通过这场伟大的斗争，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进一步分清路线是非，肃清“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全面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推动各条战线的大跃进。

会上，大家还就一些有关的理论问题交换了意见。这些问题主要是：（1）“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特点是什么？应该依据什么去辨别一条路线是“左”还是右？（2）社会主义时期会不会形成“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等等。

“四人帮”的反“写真实”论和阴谋文艺

——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

楼 栖

江青伙同林彪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挥舞“黑八论”的屠刀，大砍十七年的革命文艺。被列为“黑八论”挂帅的“写真实”论，纯属捏词构罪，含血喷人，包藏祸心，流毒深广。这一罪恶如果不给予彻底清算，“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精神枷锁就不能砸烂，革命文艺的创作思想也就不能彻底解放。

(一)

江青给“文艺黑线”定的罪名，“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一个“拉郎配”，便把十七年的文艺硬和三十年代文艺“结合”了。再来“乱点鸳鸯谱”，文艺思想又硬和“俄国资产阶级评论家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串成“黑线”了。这样乱拉乱点罗织的“罪名”，既否定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又埋下了“老干部”是“民主派”的伏线，为他们炮制阴谋文艺扫清道路。一箭三雕，妙用无穷。

“写真实”论，原是五十年代胡风向党进攻的一把刀子，早已遭到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毁灭性打击。后来虽然有人以不同的方式使“写真实”论两次借尸还魂，但都遭到严厉的批判。那些吹鼓手们借“写真实”为名，主张暴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反对作家改造世界观。在他们看来，写社会主义的光明面是不真实的，只有大写阴暗面才是“真实”的。他们挂羊头，卖狗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在这几场战斗中，革命文艺工作者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文章还在，不容抹杀。江青竟颠倒事实，栽赃诬陷，硬把人家所批判的说成是所宣扬的。难道她是要反对“写真实”论么？不。她是想借泼脏水为名，实则保存脏水而泼掉婴儿。后来的大量事实证明，他们要砍掉的正是革命文艺的真实性；而他们炮制的阴谋文艺，恰恰就是“写真实”论的黑样板。

大家都很熟悉恩格斯的一个著名论断：“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

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不真实地反映现实，就不可能有革命文艺，这已成为文学的常识。毛主席在阐明无产阶级政治家和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时，明确指出：“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资产阶级的所谓“写真实”论，目的就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可见，无产阶级讲真实，资产阶级也说“写真实”，性质不同，泾渭分明，不容混淆。我们在排斥资产阶级的“写真实”论时，必须坚决捍卫无产阶级文艺的真实性。革命导师的著名论述，正是“四人帮”所害怕的，于是他们偷换概念，玩弄花招，打着反“写真实”论的旗号，恶毒阉割革命文艺的真实性。他们对“五四”以来真实反映革命斗争的文艺作品，实行禁錮政策，就是事实的铁证。

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其中可能是真实的反映，也可能是歪曲的反映。“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关键在于作家的世界观。因此，毛主席强调指出：“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作家只有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不断改造世界观，才有可能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革命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因为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是和历史的发展潮流相一致的，是最符合历史真实的。即使它遭到黑暗势力的镇压而暂时失败，它也有无限光明的前途。例如，在四害横行、逆流汹涌的岁月里，那些敢于逆风顶浪的健儿们，一个个都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今天的革命文艺描绘他们，就能发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作用。然而，在一段时间中，那些为“四人帮”抬轿子、吹喇叭、充打手的流氓、阿飞，却被他们封为“反潮流的英雄”而大力歌颂。这难道有什么真实性吗？正因为这样，“四人帮”才拼命绞杀革命文艺的真实性，但又不敢明目张胆，就只好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故意把水搅混，以便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

（二）

大反写“真人真事”是“四人帮”罪恶意图的进一步暴露。他们借口塑造典型人物“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实则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为他们炮制阴谋文艺制造舆论。

毛主席指出：“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这是革命文艺创作必须遵循的一个根本原则，塑造典型人物也不能例外。在实际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都有，其中就有不少人可以塑造为文学中的典型。例如，革命导师的革命功勋，为世界革命人民树立了崇高典范。著名影片《列宁在一九一八》、《列宁在十月》，革命导师的高大形象，就激动过千千万万的观众。又如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既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又塑造了典型人物。此外，其他如传记文学、报告文学、人物特写、革命回忆录等等，写的既是真人真事，又有典型意义。写真人真事，也必须选择、提炼、加工，其中就寓有典型化的含义。从这方面说，真人真事和典型人物不但没有截然的界限，而且是血肉相连的。

当然，塑造典型人物，还有另一种更为宽广的途径，这就是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

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的途径。比方，鲁迅的创作，“没有专用过一个人”，而是“杂取种种人”，“所写的事迹”，也决不全用某一事实。因为现实中的典型人物，毕竟不多，如果从典型性格来要求，往往缺少现成的典型，即使有，也还不够充分，不够完整，要在同一类型的人物基础上，进行典型化的集中概括。从这方面说，典型性格的塑造，不必受真人真事的局限。也是人所共知的，但不要把问题加以绝对化。鲁迅就强调过，创作首先要有“模特儿”，可以“专用一个人”。可见，塑造典型人物的关键，是要从实际生活的人物出发，而“四人帮”的软刀子，正是从这里下手的。

“四人帮”反对写“真人真事”，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在他们的文艺辞典中，所有术语都另有一种含义。“写真实”论是这样，“写真人真事”论也是这样。他们害怕“写真人真事”，特别害怕写革命老干部的革命历史。周立波同志的《韶山的节日》，十多年来含冤莫白，最近才得到昭雪，就是他们罪恶的铁证。也许有人会说，那是因为写了杨开慧烈士，刺了江青的痛处，情况特殊，应当别论。那就看看电影《创业》的遭遇吧。江青给《创业》罗织的“十大罪状”，其中“写活着的真人真事”是问题的核心，被认为是“后患无穷”。她特别指明“影片中三次笼统地提到党中央和中央首长”，从而捏词嫁祸，暴露出她的卑劣用心。她一方面用“活着的真人真事”抹杀影片中的典型人物，另一方面又用写王铁人“真人真事”的报告文学去衡量影片，自相矛盾，自打嘴巴。由于影片中的典型人物塑造，使反“真人真事”论不攻自破，使“四人帮”感到特别难堪。于是，他们大念这个“紧箍咒”，变戏法，耍花招，随心所欲，信口雌黄。他们的罪恶目的还是要绞杀革命文艺的真实性，为他们炮制阴谋文艺制造理论根据。因为阴谋文艺是见不得阳光的。如果按照真实地反映现实的原则，那他们这伙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变成过街老鼠了。他们既然要为自己一伙树碑立传，篡党夺权，那就必然要对革命前辈的丰功伟绩恨之入骨，从封锁、禁锢进而歪曲、篡改。总之，在“四人帮”的政治辞典中，所有术语都具有两面派的性质。正面要作反面看，这是打开“四人帮”各种谬论的核心奥秘的一把钥匙。有了这把钥匙，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也就昭然若揭了。

(三)

开头时已经指出，“文艺黑线专政”论早已埋下了老干部是“民主派”的伏线。“四人帮”从文艺战线上打开一个缺口，再向纵深扩展。随着他们政治野心的膨胀，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终于破门而出，老干部都给打成“走资派”了。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是从文艺投机起家的政治暴发户。他们十分懂得，文艺既可以成为革命的武器，也可以变成反革命的工具。于是，他们打着革命文艺的旗号，实现阴谋文艺的目的。他们用的是反革命的“破”与“立”辩证法。从“文艺黑线专政”论到“空白论”，从“写真实”论到“真人真事”论，这是他们“破”的升级。前一个“破”，把《国际歌》以来九十多年的世界文坛“破”成一片“空白”；后一个“破”，把革命文艺的真实性

“破”为阴谋文艺的欺骗性。他们“破”的目的在于“立”。从“根本任务”论到“三突出创作原则”，这是他们“立”的扩大，“立”他们阴谋文艺的理论纲领。当然，他们在“破”中也有“立”，那是剽窃别人的创作成果，“立”他们的“新纪元”；他们在“立”中也有“破”，那是用“三突出创作原则”来篡改“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最后大“立”其反革命政治纲领，“立”阴谋文艺的灵魂。这是集“四人帮”的各种谬论之大成，千里来龙，到此结穴：篡党夺权，自掘坟墓，终于逃不出历史辩证法的惩罚。

大家比较熟悉的毒草影片《春苗》，是“四人帮”为篡党夺权鸣锣开道的阴谋文艺之一。田春苗是他们精心培育的毒苗子，“破土而出”，“满身带刺”。毒就毒在她被美化为贫下中农的心尖子，同时又是反党“英雄”。而公社卫生院长杜文杰，却被丑化为“走资派的典型”，和阶级敌人钱济仁是一路货色，铁石心肠，见死不救。加上一个移花接木，把林彪、“四人帮”特有的“养身疗法”，嫁接在杜文杰身上。把野心家美化为“革命家”，把老干部丑化成“走资派”，把篡党夺权美化为“革命造反”，这是阴谋文艺的一个显著特征。他们炮制的其它毒草作品，无一例外，都是颠倒敌我关系，颠倒革命与反革命的性质，用阴谋冒充革命，用捏造代替真实。“四人帮”叫嚷反“写真实”论，和胡风鼓吹的“写真实”论，象是南辕北辙，实则殊途同归。其中不同的只是，一个赤膊上阵，一个笑里藏刀，手法不同，目标一致。这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本性所决定的。他们都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本来就是一条历史藤上的两个毒瓜，都是以叛徒、特务为核心骨干组成的黑帮。江青硬把胡风的“写真实”论，挂在十七年革命文艺的账上，栽赃构罪，贼喊捉贼，妄图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开脱罪责，暗中却接过他们手中的反革命接力棒，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禁钢、封存革命文艺作品，疯狂迫害革命作家。“文艺黑线专政”的大帽子，倒扣在他们头上，倒是异常合戴的。

“四人帮”不但在政治思想上是胡风黑帮的继承人，而且在文艺思想上也是胡风谬论的追随者。他们共同的思想基础是主观唯心论。胡风狂热鼓吹“主观战斗精神”、“自我扩张”、“主观拥抱客观”等等，都成为“四人帮”炮制阴谋文艺的战略方针。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实际上却这样做。前面提到他们运用反革命的“破”与“立”手法，就是这方面的罪恶表演。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他们挥舞反“写真实”论和反“真人真事”论两把屠刀，把反映真实定为戒条，把“真人真事”划为禁区。他们把“三突出创作原则”具体化为“写与走资派斗争”的原则，即是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树碑立传的原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全都给歪曲、篡改了。谬论喧嚣，毒草丛生，创作成为捏造的变种，规律荡然；文学变成阴谋的化身，毒箭四射。流风所及，贻害无穷。如今，四害虽除，妖氛未净。“四人帮”的各种流毒倘不彻底清除，文艺问题上的路线是非、理论是非、思想是非就划不清界限，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也就迈不开坚实的大步。这是抓纲治文艺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绝不可等闲视之。

评某教授大搞影射史学的实质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郇 实

众所周知，广东的某教授在“四人帮”控制思想舆论阵地，影射史学猖獗的几年间，能够名噪一时，靠的是两条，一是“四人帮”看中了他，一是他卖身投靠“四人帮”。

“四人帮”从接过批林批孔的口号，搞三箭齐发，到炮制儒法斗争史的政治大骗局，在这影射史学的全过程中，始终打着反孔的旗号。伟大领袖毛主席曾多次指出，反孔是对的，尊孔是错的。“四人帮”和一切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者一样，惯于拉大旗，作虎皮，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挡箭牌。“四人帮”既不批林，也不真正批孔，而是用反孔作伪装，进行篡党夺权的罪恶勾当。他们把孔丘当作一根得心应手的大棒，要反对谁，打倒谁，就把谁说成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或“现代的孔老二”；谁反对影射史学，谁就是“尊孔派”。为此，“四人帮”不仅豢养了梁效、罗思鼎、唐晓文之流的御用走卒，大做这类影射黑文，而且也物色既能起点招牌作用，欺骗群众，又能跟着他们大搞影射史学的“学者”。他们看中了广东这位教授有一块反孔的招牌，所以蓄意收买，极力拉拢。早在一九七三年，“四人帮”就请他去北京等地以“讲学”为名，为他们的影射史学摇旗呐喊，推波助澜。一九七四年法家著作注释工作座谈会，他被聘为顾问，待若上宾。会议期间，为抬高他的身价，江青在大庭广众中委托他“回去促一促广东省委”，赐以凌驾于省委之上的钦差大臣身分。后来，又赠以亲笔签名的书籍，以示器重和亲近。他有病，被接去北京治疗，江青不仅派去男女黑干将殷勤慰问，连医疗方案也要由张春桥审批。

某教授对“四人帮”的宠遇，报之以卖身投靠。他说：“现在中央给我信任，我就要特别小心，不能辜负中央的期望。”他所说的“中央”当然是指“四人帮”，而他的确也没有辜负“四人帮”的“期望”。几年来，他不顾年老体弱，重病在身，四处“讲学”，足迹遍及全国十多个省市，造成很坏的影响。他连篇累牍地抛出文章，紧密配合“四人帮”的反革命步伐，许多文章均被列为重点，以醒目的位置登载在“四人帮”控制的中央报刊上。

教授先生首先是儒法斗争贯穿古今论的著名吹鼓手。儒法斗争贯穿古今论是“四人帮”炮制的儒法斗争史这一大骗局的核心内容。作为一个自诩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权威，竟不顾历史的本来面目，投其所好，极力贩卖“四人帮”这个反革命胡诌，并千方百计为之寻找或者制造理论和历史的根据。

一九七四年六月中旬，叛徒江青在天津作了个臭名昭著的讲话，定出了所谓“法家是爱人民的，儒家是镇压人民的”、“法家是讲统一的，儒家是分裂的”、“法家是爱国的，儒家是卖国的”、“法家是厚今薄古的，儒家是厚古薄今的”等划分儒法两家的六条标准，妄图以此套尽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大做影射、比附的黑文，借以攻击敬爱的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美化他们自己。这种歪曲、伪造历史，肆意践踏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的辩证法，以及用儒法斗争来取代阶级斗争的卑鄙行径，对于广东某教授来说，本来是不难识别的。然而六月下旬，他就在中山大学大谈特谈什么儒法斗争可以概括为“爱国与卖国”、“统一与分裂”、“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接着，在另一次会上又大谈“儒法两家的斗争”，是“变革与反变革，改革与反改革，统一与分裂，复辟与反复辟，前进与倒退”“这几方面的斗争”，同样企图用这套僵死的模式，偷换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科学分析方法。政治上的堕落，必然要乞求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教授先生重新拾起他曾声色俱厉批判过的反动的抽象继承法，这是他对“四人帮”反革命步伐趋之若鹜的必然表现。随着“四人帮”儒法斗争的丑剧紧锣密鼓地进行，他还极力运用自己的影响，不仅予以肯定，并且广为传播。这里用不着罗列大量事实，姑举一例说明。他在谈到秦始皇死后的社会变革形势时说：“最近《红旗》杂志有罗思鼎的文章也涉及到这个问题。我个人的看法，也觉得赵高是复辟势力，他是变更了秦始皇的法制。从他出身来讲，他家就是对法制不满意的，对秦始皇也是不满意的。”“陈胜、吴广起义，是有奴隶参加的……农民起义中有奴隶参加，是反对复辟活动，我大体上同意罗思鼎的这些话。”仅仅同意、赞赏和鼓吹梁效、罗思鼎之流的谬论，尚嫌不足，于是，他别出心裁地提出自己独到的“见地”，向“四人帮”表忠献媚。

“四人帮”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梁效、罗思鼎炮制出我国封建社会长达几百年的复辟与反复辟斗争，其罪恶目的就在于此。人们对这种篡改我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谬论，嗤之以鼻。而广东某教授却进一步抛出千年复辟论，认为从两汉到隋唐这段上千年的前期封建社会，其主要矛盾仍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以“世家豪族”为代表的“奴隶制残余势力”是复辟派。他说：“汉代以后的世家豪族都渊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氏族贵族”，而“儒家跟世家豪族就是分不开”。换言之，儒家就是复辟派。他还认为，这个历史时期内庶族地主的政治代表象刘邦、汉武帝、曹操直到李世民、武则天等，则都是法家，而“唐代以前的法家都是打击世家豪族的”，既然都是打击“世家豪族”的，当然也就是打击复辟派。换言之，法家都是反复辟派。经过某教授这样七转八转，地主阶级内部的庶族与世族之争就变成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变成了儒法斗争。用这种千余年的复辟论，来“为现实斗争服务”，的确是挖空了心思。

在侈谈封建社会前期千余年复辟论的同时，他又主张后期封建社会的儒法斗争，是腐朽的封建制同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的生产关系的斗争。他认为，宋代已出现封建社会没落的标志，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已开始分离了，在商品经济孕育下，已出现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他的根据是：“元代的马可波罗在《游记》中不是已忆述了杭州的手工工场了吗？”据此，他肯定宋代以后的法家从抑商转为重商，就是反映了新的资本主义“萌芽”。

按照某教授的说法，代表奴隶制复辟势力的世家豪族在东汉以后还长期掌握了政权，在生产关系中占重要地位的部曲佃客制度又是变相的奴隶制，那末，奴隶制的复辟不是已经得逞了么，不是汉代以后出现了长达数百年的奴隶制大倒退么，不是封建制到唐代还没有最终确立，至少也没有完全确立么？果如此，从宋代开始，封建社会又怎样会开始走向没落，又怎样会出现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毛主席早就肯定中国的历史自周秦以来就是封建社会。某教授无限夸大封建社会中的奴隶制残余，炮制出耸人听闻的千年复辟论，完全与毛主席的科学论断背道而驰。毛主席又指出：“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某教授既把我国封建社会确立的时间极力推后，又把资本主义萌芽的时间极力提前，从而掩盖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是造成几千年经济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并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篡改为前期是法家同儒家的复辟与反复辟的矛盾斗争，后期是法家同儒家分别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新的生产关系与腐朽没落的封建生产关系的矛盾斗争。一部阶级斗争史变成了儒法斗争史，这又完全与毛主席的科学论断背道而驰。

某教授不仅强调整个封建社会有儒法斗争，而且认为近代也有儒法斗争。儒法斗争既然是“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也就必须把一部中国近代史篡改为儒法斗争史。臭名昭著的梁效在流毒全国的《儒法斗争概况》小册子中，就以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儒法斗争”为题，囊括了中国人民八十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史。某教授对此也不甘落后，也要贡献自己的“独创”。他在一九七五年再版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修订本）》中一反过去的见解，认为“两千多年的儒法斗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有着不同的阶级基础和政治内容，但总是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同时在思想战线上则表现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这样，就把儒法斗争从古代贯穿到近代。他认为近代史上的思想斗争，不管采取何种内容和形式，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尊法反儒同尊儒反法的斗争”，“就其本质来说”，中国近代哲学史就是近代儒法斗争史。而哲学史又是阶级斗争在思想领域的反映。因此，某教授宣称，近代史上的进步阶级、进步力量和进步思想都是尊法反儒的，反之则尊儒反法。所谓尊法必爱国，尊儒必卖国；尊法必反帝，尊儒必投降媚外；尊法必要求革新、革命，尊儒则顽固守旧等等。这也就是说，一切都可以儒法两家划线，“尊法”抑或“尊儒”是区分近代史上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志，也是近代史上阶级斗争的基本内容。

这是对中国近代史的莫大歪曲。谁都知道，中国近代史就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史。毛主席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整套科学的论断，这是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根本依据。某教授妄图用什么“新的历史条件下尊法反儒和尊儒反法的斗争”，来取代近代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动力，充分暴露出他对毛主席的英明论断的背叛，为“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服务。

人们记得，某教授在一九七三年以前一直主张儒法斗争仅仅是春秋战国时期地主阶级与奴隶主阶级之间的政治思想斗争，汉以后谁是法家还很难说。随着影射史学的出笼和泛滥，某教授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大变调。这种转变，契机之深，幅度之大，充分说明某教授决心把自己拴在“四人帮”的反革命战车上，唱一个调，走一条道。

影射史学泛滥的过程，也是“四人帮”走向灭亡的过程。影射史学出于卑鄙的目的，运用卑鄙的手段，随心所欲地捏造历史，肆无忌惮地亵渎历史唯物主义，倒从反面深刻地教育了人民。全国人民正是不断通过包括影射史学在内的各种怪现象，逐步认清“四人帮”及其一伙的丑恶灵魂和狰狞面目。随着时间的推移，斗争的深入，所谓儒法斗争史的骗局，越来越遭到广大革命群众和史学工作者各种形式的抵制和反对。尽管“四人帮”使尽浑身解数，又是吹，又是打，但骗人的把戏想用合法的形式支撑下去已经越来越难了。广东某教授充分意识到这种局面的严重性。教授先生既然把自己的命运和“四人帮”连在一起，他就十分懂得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害关系。“四人帮”的垮台也就是他在政治上的破产。为此，他不仅强调儒法斗争史的研究，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而且跳出来进行疯狂的反扑。

在一九七六年六月的一次讲话中，他从春秋、战国一直讲到近代的严复、章太炎，洋洋洒洒，长篇大论，反复说明中国历史上不仅存在着儒法斗争，而且极力论证“儒法斗争是思想斗争，也是政治斗争”。他说：“儒法两家，我们可以简明地用两句话来概括讲明它们的根本区别：法家是‘厚今薄古’，儒家是‘厚古薄今’。我们现在还有厚今薄古还是厚古薄今这个问题，历史上这场斗争也十分激烈。”这是某教授对儒法斗争作出的“新”概括，是他以古论今，将儒法斗争贯串古今的又一“新”创。

这里，某教授又一次袭用了资产阶级学者所惯用的抽象继承法。他抽掉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这一历史观命题的阶级内容，把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范畴中出现的厚古薄今与厚今薄古之争，赋予普遍性的形式，其目的无非还是要为儒法斗争贯穿古今造一点新根据。他在讲话中还气势汹汹地说：“历史上就是有儒法斗争，怎么否定得了？”“想借口现代没有孔老二来否定研究儒法斗争史，这是否定不了的。”“就是有现代的孔子”。他污蔑邓付主席是什么“现代的孔子”。还说：“否定儒法斗争就是否认阶级斗争”，就是“刮右倾翻案风”，就是一种“罪恶用心的表现！”这些话，不打自招地供认他把儒法斗争拉长到现在，引伸到党内的卑鄙行径，是彻头彻尾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服

务的。

某教授跟着“四人帮”的指挥棒转的另一表现，就是不断变换孔丘的脸谱，把孔丘这具历史僵尸用作打人的砖头。一九七三年，他描绘的孔丘是“好色之徒”，一九七四年，他把孔丘变成想通过南子“走后门当大官”的“政客”，到了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六年，某教授又把孔丘成为影射攻击敬爱的周总理、邓小平副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靶子。

一九七六年的夏天是不平凡的夏天。“四人帮”利用周总理的去世和毛主席的病重加快了篡党夺权的罪恶步伐。此时，广东某教授不顾医生的劝阻，毅然抱病南下，并接连在湖南、广东两次会议上作了不寻常的表演。在广东一次长达五个多小时的“讲话”中，名曰谈谈“学点哲学”，其实从感情到语言，从内容的反动到手段的卑劣，与“四人帮”同出一辙，而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个“讲话”，丧心病狂地把罪恶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是“四人帮”进行反革命复辟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他们把周总理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就把攻击的目标集中到周总理身上。所谓“评法批儒”，也一直是围绕着反对周总理这个反革命主题进行的。江青就公开叫嚷要“批林批孔批周公”，“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也公然叫嚣：“不要孤立地批孔，要和党的路线斗争联系起来”，“要把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抬出来”。他们炮制大量诸如《论孔丘其人》等恶毒攻击周总理的黑文，对周总理的诬陷和攻击，犹如阵阵乌云，滚滚恶浪，铺天盖地而来。一股反周总理的反革命逆流甚嚣尘上。广东某教授甘心附逆，同流合污，扮演了影射、攻击周总理的可耻角色，成为他卖身投靠“四人帮”的重要罪证。

他说：“孔老二为了‘复礼’，就要从搜集材料中研究一番。研究来研究去，他认为最完备的还是西周的‘礼’，还是周公所制的‘礼’最好。所以结论是：‘吾从周’。为什么‘吾从周’呢？认为周公所制的‘礼’最完备。”这段话，翻来覆去的论述孔丘的“复礼”就是复“周公之礼”，拚命突出“周公”二字，其罪恶用心不言自明。

谁都知道，作为一个奴隶制王朝，周朝的政治组织、社会制度及其一整套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礼乐制度，是沿袭夏、商，经武王、周公、成王和康王几代建立起来的。周初，以周公旦为首的一批大贵族，曾对夏、商以来的奴隶制礼乐，陆续加以厘订、增补和汇集，渐渐成为一套法定的制度。周礼是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孔丘的言论中也没有什么“还是周公所制的礼最好”、“周公所制的礼最完备”之类的话。某教授过去也论述过：克己复礼“在骨子里维护殷商西周以来的奴隶族有的统治”。在他的旧作中，一向认为孔丘要复的是殷周之礼，并以“孔子善殷”和“吾从周”两条材料，说明孔丘对殷礼和周礼一样重视，并没有什么“畸轻畸重的态度”。曾几何时，同是这位教授却摇身一变，硬说“克己复礼”就是“复周公之礼”，千方百计把人们的视线引到“周公”身上。这不是指桑骂槐，借古讽今，影射和攻击周总理又是什么！

周总理逝世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感到无限悲痛。对此，“四人帮”怕得要命，恨得要死。在一篇《孔丘之忧》的黑文中，“四人帮”的喉舌狂叫：“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

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疯狂发泄他们对周总理，对沉痛悼念周总理的广大革命群众的刻骨仇恨。而某教授在这次“讲话”中，则借“死而后已”四个字大放厥词，继续疯狂咒骂和恶毒攻击周总理。他说：“孔老二说‘死而后已’，我就说他‘死而不已’。为什么‘死而不已’呢？一个人死了不就完了吗？他还没有完哩！……他自己没有完成复辟奴隶制，让学生慢慢来复辟嘛！”又说：“‘死而后已’，除死方休，你看他顽固不顽固呢？很顽固，顽固到底。”这是在批孔吗？当然不是。孔丘根本没说过“死而后已”这句话，这是孔丘的学生曾参说的。这位教授抓住“死而后已”和“死而不已”大做文章，和“四人帮”所说的“化成灰烬也要批判”、“死了也要批判”完全一样，这种仰承“四人帮”的鼻息，如此恶毒地影射和攻击周总理的罪行，实在令人发指！

“四人帮”被粉碎后，某教授矢口否认这个讲话是攻击周总理的，他强词夺理地诡称：“讲话就是批孔的”。可是，就在这个讲话中，某教授借口要吸取“有的人停留在辛亥革命，有的人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变为走资派”这个“教训”，肆意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时，只是假惺惺地提到“我们要向董老学习，他的一生是不断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仅此而已。周总理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党中央的讣告和悼词中不是说得很清楚吗？难道周总理的一生不是“不断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吗？在全国人民仍沉浸在深切悼念周总理的时刻，某教授为什么不提一提我们应该向周总理学习，从而多少寄托我们的哀思？批“周公”如此卖劲，悼总理不屑一提，正是某教授老谋深算、居心叵测的明证。直至“四人帮”利用历史攻击周总理的罪行已经大白天下，广东史学界举行声讨“四人帮”座谈会时，某教授在起草发言稿中，对“四人帮”攻击周总理一事，仍是讳莫如深，只字不提。是惊恐失措？还是负隅顽抗？教授先生曾多次推荐“四人帮”的帮刊《学习与批判》，告诫人们：“要很好学习上海的文章，学习人家的战斗性。人家的文章虽然没点名，但一看就知道是指谁”。这就说明，他对“四人帮”那套以批孔为名，行攻击周总理为实的反革命策略是领悟透彻，心照不宣的。尾巴已经露出来了，抵赖和狡辩只能证明“顽固到底”，此外，别无他用。

在这个讲话中，某教授还把矛头指向邓副主席。“讲话”的第一个题目就把邓副主席和孔老二硬拉在一起。在此题目下，他大谈特谈“孔老二整顿为了复辟奴隶制”，恶毒攻击和诬陷邓小平同志根据毛主席指示而进行的整顿。

这位教授说孔老二有三大“整顿”。“克己复礼”，“这是主要的一个整顿”；“音乐”“破坏了”，“这是另一个整顿”；“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和“正名”，“这是整顿的主要内容”。把孔丘说成是搞“整顿”的祖师爷，是某教授对影射史学的一大“贡献”。“四人帮”为要在“整顿”上作文章，曾翻箱倒柜寻经据典，结果只找到宋代的儒家司马光搞过“整顿”。康立找到宋代黄庭坚的“十分乾坤整顿了”一句诗就大作文章，洋洋得意说该文“从题目到内容，点子想得很巧妙”。广东某教授居然直截了当说孔丘为了复辟奴隶制，“就要来整顿一番”，这一点，“四人帮”及其御用班子都望尘莫及。

把孔丘和“整顿”胡凑在一块，是为了把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同志和奴隶制头子孔

丘硬拉在一起。这里面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

“讲话”出笼的这年夏天，正是“四人帮”导演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的高峰时期。所谓“整顿就是复辟”就是这一时期提出的用心险恶的反革命口号。邓小平同志在主持中央工作时，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提出要在党内、军内、工业、农业、科技、文艺和教育等各个领域进行“整顿”，是针对被“四人帮”糟塌得不成样子的政治经济局面，所采取的完全必要、非常及时和十分正确的措施。“整顿”是对“四人帮”倒行逆施、为非作歹反革命破坏活动的严重打击，理所当然地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赞同。“四人帮”害怕整顿，从而污蔑整顿，攻击整顿也就不足为奇。

某教授利令智昏，唯恐为“四人帮”效劳不力，拚命配合这场反革命的大合唱。他在侈谈孔丘几项“整顿”之后，紧接着就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整顿”进行了疯狂的攻击和诬蔑。他还恶狠狠地对邓副主席进行种种攻击和诬蔑。某教授以为“四人帮”的天下已定，一心想攀龙附凤，请功邀赏之情，溢于言表。教授先生伪造历史，大造舆论，为鬼为蜮，再次暴露了他在为“四人帮”效犬马之劳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够远了。

几年来，某教授曾多次指责：“广东有一个缺点，就是紧跟中央不够。往往跟得及时，或跟得很晚”，而“上海就不一样，他们跟中央跟得紧，这一点上我们比不上他们，要努力赶上”。听其言，观其行，在“这一点上”，他倒是说到做到。他不仅“紧跟”和“赶上”了“四人帮”的沉舟，在许多地方他甚至比“四人帮”的御用文人梁效、罗思鼎之流更加凶狠毒辣，只有不惜出卖灵魂，决心卖身投靠的人才能跨越这一步。

某教授在其过去的著述中曾经反过孔丘，人们对此有过正确的评价。但是他经不起革命转折的考验，从反孔走向反党，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沉没下去，这是一个耐人深思的深刻教训。

嘲弄历史的人终将被历史所惩罚，广东的某教授就是如此。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一九七八年四月七日脱稿

古为帮用的丑恶表演

陈周棠 谭 超

一九七六年六月，广东某教授在他的所谓“哲学史”讲话里，胡说中国近代史上的严复、章太炎从“尊法反儒”转到“尊儒反法”，并借以攻击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极力为“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服务。这种利用历史人物反党的谬论，必须揭露、批判。

教授先生说：他的全篇讲话，“讲的都是历史事实，不是乱扯”。这话半真半假，以假乱真。有点历史事实，是真的；没有一点事实，怎能达到骗人的目的？“不是乱扯”，是假的，不歪曲历史他就无法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

教授先生说：严复、章太炎先是“尊法反儒”的。这不符历史事实。严复是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启蒙思想家；章太炎是个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近代史上都起过一定的作用，应该是属于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史人物，这项“尊法反儒”的帽子戴不到他们头上。

先讲严复。教授先生说：严复“是戊戌变法时代的人，搞变法的”，“他有一篇文章——《辟韩》很好，很对，从当时来说是尊法反儒的。可是到了后来袁世凯要做皇帝搞筹安会，他参加了，这时尊儒反法了。”其实，严复在戊戌变法时期，既有推崇“法家”人物的话，也有“反法”的言论，就以教授先生称之为“很好，很对”的《辟韩》来说吧，此文就认为“秦以来之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还认为历代皇帝执行的都是“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的政策。在《论八股存亡之关系》一文中，他又指出：“荀子身虽不见用，而其弟子韩非、李斯等人显于秦，秦人之政，一听非、斯，汉人因之，遂有今日。”严复不仅将封建专制制度的延续归罪于秦始皇，把他骂为大逆不道的窃国大盗，而且还将韩非、李斯等法家人物骂成是二千多年实行君主专制、窃国害民的罪魁祸首。试问教授先生，这样咒骂法家的人，能叫做“尊法”吗？严复在他的前期，也的确批评过孟轲、韩愈、宋儒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以及科举制度，认为这些是“无实”“无用”之物，“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救亡决论》）。但儒家的言论，他也没有完全否定。例如：他肯定“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苟患失之，无所不至’”。肯定“孟子有言，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均见《上今上皇帝万言书》）。还肯定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辟韩》）的话。显然，严复既“尊法”又“反法”，既“尊儒”又“反儒”，这并不奇怪，因为他要的不是君主专制，而是“民权”和“君主立宪”，他是站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上来取舍各家学说的。被某教授誉为“很好”“很对”，是“尊法反儒”的《辟韩》一文，其实是一篇最鲜明的反对君主专制，提倡“民权”的文章。

严复在后期推崇“儒家”，尊孔读经，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他“尊法”的思想更为突出，这也是事实。限于篇幅只举两例。第一，一九一五年，他说：“齐之强，以管仲，秦之起，以商公，其他若申不害、赵奢、李悝、吴起，降而诸葛武侯……凡有强效，大抵皆任法者也”。又说：“是故居今而言救亡学，惟申、韩庶几可用”（《与熊纯如书》第十五、十六函）。第二，一九一六年，他说：“自吾观之，则今日中国需有秦政、魏武、管仲、商君及类乎此之政治家，庶几有济……”（同上书，三十二函）。所以要用“尊儒反法”来概括严复后期的思想，同样是非常荒谬的。必须指出：由于严复思想的倒退，他这时拥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袁世凯独裁统治，因而他的“尊儒”是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服务，他“尊法”是主张用铁腕方法镇压资产阶级革命以维护袁世凯的统治。如此而已。

再说章太炎。教授先生说：“章太炎是辛亥革命的革命派，尊法反儒，哲学上是唯物论。可是到后来也尊儒反法了”。这又是捏造历史。在辛亥革命前，章太炎的确推崇过“法家”，他说：“历览前史，独于荀卿、韩非所说，谓不可易”（《蕤汉微言》）。又说“法家者流，则犹西方所谓政治家也”（《庵书·商鞅》）。他还认为秦始皇可以与三皇五帝“比隆”（《秦政记》）。但他“尊孔”也很突出，他说：孔丘是“圣人”，“上知千世，下知千世”（《诸子学略说》），认为孔丘作《春秋》“若旋玕玉斗”，“可以封岱宗，配无极”（《庵书·订孔》），“比之天地，无不罅持”（《国故论衡·原经》）。章太炎把孔丘吹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怎么能说他是“反儒”？辛亥革命后的章太炎，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堕落，拥护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袁世凯，所以他大搞尊孔读经，成立什么“国学会”，发表《驳建立孔教议》，大肆吹捧孔丘，但这时他也有“尊法”的史实。他要袁世凯“以光武遇赤眉之术解散狂狡，以汉高雍齿之术起用宿将，以宋祖律藩之术安慰荆吴”（《致项城论治术书》）。一九一四年，他在《雅言》杂志上重新发表《秦政记》，吹捧秦始皇的业绩。必须指出：章太炎这时重新发表《秦政记》，决非旧调重弹，而是为了镇压资产阶级革命派，他推崇“儒家”也不是为了“尊儒”，而是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服务。试问教授先生：后期的章太炎尊孔读经这是事实，但他继续推崇秦始皇，这也算“反法”的史实吗？

“四人帮”影射史学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为了“古为帮用”，可以“七真三假”，“造出来变成真的了”。而教授先生也是翻手为云复手为雨，早晚市价不同。他在一九六三年编写的《简明中国思想史》里，把严复作为“近代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启蒙人物”，对《辟韩》篇的结论是：“严复在批判君主制度时，运用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的观点”，“有力地批判了‘君权神授’的传统观点，宣扬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理想”。把章太炎作为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工作”者。在一九七二年他作“中国哲学史”的报告里，仍将严复、章太炎作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但在“四人帮”篡党夺权猖獗的一九七六年，教授先生公然一反前说，不惜歪曲历史事实，将严复、章太炎作为“尊法反儒”的代表人物，硬把《辟韩》篇说成是“尊法反儒”的典范。这种魔术师的手法，显然不是讲“哲学史”，而是别有用心。恩格斯曾经说过：“野

心就是一切虚伪和谎话的根源”。教授先生讲了那么多谎言，正是源出于此。

教授先生在讲话时，还以理论权威的架势说：我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为指导思想”来分析问题的。这又是撒谎。其实通篇讲话是按照“四人帮”的旨意来分析问题的。梁效炮制的《儒法斗争史概况》，将一部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伪造成“儒法斗争”史。“四人帮”钦定的“法家”名单里，把龚自珍、魏源、严复、章太炎列为中国近代史上四大“法家”。教授先生将严复、章太炎戴上“尊法反儒”的桂冠，这无非是说明近代中国存在着“尊法反儒”和“尊儒反法”的“儒法斗争”，近代史是“儒法斗争”史的继续。如果这里还有点儿含蓄的话，那末，在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里就更加清楚了：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各个时期，统统挂上“儒法斗争”的招牌。众所周知，近代中国是从鸦片战争以来，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作为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如毛主席所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近代中国的革命，就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以广大中国人民为一方，同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另一方的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搏斗，就是近代中国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而教授先生却以严复、章太炎的“尊法反儒”来说明近代中国存在着“儒法斗争”，歪曲和篡改了近代中国的阶级关系、社会性质、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动力，这难道可以叫做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来分析问题？

所谓“儒法斗争”不过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而中国近代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由于时代的不同，作为反映这种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并为这种斗争服务的思想斗争，也和过去根本不同。它不是“儒法斗争”或“尊法反儒”和“尊儒反法”的斗争，而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关于这一点，毛主席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新民主主义论》）而教授先生不仅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严复、章太炎戴上“尊法反儒”的桂冠，而且还将整个近代中国文化思想领域的“新学”与“旧学”的斗争，说成“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尊法反儒’同‘尊儒反法’的斗争”。试问教授先生，这难道也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来分析问题的么？这种不受阶级制约，不受时间、地点、条件限制的“模式化”的方法，根本不是什么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而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杜林的“永恒真理”，是别有用心的热昏的胡话，是形而上学猖獗的表现。

教授先生为什么要改变他过去对严复、章太炎的评价？又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历史人物描绘成从“尊法反儒”到“尊儒反法”？这个秘密，可以在教授先生的讲话中找到答案。

他说：学习历史和哲学，“是为现实阶级斗争服务”，而且要做到“服务得更好一些”。他为“现实阶级斗争服务”，就是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服务。不仅仅是“服务”，而且还要做到“服务得更好一些”。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四人帮”为了把广大的老干部打成“半截子革命派”，是绞尽了脑汁的。一九七五年底，“四人帮”为了围攻敬爱的周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他们的帮刊《学习与批判》以连载的形式抛出了《汪精卫卖国记》。一九七六年二月，张春桥读后，立即教训奴才们说：“文章只讲了汪精卫的后半生，没有讲汪精卫的前半生，一部历史也就成了不可理解的了。”还怕奴才们不能领会他的“精神”，又说：“汪精卫还有段革命的前半生，正因为他有资本，才能卖国。”帮刊的余党接到张春桥的这个黑指示，心领神会，立即将已付印的《汪精卫卖国记》一书前面加上“从革命派堕落为反动派”的醒目标题。同时，在一天一夜之间写成了《革命与资本》，在这篇不到三页的黑文中，大谈汪精卫“革命的前半生”与“卖国的后半生”，进而溯到康有为、严复和章太炎，胡说这种前半生“革命”而后半生“反动”的“半截子革命者”是历史的普遍现象，是一条必然的历史“规律”。教授先生在讲话中讲近代史上“尊法反儒”的代表人物时，别的都不讲，只讲严复、章太炎由“尊法反儒”倒退到“尊儒反法”，这难道不是秉承“首长”旨意，来个北呼南应吗？这一点，教授先生大概否认不了吧？一九七五年秋天，他就说过：“上海跟中央很紧，人家《学习与批判》发表文章，讲的是中央的话，……广东不知道，还要反对一通。”看，他早已供认他对“中央的话”，即“四人帮”的话是很清楚的。

一九七六年春天，张春桥抛出“半截子革命”论之后，正是“四人帮”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出笼之时，“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连篇累牍地抛出反动文章，大肆谈论“民主派”、“走资派”，甚至把老干部比附成“章太炎式”的人物，企图打倒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教授先生对于这一点也心领神会，亦步亦趋。他在讲话中，谈到严复、章太炎从“尊法反儒”转变到“尊儒反法”时，唯恐听众不明白其中寓有的深意。接着就“联系实际”说：“在今天……有的人却停留在辛亥革命，有的人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变成走资派，这不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吗？”不错，的确值得我们注意。因为教授先生很“高明”，臆造了两个“停留”，就把我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统统打成“走资派”。

教授先生：我们正告你，你所说的严复、章太炎半截子革命与你所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变为走资派”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你抹煞了无产阶级革命家与资产阶级革命家之间的本质区别，搞乱了个别与一般、局部与全体的关系，还把人们在阶级斗争中的两种转化的可能性“合二而一”。教授先生打着学点哲学史的招牌，肆意歪曲哲学史和历史，大搞影射比附，这种出卖灵魂的卑鄙行径，在政治上、科学上堕落到多么可耻的地步。

评广东某教授的实用主义史学

蒋相泽

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是“四人帮”反动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他们的影射史学就是一种实用主义史学。广东某教授用以为“四人帮”效命的也正是这套把戏。

英明领袖华主席指出：“‘四人帮’那一整套理论、路线、政策、思想、舆论和他们那个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是一种极端腐朽、反动透顶的上层建筑。”实用主义史学就是一种极端腐朽、反动透顶的史学流派。它自二十世纪初开始在美国流行。它完全否定历史的客观真实性，认为一切历史著作都不可能反映客观实际，都只能是历史家主观臆造的产物。他们鼓吹不可知论：借口“实在的历史”已经过去，不能直接观察，史料又不能详尽无遗地把一切细节都记录下来，历史家选择、安排、解释史料又是各人根据自己的观点，因此便断定“写的历史”“必然是主观的”，“实在的历史”“不可捉摸”^①。他们搞相对主义：借口历史事实可以分解为无数细节而同时又与更广的事实相联系，便硬说历史家所论述的事实都是各自随意摘出来的，没有客观真实性，不得谓谁真谁假；借口对同一历史事件各个时代各有不同的写法，便硬说观点变了历史就得跟着变，不得谓谁是谁非。他们玩弄所谓“现在主义”：借口写历史是为了现在的需要，便认为一切历史著作都只不过是反映“现在”的形势，甚至公然宣称，他们写书时就是“经常使过去从属于现在”^②。说来说去，无非是要“证明”：史学不可能反映客观真理。历史，你怎么解释都可以，怎么制造都可以，只要能满足“现在的需要”，即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就是真理。从买办文人胡适到“四人帮”的别动队梁效、罗思鼎之流都是这样干的。

广东某教授干得尤为卖劲。他把“实在的历史”撇开，把他“写的历史”变成一团泥巴，“四人帮”订什么货，他就捏出什么货，只要能不辜负主子的期望就行。孔丘去见卫君夫人南子这件事，在一九七三年的“报告”中，他说成是孔丘“好色”；到一九七四年初，为了配合“四人帮”搞“三箭齐发”，他就说成是孔丘“走后门”，想通过南子当大官。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只把儒法斗争讲到战国，《简明中国哲学史》的一九七三年版也只讲到汉代；“四人帮”“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谬论出笼后，他便“努力赶上”，不仅大肆鼓吹

要以儒法斗争作为编写中国通史和中国哲学史的“主线”，而且还把封建制反对奴隶制复辟的斗争拉长到一千年之久。他在旧著中讲到孔丘对殷周文物制度的态度时曾说，孔丘一面搜求殷周的典籍，一面便表示拥护；接着还举出“孔子善殷”、“吾从周”两条材料，说明孔丘对殷礼周礼都一样重视，“并没有什么畸轻畸重的态度”；可是，当他追随“四人帮”恶毒攻击周总理、诬陷打击邓小平同志的时候，这件事却被改成：“孔老二为了‘复礼’，就要从搜集材料中研究一番。研究来研究去，他认为最完备的还是西周的‘礼’，还是周公所制的‘礼’最好。所以结论是：‘吾从周’。”他这类为适应“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需要而任意摆布历史的例子，举不胜举。而且无论怎样自打嘴巴，教授都不会脸红，甚至还板着面孔训斥别人不该否定儒法斗争延续到现在，不该说没有“现代的孔老二”。

这并不奇怪。教授既已滚入实用主义的泥潭，在他的心目中，当然就没有“实在的历史”，没有判断是非的客观标准。他最钦仰的、立志要效法的上海“四人帮”余党就曾明目张胆地说：“司马迁怎么知道李斯的思想活动呢？”“司马迁就是敢写。”梁效某顾问也说过：“只有写的历史，没有实在的历史”，“你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这些黑话都表明，“四人帮”及其吹鼓手那样肆无忌惮地糟蹋历史，正是以上述西方实用主义者的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为依据的。

列宁说：“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就必然使自己不是陷入绝对怀疑论、不可知论和诡辩，就是陷入主观主义。”^③“四人帮”的吹鼓手，和他们的西方祖师爷一样，都是一伙主观唯心主义者。

许多历史现象虽不能直接观察，但不能借此就断言“实在的历史”不可知，“写的历史”就必然是主观的。毛主席在论到知识来源于直接经验之后接着就说：“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④可见，认识历史，问题不在于能不能直接观察，而在于我们掌握的史料是否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对史料加以分析、对照，其可靠性是可以鉴定的；通过可靠的史料，实在的历史是可以知道的。实用主义者把“实在的历史”和“写的历史”绝对地对立起来，故意抹煞后者反映前者的可能性。

历史家当然带着各自的观点去选择史料，但却不能任意确定历史事实的相互联系，而是必须根据这些联系去选择史料。历史家只能反映这些联系。观点错了，就不能正确反映，正好说明，历史家不能制造这些联系。

即使对同一历史事件，各个时代的写法也会有所不同，但不能借此就认为已经过去的历史事实会因时因人而变异，更不能说因为会“变”，就无所谓谁是谁非。历史之所以要改写，并不是因为历史家可以任意改变历史，而是因为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在发展。对历史的认识，和对其他事物的认识一样，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

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⑤一个时期的认识，有它的相对性，所以后一时期的认识提高了，就要改正前一时期所写的历史。但相对当中仍有绝对真理的因素，不能把相对性绝对化而认为新观点和旧观点都是同样片面或同样合理的。新观点否定旧观点，高过旧观点，但同时也吸取了旧观点中的积极因素。史学思想就是这样向前发展的。其所以如此，又是因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在向前发展。可见，并不是历史事实在跟着历史家的观点变，——历史家不论有多大神通，也不可能改变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事实；相反，正是历史本身的发展在决定着历史观点的发展。

实用主义者的谬论都是诡辩。他们以为借此就可以肆意制造历史，殊不知这样一来，就恰好表明，他们把历史也变成了商品。制造商品，就得看行情。上述某教授的那些表演，正是不断伪造历史以迎合政治行情的典型。

某教授表演得最充分的还是“现在主义”。

“四人帮”在“为当前政治服务”的幌子下，命令他们的别动队把历史写成“政治性文章”，要有“针对性”和“强烈的现实感”，要揪“现在的儒”，利用历史借题发挥，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大造反革命舆论。教授急起直追，一再叫嚷要“很好学习上海的文章，学习人家的战斗性和针对性。人家的文章虽然没有点名，但一看就知道是指谁”。从这些黑话可以看出，某教授之流和他们的西方祖师爷一样，也是借过去来讲现在，“使过去从属于现在”，只有一点稍微不同，那就是：西方实用主义者的主子是在台上，他们以古喻今时可以明说；“四人帮”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搞阴谋，要“喻”只得“隐喻”。因此他们的现在主义史学又势必弄成影射史学。

研究历史当然是为了现在的需要，从来没有为研究而研究的史学。但是，“现在”只能向史学家提出问题。要回答问题，还得去研究。假如预先已有答案，还研究什么呢？西方实用主义者所谓的“使过去从属于现在”，买办文人胡适所谓的“大胆假设”，都意味着预先已经有了答案。“四人帮”的爪牙更是完全秉承主子的旨意来炮制文章，某教授也说要按照他那个“中央”（即“四人帮”）的“指示”。他们哪里还有一丝一毫的研究可言，只不过是为己有的结论编造论据罢了。这样就必然会有两种做法：一是以今论古，即拿现在的特征去套过去，把历史现代化；一是借古谈今，即挑出一些史事来比附现在。这就不仅没有研究可言，而且也没有历史可言了。

某教授在这样做的时候，其手段之卑劣，比“四人帮”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一九七六年六月的“报告”中，秉承“四人帮”抓“当代大儒”的黑指示，硬把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同志同没落奴隶主阶级代言人孔老二胡扯在一起，先设下“邓小平是现代的孔老二”这个结论（假设），然后再来比附（求证）。他以今论古，把历史现代化，硬说孔丘搞过“整顿”，并替孔丘编制三个整顿项目：“克己复礼”；“整顿音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说这是“为了复辟奴隶制”。接着便借古喻今，把邓小平同志根据毛主席指示进行的整顿污蔑为“复辟”，拿孔老二的复辟来相比。接着便比到周总理的身上，说孔丘

是“吾从周”，然后就说“从这方面看，邓小平的思想也是从孔老二那里来的”，意即也是“吾从周”！接下去便连比附也不要了，突然挑出“死而后已”这句话，说是孔丘讲的，然后咬牙切齿地反复咒骂，借骂孔丘“死而不已”来发泄他对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周总理的刻骨仇恨。

孔丘从来没有讲过整顿，更没有实行过整顿。“克己复礼”，某教授以前的解释是：“克制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己的行动，回复到原有的礼制范围”。把“复礼”说成“复辟”，是某教授为了迎合“四人帮”而另创的“高见”。孔丘整理《诗经》和音乐，不是在他做官的时候。“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则根本不是孔丘的话，而是儒家对周初政治的追述。那些已经灭绝的国和家，孔丘既没有权力来兴继，也没有主张过要兴继。孔丘也没有推荐过什么“逸民”。“死而后已”也不是孔丘说的，而是曾参说的。西方实用主义者搞“现在主义”，是以例证代替研究，找历史事实来适应预定的公式，买办文人胡适也还说要“小心求证”，而某教授却是以捕风捉影冒充例证，用彻头彻尾的捏造来顶替史实。这是他投靠“四人帮”而把实用主义发展到极端的必然结果。

为现在的需要而研究历史，决不是要“使过去从属于现在”。现在和过去有质的差别。历史不仅是客观的事物，而且还有古今的界限，所以研究历史，更要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⑥实用主义者则相反，他们既不承认历史的客观性，更不承认历史有什么规律性，因此也就无所谓“去研究”。他们直供不讳，宣称他们要做的，是“把那些有助于说明现在的事实抽出来”^⑦，“四人帮”正是承袭了这种衣钵，只是换一种说法，叫做“事实服从路线需要”。这就是说，不是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而是将事实从当时的历史整体中抽出来，并且还用来比附现在，不顾古今的差别，这怎能不弄成歪曲、篡改和捏造呢？

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才能使历史对他们“有用”？这是因为“四人帮”代表腐朽没落的地主资产阶级，他们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他们害怕历史规律，害怕真理，因此只有伪造的历史才能为他们所用。广东某教授要不断伪造历史才能够“紧跟”“四人帮”，不也证明了这一点吗？

①②⑦ 詹宁斯·桑德斯：《历史观和美国历史家的史识》，1966年英文版，第47、38页。

③ 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6页。

④⑤ 毛主席：《实践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4—265、260页。

⑥ 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59页。

招 牌 的 效 用

廉 锴

一九七六年，在友谊剧院的一次讲演中，广东某教授于口沫横飞之际，竟然宣称：“孔老二搞修正主义！……”

对于这个令人瞠目结舌的“高论”，当时听众心里怎样想？无从一一考究。不过，腹诽者是有人在的——

“孔丘是儒家学派的祖师爷，孔孟之道的创始者，他‘修正’了谁？这样脱离历史实际的胡乱类比，怎么行呢？”一位朋友事后惊诧地说，“他还是个批孔权威呐！”

这位朋友的惊诧和诘难自然是有道理的，不过，他到底过于忠厚，竟真的以为某教授确在批孔，从而觉得，象某教授这样的“权威”，竟然说出那一类昏话来，不免替他着急。

这其实是不必的。考察一下他整个讲演的内容和实质，从他对毛泽东思想体系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歪曲篡改，对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副主席的恶毒攻击和诬蔑，以及他那一套假左真右的言词中，可以明白无误地发现，此人的全部出发点和目的，就在于欺骗不明真相的群众，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他的那块“权威”招牌，不过是借以顺利行骗的幌子而已！

旧社会，有一类骗子集团，他们利用人们对于“权威”的信赖心理，派遣成员，装扮成为各式各样的“权威”，如达官、名士、阔老之类，去接近行骗对象，取得信任，然后引其入彀。充当这一类角色的人，在骗子集团中往往颇有地位，所分到的赃物，也较别的成员为多。大抵这种人选标准较高，不是总能物色得到的缘故。

“四人帮”也是一个骗子阴谋集团。所不同的是，他们的目标是要篡党夺权。这就需要下更大的本钱，特别需要那类具有“左派权威”招牌的人物。对于这种理想角色，那怕出再高的价格，也愿意收买。一个要买，一个想卖。某教授看准了这一点，急不及待地挂勾搭线，卖身投靠。果然一拍即合，奉为上宾，宠遇有加。而我们的教授先生也当真不负主子的厚望，从疯狂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到指责广东省委不紧跟“帮”中央；从竭力鼓吹“儒法斗争贯穿古今”到胡扯“孔老二搞修正主义”，都是他的“特殊贡献”。由于此人有一块“权威”的招牌，确曾一度使一些人上当。

某教授大概一直做着将来能在“四人帮”的“人肉筵宴”上，比别人多分一杯羹的美梦罢？梦再美，也是梦。“四人帮”轰然塌台了！教授先生终于输得干干净净，包括他的那块“权威”招牌。这，却是他所始料不及的了。

忠 肝 涂 地

牧 惠

已经不是新闻了：“四人帮”在评论《水浒》时抛出的“架空”说，基本上剽窃自金圣叹。唯一的大发明，是江青那个让人笑掉大牙的惊人之论：宋江拉卢俊义上山，为的是“架空”晁盖。

虽说有“事实服从路线需要”的“帮规”，但是，《水浒》却白纸黑字，即使“女皇”开“金口”也无法改变。要象金圣叹那样再去“发现”一个晁盖死在卢俊义上山后的“古本”，看来也着实困难。于是，梁效们马上静悄悄地补漏洞，发现宋江拉卢俊义上山，其实为的是排挤吴用。

姑且不去讨论在小说中卢俊义上山后是否排挤了吴用，也不去评论《水浒》所刻划的宋江会不会排挤吴用，应当说，梁效们的发明，最少要比拉卢俊义上山架空早已“归天”的晁盖要更能自圆其说，更能巧妙地达到江青鼓吹“架空”说的反动目的。

以前以为，江青这一发明引起的波澜就到此为止了，谁知还有未出笼的新闻。

事情涉及到咱们广东的某教授。

教授的本行是哲学史，在评论《水浒》成为时兴的日子里，当然也不妨“破门而出”，谈谈宋江。教授批孔批出好多奇文，评《水浒》也评出新闻。在一篇既批孔丘，也谈《水浒》的文章中，教授对《水浒》的一个很有“水平”的高见是：“宋江拉卢俊义上山后架空晁盖”。请注意：加上一个“后”字，比江青还要明快，干脆！

说出这样的话，需要一种特殊的勇气。如果说某教授一如江青不学无术，在那里开“黄腔”，似乎与他的学者身份不大符合。更大的可能性倒是表白自己的紧跟。

有不同的紧跟。

主子说：煤球是白的，皮球是方的。“理论家”马上修补一番说：沾上了石灰的煤球是白的，某时某地确曾有过一个用皮革做成的、叫“球”的见棱见方的匣子。这是梁效式的紧跟法。

另一种学者则不同，他说：煤球端的比元宵还要白，凡球都见棱见方。这是某教授的紧跟法。

把两种紧跟略加比较，也很有意思。梁效式的补漏洞法，固然有点象给鬼脸涂上雪花膏，有助于掩盖青面獠牙。但是，鬼脸常在。人们对比一下，不是会发现江青的丑态、并且有可能被他们的“老娘”指为“对着干”的危险吗？这种跟法，显然不够紧。某教授的做法，虽然有点迹近指着未涂雪花膏的鬼脸叫美，搞得不好也有被“老娘”加

上“扩散黑材料”罪状的可能；但是，平心而论，某教授到底要比梁效付出更大的代价，包括自己那块学者的招牌。按质论价，在这个问题上，某教授应得到更多的奖赏。

某教授竟然走得比梁效远，乍一听来，让人很难相信。其实，细细一想，也不无因。梁效的底细，在“四人帮”横行时，人们虽然未必尽知，但那是迟群豢养着的一条走狗，却又早已了然。对于他们的奇谈怪论，人们早就不肯买帐。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注意一下货色的装璜。教授则不同。知名的学者，讲的又是“学术”。人们“聆听”之后，虽然未必马上相信卢俊义上山后果然架空了晁盖，但总得疑心是否端的发现了一种最新的“古本”。这就是某教授比梁效的价值所在。对于这一点，“四人帮”明白，教授想必也清楚。因此，就得在某些方面较之梁效有点独创性，以显示自己果然不负所托，不是一般地追随之已。如果需要，找论据说明高俅原是造反派，林冲才是压迫者，大概也不是完全无法可想的。

鲁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讲到旧戏舞台上有一种叫做“二丑”的脚色。他们“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他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作恶之余，还会“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

二丑这一手，虽然可以给观众增添笑料，主子却肯定不喜欢。因为二丑料到自己所靠的是冰山，早晚要完蛋，所以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教授则不然。“尽己谓之忠”，“尽己只是尽自己之心，不要有一毫不尽”。拿大儒朱熹的标准来衡量，教授可说当之无愧。既有“上等人模样”，又无“义仆的愚笨”，可谓“兼美”，当然非常理想。

然而，这样一来，不就有点象那个“义胆包天，忠肝涂地”的宋江了吗？

批孔大师按朱老夫子的调子跳舞，批宋江的学者到头来与宋江为伍，这未免有点煞风景。然而事实。

广东省史学工作者进一步批判某教授

广东省史学工作者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联系实际，批判某教授为“四人帮”推行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制造“历史根据”的罪恶活动。

继广东省社联召开揭批“四人帮”大会之后，中山大学也召开批判大会，揭发和批判某教授在七四年之后，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的反动言行。发言的同志着重揭露某教授打着反孔的旗号，污蔑攻击敬爱的周总理，放肆地攻击邓小平同志，为“四人帮”推行其反革命政治纲领捏造历史根据的政治投机商的丑恶嘴脸，和他恬不知耻，妄图搞一个所谓“史学样板戏”的政治野心。

与此同时，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简明中国通史》编写组、华南师院的史学工作者，也积极投入揭批某教授的战斗，纷纷撰写批判文章，批判某教授的各种谬论。

剥 画 皮

原 璞

“四人帮”与林彪，本来就穿连裆裤。他们导演的所谓“批林批孔”，其实是不批林，假批孔。卖身投“帮”的广东某教授，当然亦步亦趋。他按照“帮”的需要，对孔老二虚幌一枪之后，索性给林、孔唱起赞歌来。他在一九七四年二月一连讲了三个半天的所谓批林批孔的报告，就是见证。

这里只讲某教授“批林”的一例：

林彪、陈伯达他们讲“知无涯”，就是说他们的知识非常多，多得不得了，无边无际，过去未来都知道，既无空间的限制，也无时间的限制。（“无涯”出自《庄子·养生主篇》）

既然说出自《养生主篇》，就不妨查一查原文，果然有这样一段：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译成现代汉语，意思就是：我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这就困难了。那么，林彪、陈伯达讲的“知无涯”，又如何可以得出某教授那样的解释呢？

要说出奇，上面这种解释已经够格；接着，教授又进一步对“知无涯”作了注释：

“知无涯”，“独来独往”，不受任何限制，不受实践检验，这同孔孟所说的“生而知之”，“良知良能”不是一模一样吗？

这真是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胡涂了：为什么《庄子》的这句“知无涯”竟然同“独来独往”一样，变成了“生而知之”之类的天才论了呢？

教授饱读诗书，又有专著讲哲学史，尽管改来改去，让人捉摸不透；但是，说教授连《庄子》这一段话的原意也没有弄清楚，无论如何是有欠公允的。看来，说他装模作样地批林批陈，然后借批来恭维，吹捧林、陈“知识非常多”，倒还有点切题。须知：在长达三个半天的报告中，某教授对林彪、陈伯达从未用过“反党分子”四字。

形象思维续谈

李泽厚

关于形象思维，最近收到一些询问和意见，其中一个中心问题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关系。想围绕这个问题，讲三点：一、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区分、先后、优劣等问题；二、从美感看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关系；三、所谓形象思维的“逻辑”。

（一）

“形象思维”这个词，本身看来似乎就有矛盾，因为在一般习惯中，思维一词通常狭义（严格意义）使用，主要是指脱离开表象（即形象）的概念、判断、推理。所以，有人说形象和思维联在一起就不通，主张用“艺术想象”来替代它。形象思维本意的确是指艺术想象，但它比“艺术想象”作为科学术语有一个优点，就是它包含有“思维”这个语词而能表达出反映事物本质的语义，而“艺术想象”这个词就不能表达出这种含义。把形象思维简单说成即是想象、联想和幻想，是很不准确的，因为联想和想象可以是作梦，可以是随便乱想，不反映事物的本质规律。“形象思维”这个词本身就有要求艺术创作去反映事物本质的意思。所以，这个语词终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术语，解放后广泛流行，不是偶然的。形象思维可说是能达到本质认识的艺术想象。当然，“思维”一词在这里就是广义（宽泛意义）使用的了。

一些人感到形象思维很神秘，其实不然。在日常生活和日常思维中，常常有形象思维的成分（也只是成分）。日常思维中既包含有抽象思维（即逻辑思维）的成分，也包含有形象思维的成分，既有概念、判断、推理，也有表象、意象、想象的活动，它们经常渗透混合在一起。正是从这种日常思维中，分化出高度发展的科学思维和艺术思维，就是现在一般讲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黑格尔也把思维分成三种，与此大体相当，见《美学》第三卷绪论）。科学家为了对事物进行深入的认识，经常必须尽可能地舍弃事物的形象表象，使自己的思维运行在高度抽象化的概念推移之中，作出判断和推理，有时任

何形象表象都没有也不能有。例如数学家的演算、黑格尔的《逻辑学》都是这种高度抽象的逻辑思维。另一方面，艺术家则主要用形象思维，尽可能地甩开抽象的概念、判断、推理，使自己沉浸在想象和幻想的形象世界里，与想象中的人物、环境、事件打交道，描绘它们，抒写它们，好象它们都是真实存在着似的，与作家同呼吸共命运。古今中外作家创作谈中这种事例讲的不少。以前有人说，作梦的人经常不知道自己是在梦里，艺术家的创作有时也有类似情况，他沉浸在自己编造出来的艺术幻梦之中。作梦是没有多少逻辑思维的，一个形象连着一个形象，有时非常合情合理，有时则变化无常毫不规则。艺术创作当然不是作梦，把艺术和梦等同起来是资产阶级的理论；但在非逻辑思维这一现象上，两者又确有类似之处，它们都是形象的推移。但艺术创作作为形象思维，它不只是形象的推移，而要在这推移中反映出事物本来的规律，这与作梦便不大相同了。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与逻辑思维是共同的。

恩格斯说：“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21页）。用“表象”来反映现实是文艺，用“概念”来反映现实是科学；也可以说，表象是形象思维的细胞，概念是逻辑思维的细胞。拿文学来说，它的基本材料是语词，每个语词都是在进行概括，都有一定的抽象性。但词和词并不一样，有的词和表象关系很密切，提到这个词就容易浮现出某种形象表象，例如前门、天安门等等，这是一种表象性的语词。有的词则离形象很远，甚至根本没有形象，许多科学概念，如真理、生产关系、虚数、控制论等等，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表象，任何形象表象都没法表达这种高度抽象的本质概括。这才是真正概念性的语词。很明显，文学和科学虽然同样用语词，但前者主要应该以表象性强的语词作材料，少用那些不能唤起形象表象的词汇。

从语词概念和思维发展来看，表象词汇和形象思维在日常生活和日常思维中，早期所占比重更大一些。拉法格在《思想的起源》中说，原始人没有硬、软、热等抽象概念，只有“象石头”、“象月亮”、“象太阳”。在我们看来是很具体的语词，在原始人那里还是很抽象的。概念如此，判断、推理亦然。某些少数民族往往用某种形象的比喻，某种动物的性格和关系，来表达某种判断和推理。他们还不习惯用抽象思维。儿童也是这样。对儿童进行教育，经常要用寓言来表达某个逻辑的道理。在现代生活中，概念性的词汇则是愈来愈多。自然科学一大堆术语就渗入日常生活和日常思维之中。可见，从认识论历史看，无论是原始思维和儿童心理，在日常思维中，都是抽象思维的成份和比重随着人类的发展和个人的成长而逐渐增大。这说明抽象思维（逻辑思维）是人类思维极大的成果。列宁说，表象不能把握每秒三十万公里的运动，而概念能把握它。（见《哲学笔记》）说明用形象表象把握、反映、认识事物的某些或某种本质规律，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困难。作为认识来说，形象思维当然不及逻辑思维。人们认识世界主要靠并越来越靠逻辑思维。

这是不是说艺术低于科学，形象思维低于逻辑思维？不是。因为艺术不只是认识。如果艺术只是认识，那人类干吗要两种认识？一种就够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后面还要讲到。这里只讲，即使把艺术作为认识，形象思维也有非逻辑思维所能替代的方面。列宁指出过，逻辑思维中的概念，总是对不断运动着的现实事物的一种僵化、宰割。就是说，从概念开始的逻辑思维，反映现实时，总要去掉现实对象中许多生动活泼的东西，总是从一个角度、一个方面去认识世界。形象思维则不然，由于它的方式、过程和成果都离不开形象表象的活动，它给予人们的便是如同生活本身那样的一个多方面的活生生的整体，而科学和逻辑思维给人的总是一个方面或片面。在这个意义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比当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所提供的材料就还要多；《红楼梦》提供的满清贵族上层生活材料、情景，也比当时任何历史记载和后人的分析研究，要更为具体细致，丰富生动；说它们都是当时社会的百科全书，就是这个意思。艺术是丰富生动的生活本身的整体再现。所以，从认识来看，科学与艺术，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也各有所长，何况艺术的本质还不尽在认识。

在同样用语词作单位的文学创作和理论论著中，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关系、比重，情况又是多种多样，错综复杂的。理论论著中可以有充满情感的和形象表象的语句，长篇小说中有时也不乏大段的议论说理。但所有这些又都只居于次要、从属、辅助的地位。同是文学创作，诗与散文也不一样。在有些散文中，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非常接近甚至彼此重合。中国古代一些散文，既是议论文章，又是文学作品，就如此。所有这些问题，需要以后作细致的专门研究。

（二）

逻辑思维作为形象思维的基础，也是一个搞得比较混乱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提法不能作狭隘理解，就是说，不能理解为在任何艺术创作、形象思维之前，都必须先有一个对自己创作的逻辑思维阶段以作为基础。诚然，有些创作和形象思维是这样的，例如写一部长篇小说和多幕剧本，经常先拟提纲，确定主题，安排大体的人物、情节、场景、幕次等等，很多逻辑思维。但是，即兴创作、即席赋诗，甚至有时在梦中获得佳句，就不能这么说了。其他艺术更是如此。因此，说逻辑思维作为形象思维的基础，是在远为深刻宽广的意义上说的。这里想通过美感来作点说明。美感一般来自对艺术成品的欣赏，但从艺术家创作的成果，来看艺术创作的起点和过程是有好处的。

美感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它的直觉性。多年来许多人不敢谈这个问题，其实这是一个人所熟知的普遍存在的心理事实。欣赏一件艺术作品，看到一个漂亮形象，审美愉快直觉地产生出来。经常不是让我考虑考虑之后，再决定去判定它美不美、应不应该喜欢，而是当下直觉地感到它美或不美，产生或不产生审美愉快（美感），尽管一时还说不

什么道理。如果你直感不到美，即使别人千言万语说它如何如何，你也只能口头上或思想上同意，但仍然产生不了美感（由于审美能力不够，经人指点后，可帮助产生美感，这是另一个问题）。审美是最不能勉强的，好象人的本能——生理感觉似的：苦的东西尽管人说如何甜，尝起来仍然是苦的，无怪乎达尔文甚至普列哈诺夫都把美感说成是一种“本能”。当然，说本能是错误的，因为审美能力和美感愉快并不是一种生理快感，并不是先天具有的东西，它不是动物性的本能。看一幅好画，不是“眼睛吃冰淇淋”，不是生理快感，而是一种精神享受，是人所独有的社会性的美感。在这种似乎是本能式的个人直觉的心理形式后面，其实有着极为坚固深厚的社会功利的理智、逻辑的考虑。只是对个人来说，没有自觉意识到罢了。个人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时代、阶级之中，不知不觉地接受了、承认了、保持了这个社会、时代、阶级的功利、理智、逻辑的考虑，这种考虑成为他的美感的根本基础。尽管你是直觉到它美，但这个直觉不是凭空产生的。你所以喜欢这些东西，是有其阶级的、社会的、文化教养等方面的原因。在美感直觉性中，潜伏着功利的、理智的逻辑基础。普列哈诺夫就这问题讲得很多，举了好些原始民族的例子，也以此论证过十八世纪法国的绘画和戏剧。普列哈诺夫说：“……功利是依靠理智来认识，美是依靠直觉能力来认识的，……功利只能为科学的分析所发现，美的欣赏的主要特征是它的直觉性，不过功利究竟是存在的，是美的欣赏的基础。”这个为鲁迅所肯定和介绍的基本观点，我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一个关键问题。一方面不能否认和抹煞美感的直觉性，另一方面又不能把这种直觉性看做是生理本能和神秘感觉（象资产阶级美学所宣扬的那样），而要看作正是社会的理智的因素积淀在感觉中才可能有美感。这与形象思维的特点便大有关系。

再从美感构成因素来看。美感至少是包含知觉（在文学是表象）、情感、想象、理解四种因素的有机构成。这几种因素不同比例不同方式的组合配列，形成各种不同的美感。例如有的美感是平静、宁适的愉快；有的则激动亢奋一些；有的在愉快中还夹杂某种痛苦和悲伤，……如此等等。这涉及一系列极为复杂的文艺心理学问题，美感是尚待发现和解答的某种未知的数学方程式。

在这几种因素中，理解是很重要的一环。在情感和想象的自由运动中，理解在暗中起着作用。也正因为此，才产生审美愉快，使美感不同于生理快感。快感是由于生理上感到愉快而判定对象是你所喜欢的，美感则是因为你感到对象美才产生愉快，这是大不相同的。而所以感到对象美，则是因为这几种心理因素，其中又特别是理解因素在起作用的原故。这种理解是一种领悟而不是说教，它不是概念认识。可用《四溟诗话》中一段话作为例子：“韦苏州曰，‘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白乐天曰，‘树初黄叶日，人欲白头时。’司空曙曰，‘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三诗同一机抒，司空为优。”司空何以优呢？诗话作者没有说，古人没法看电影，不能发现这位司空的为优，只是不自觉地运用了今天常见的电影蒙太奇：黄叶树、白头人两个镜头一组接，便产生了两个画面之间的第三个意义。对这个第三个意义的理解，正是构成美感、产生审美愉快的重要因

素。这种理解因素当然不同于抽象的概念认识,它比用“将老”、“已秋”之类的确定概念,表达的含义要更多更丰富,更使人心领神会。中国美学传统素来重视所谓“含蓄”,讲究“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若隐若现,欲露不露,……终不许一语道破”,所谓“神余言外”、“弦外之音”以及“计白当黑”,“以少胜多”,“此时无声胜有声”等等,都是说的这个道理,都是要求艺术作品给欣赏者留有自己想象和理解的余地,让欣赏者发挥自己上述那几个心理因素的主观能动性,这才可能产生审美愉快,否则都说完了,说尽了,道破了,知觉、想象、情感、理解都没有活动的余地了,也就不会产生美感。中国美学非常懂得这种艺术的审美特征,几句小诗,几笔水墨,所以能留下那么深厚隽永的意境,就是因为它没有用概念来道破,从而使想象、情感和理解产生合规律性的自由运动,获得一种包含理解、领悟而又非概念认识所能表达或穷尽的感受。

这里所以讲一大堆美感,是为了说明形象思维。创作成果是创作过程的物化和终点,它们有相通、相似和相同之处。欣赏者和艺术家并不隔着一道万里长城,毋宁说只有程度上的差异。艺术家比一般人更具有审美能力或审美感觉,一般称之为艺术敏感、创作灵感、天才等等。一般人只在艺术成果和作品中感受到美感,艺术家善于在生活中,在现实对象、场景、人物、情节、姿态、动作、话语、音调……中去感受、捕捉、发现、探索、追求某种打动他的心灵的东西,这其实也就是一种粗糙的萌芽状态的美感。因为生活中的美是分散而处于原始状态,不象艺术作品那么集中而典型,对它的美感也就可能那么集中而典型。只有善于感受体验,具有艺术敏感的作家艺术家才能发现它捕捉它,以它作为进入创作过程开始形象思维的起点。很明显,这个起点便不是一般的形象表象。一般的形象表象,小孩都有,但并非形象思维。(所以日常思维中的形象思维的成分并不能等同于艺术家的形象思维)作家艺术家形象思维的感知、表象和想象活动与美感相似,一方面有直觉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又有深厚的社会的理知逻辑基础,包含理解因素在其中。作家艺术家在生活中感受到某种形象引起创作冲动,展开艺术想象,进入创作过程,一时不一定说得多少道理,但这决不是凭空产生,而有其深厚的逻辑基础和原因,这种情况与上述美感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样的。“一段情节、一幅图景、一个人物,甚至一块斑痕、一个身影……,所以能够打动作家艺术家,使他感到其中有某种东西吸引着他、激励着他,这些生活素材对他能有意义,使他产生创作要求和冲动,原因就在于被打动者原先就有大量逻辑思维和生活经验的缘故。”(拙作《关于形象思维》)《祝福》据说是一夜之间写出来的,并不意味着鲁迅在这一夜里或这一夜之前才从逻辑思维上研究和分析中国社会,他创作得如此成功,却深刻地说明了他的艺术直感是有强大的正确的逻辑思维作为基础,鲁迅早就对中国社会有长期的深入的研究。

否定文艺创作和形象思维的特征,以及直觉、灵感等等现象,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同样,否定逻辑思维作为上述形象思维以及直觉、灵感的基础,也是不对的。资产阶级美学特点之一,就是歪曲或夸张艺术想象和直觉、灵感,把它们绝对化、神秘化,把文艺创作和作梦完全等同起来,抹煞逻辑思维作为基础的根本意义,把文艺引向反理

性主义，这当然是错误和反动的。

美感是直觉能力，但这能力可以培养。形象思维的能力也是这样。培养也不只是欣赏艺术，而是要提高整个文化教养水平，提高逻辑理解能力。有些人看不懂电影，是由于逻辑理解能力不够，从而感受不到蒙太奇句子所表达的那种含意。中华民族的审美教养本是很高的，我们一定能够遵循形象思维的客观规律，创造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和伟大民族的艺术作品来。

(三)

逻辑思维有逻辑，形象思维有没有逻辑呢？这要看“逻辑”这个词的含意指什么。逻辑思维的逻辑是指概念、判断、推理的规则。例如概念之间的种属逻辑关系，判断的逻辑分类（全称肯定、特称肯定……等等），推理的逻辑规定和格式（如三段论、四名词谬误等等），在这个意义上的逻辑，形象思维是没有的。形象思维不能找出什么判断分类、推理格式来。象什么“草蛇伏线”之类的“小说作法”，只是概念化的扯谈，并非形象思维的逻辑。但如把“逻辑”一词了解为客观规律，那形象思维当然有其自己的这种规律。这种规律亦即是形象思维的特征，即我一九五九年提出的“本质化与个性化的同时进行”和“富有情感”。（参看拙作《试论形象思维》）这两个特征是不可分割的，所以两点实际上是一点，即“以情感为中介，本质化与个性化的同时进行”。

每种艺术都有自己形象思维的独特规律和表现形式。其中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相互关系、交错情况、所占比重、渗透融化很不一样，需要各别作具体研究。但是上面讲的这个规律（“以情感为中介，本质化与个性化同时进行”）还是共同的。因为形象思维的这个规律，不过是美和美感的本质特征在艺术创作中的体现。

美是具体形象性和客观社会性的矛盾统一，美感是个人直觉性和社会功利性的矛盾统一，展示和表现在形象思维、艺术创作中，便是个性与共性、偶然和必然的矛盾统一。艺术创作通过本质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与个性化（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同时进行，把个别与一般（共性）统一于特殊，把偶然与必然统一于典型。特殊、典型（包括意境）也就是“这一个”。它是独特的活生生的个性（特殊），又表现出社会的本质、必然和共性（典型）。它是艺术的美、理想的美或美的理想，给人们以审美愉快（美感）。特殊、典型、意境、美的理想，正是形象思维通过上述规律才能达到的。

但是光讲这个还不够，因为本质化和个性化的同时进行，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呢？形象是如何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呢？这就要讲到“以情感为中介”的问题。

搞任何事情都要有情感。革命工作和科学研究，都需要极大的热情，都要有献身精神。艺术创作于此并无特殊。区别在于，艺术创作的情感是作为形象思维中的一个活跃因素在起作用，与其他活动有所不同。演数学算题，搞革命规划，你如果不压制那沸腾的感情，不极其冷静地考虑研究，就容易出错。情感因素并不能也不需要直接渗入演算

和工作之中,构成思维的组成部分。形象思维则相反,它经常需要情感作为媒介或中介,才能使形象彼此联系推移活动起来。各门文艺创作使用的比兴,经常是通过情感为中介来进行的。“东方红,太阳升”用以比领袖,自然事物为什么能比拟社会人物,这种形象的由此及彼的推移过程如何可能,两个本来并不相关的对象,为何能联系起来,不正是通过情感为中介来进行的吗?人们把对太阳温暖伟大的情感反应与领袖联系了起来。用暴风雨比革命(如高尔基著名的《海燕》散文诗中,呼唤“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用花比美人,也无不如此。它是用对不同对象的相似的和相同的情感,把这些本不相关、不相干的对象联系了起来。此外,还有把情感相反的对象联系起来,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等等。这就是没有情感的机器所不能作到的。机器可以搞逻辑思维,不能搞形象思维。

以情感为中介,使形象由此及彼,推移变换,彼此联系,就能把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方面性作为整体表现出来。现实事物本来是多方面的,它们具有彼此矛盾的性质或特点,人对他们的情感态度也经常是多方面的、矛盾变化和错综复杂的。例如老虎既有吃人的一面,又有勇猛的一面。于是在诗文中既有“苛政猛于虎”之类的咏叹,用老虎来比拟残暴、迫害;同时又有“秦王并六合,虎视何雄哉”,国画中常用老虎为题材,写出那威严雄壮的气派。又如老鼠作为吃粮食令人憎恶的祸害,《诗经》有“硕鼠硕鼠”的比喻。但另一方面,齐白石也画偷吃灯油的小老鼠,“梦破鼠窥灯,霜送晓寒侵被”,老鼠作为夜的点缀,又并不成为可憎反而成为艺术中可爱的小动物了。又如,同一春草既可以是“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的淡淡哀伤,也可以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倔强、开朗,富有生命力……,这种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甚至相反的情感反应和联系,正是使审美和艺术领域无限宽广、千变万化的原因之一。逻辑思维里对同一对象不能同时既肯定又否定,形象思维对同一对象却可以同时既爱又恨,既同情又气愤,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表现出种种矛盾复杂的现实情况和情感态度来。所以,一个人物典型、一种艺术意境,它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和情感意义,经常不是仅用好人坏人、肯定否定两种逻辑判断所能穷尽无遗,形式逻辑的排中律(非此即彼)在这里有时会失去效用。并且,形象思维中的肯定判断有时表示出来的,恰好是情感上的否定意义,否定语句则表现出肯定意义。亲爱者偏称“死鬼”,“你这个好人”是反话,……在日常生活中便多见,更不用说集中反映在艺术中了。这些都是只知道非此即彼的逻辑机器所不能理解和不能作到的(小说创作中,有违背作家主观意志、情感的形象发展的特殊情况,这里暂略)。

形象思维中还包括利用心理学讲的感觉器官中的“联觉”现象,来涂上一层情感色彩。譬如“明亮的声音”,“哗喧的色彩”,声音只有高低并无明暗,色彩只有明暗并不喧哗,但我们完全理解这种说法,这是因为低与暗、高与亮有一种“联觉”(知觉之间的联系)的原故。用在文艺中,“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如王国维所说,“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温度不能用斤两来称,春意也无所谓闹不闹,然而通过这两个具

有联觉的表象性的语词，诗人给对象涂上了一层情感色调，创造出优美的春天意境：轻的晓寒，闹的春意，便成为著名的巧思丽句了。至于情感多与表象性的语词有密切和直接的联系，与概念性的语词则稀薄或没有。这些心理学的常识，这里不多讲了。

文艺创作和欣赏中所谓“移情”也是如此，诗人艺术家把自己的情感转移到对象上去了。且不说象“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晓来谁染霜林醉，点滴是离人泪”……这种所谓“有我之境”，就是象“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这种客观描写式的所谓“无我之境”，也仍然是诗人主观情感态度所决定或选择的。村景暧暧，墟烟依依的景象、意境，不正是诗人对中世纪田园生活的情感态度的表现吗？它们都是以情感为中介，使形象推移，想象活动起来。莎士比亚的博喻，三李诗中的意境，形象都是一个接着一个，以情感为中介，山光水色，五彩缤纷。中国美学强调“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前者要求有可见的鲜明的形象性，后者讲的就是情感性。画面要有情感才是好画，尽管这种情感可以不是直接，而是通过形象的客观描绘表现出来。包括小说创作也常如此，例如鲁四老爷的原型并没有那么坏，祥林嫂的故事原来分散在几个人身上，为什么鲁迅要那样描写鲁四老爷，要把祥林嫂的故事集中起来，这种本质化和个性化的同时进行，不正是由于鲁迅对剥削者的憎恶和劳动者的同情这种情感态度（与理解交织在一起）所决定的吗？形象思维以情感为中介，使想象和理解处在自由的运动中，这就同时把情感客观化，使理解积淀在情感之中，具有理性的内容。可见，在形象思维中，美感这几种心理因素是彼此渗透，融为一体，非常活跃的。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服毒的时候，他嘴里都有砒霜味，甚至连知觉都影响到了。这是逻辑思维一般不会有。由此可见形象思维并不仅仅是一个思维问题。

今天所以强调一下情感，原因之一，在于音乐是表情性的艺术。音乐与书法、建筑、舞蹈这类艺术接近，比它们的表情性更突出。从这类艺术，倒可以看出艺术的本质特征和作用究竟是什么？它是不是模仿？是不是认识？我认为，艺术的本质特征和作用，不在模仿，也不在或主要不在狭义的认识。艺术主要不是教人去认识（狭义）世界，而是教人去行动去改造世界。它主要是使人激励起来，团结起来，去改造自己的环境，而不仅在给人以一种认识而已，它毋宁是给人一种情感的力量。这种情感力量不是生理的，而是包含社会伦理理智的功能在内，这就是我们常讲的教育作用。艺术的教育作用所以不同于读一本理论书籍的那种教育作用，原因正在于它是通过情感上的强烈感染或潜移默化来进行的。艺术的这种本质、特征和作用，便决定了它的思维方式。

既然如此，光从两种不同认识方式，来讲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区别就很不够了，这两种思维不仅是认识方式和认识对象的不同，而是它们作为认识根本含意就有不同。

要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光从模拟或狭义的认识出发，要求音乐、舞蹈等表情性艺术也去模拟现实对象，便违反了这些艺术的形象思维的要求和规律。如果舞蹈从头到尾都充满模拟现实生活中的动作，开机器呀，打风钻呀，便等于哑剧，而不是舞蹈了。如果音乐只是模拟现实音响，便等于口技，而不是音乐了。就连器乐模拟民歌也并不是正确

的道路。表情艺术主要应该通过情感的比拟去进行创作，模拟因素只占极次要的、从属的地位，起点醒的作用而已，例如贝多芬《田园交响乐》中的鸟声、暴风雨声。而暴风雨过后那段极为甜美酣畅的音乐，表现出万物生机勃勃的情景、意境，就根本不是模拟所能做到的。无论中文、外文（英文 Visionary thought, Imaginative thought 俄文 образное мышление），形象思维主要指视觉形象，音乐却诉诸人们的听觉，只唤起某种很不确定的朦胧的视觉景象。然而音乐却能通过特定的意境，表现出具有高度哲理性的深刻思想和主题，这甚至是视觉形象非常鲜明的艺术部类所难以作到的。艺术中的音乐和科学中的数学，同样是人类文化的皇冠珍宝。

音乐是表情的，却与数有极为密切直接的关系。它的形式具有极其严格的数学结构，无论是创作和专业的欣赏都经常会注意、考虑、思索这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在训练、学习阶段。正如作诗填词必先注意、考虑、思索诗句的平仄韵律一样，各门艺术都有其形式结构方面的要求，在创作中必须遵循，音乐在这方面最为突出和严格。对艺术形式结构方面的这种注意、考虑当然是逻辑思维。创作首先必须掌握这种形式技巧，如果连平仄韵律都分不清楚，就难作出好的诗词。但在比较成熟艺术家那里，这方面经过锻炼非常熟悉，在创作过程中便很少再去考虑。会作诗词的人，可以冲口而出，就合平仄，很少考虑是否平声仄声，其它艺术也无不如此。而这是需要经过长期、大量训练才能达到的。所以，说逻辑思维是形象思维的基础，还包含有对艺术形式结构方面的熟练掌握的意思在内。

可见，形象思维完全不是如反对者所说的那么简单，从形象到形象就完了，它不但要求大量的长期的从内容到形式的准备，这准备包括大量的逻辑思维作为基础，而且它本身还是一个调动人的各种主要心理因素，从情感到理解，从知觉到想象，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不断深入的创造性的思维过程。正因为每个人这几种心理因素的情况、特点、配合、比例等等并不相同，有大量的个性差异。有的人情感爱激动，有的人爱冷静地观察，正如有人喜读杜甫，有人爱念李白，有人喜欢《简爱》，有人却喜欢《咆哮山庄》一样。欣赏有这种种美感的个性差异，创作就更如此了。正是在形象思维中，这种种个性差异可以得到丰富而充分地展开，创作出极为丰富多彩各具个性特色的作品出来，这是逻辑思维和科学论著所没有也不需要的（当然这也是相对而言）。总之，形象思维作为中心，既与艺术本质又与艺术个性直接相关，它涉及领域和问题非常广泛，是一个重要的美学课题，需要我们今后仔细研究。

讲得挂一漏万，相当粗糙。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

（本文是从作者在中央音乐学院的一次讲演整理而成）

形象思维是文艺创作的规律和方法

饶 芑 子

《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前后三次提到“形象思维”，明确指出：诗歌创作“要用形象思维”。毛主席的这一科学论断，同样适用于其它的文艺形式，概括地给我们指出了文艺创作的规律和方法。

思维是客观存在的反映。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是人们在一定的世界观指导下反映客观世界的两种思维形式。它们都是从对客观世界的感知出发，但逻辑思维从感知开始，通过逻辑的推理、判断、概括，把具体事物抽象为概念、定义和理论；而形象思维则从具体事物的感知开始，通过对这些具体事物的“观察、体验、研究、分析”，概括和提炼出其中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现象，进行加工、创造，变成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在通常的情况下，科学研究工作者主要是运用逻辑思维，作家、艺术家因为他们要创造的是具有形象性的文艺作品，所以主要是运用形象思维。

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运用形象思维，是同文艺反映现实的形象的特点相联系着的。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文艺区别于其它社会科学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形象性。文艺作品不是以概念的形式、逻辑的论证，而是用具体、感性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所以，作家、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总是努力熟悉生活，把对现实观察的结果，尽可能地形象化，从而做到用自己笔下的艺术形象去感染读者，使读者在阅读作品过程中，有如置身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潜移默化地受其影响。没有形象，就失去了文艺的感染力，就不是文艺作品。形象思维是作家、艺术家根据文艺特点反映现实的思维形式。文艺作品要塑造艺术形象，就不能不运用形象思维。否定了形象思维，就是否定了文艺的特点，否定了文艺创作的客观规律，也就是否定了文艺这种社会意识形态。

形象思维的反对论者曾经把形象思维的特点说成是“不用抽象、不要概念、不依逻辑的”，并以此为理由否定了形象思维的客观存在，称之为“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其实，这是离开了文艺的特点和创作规律对于形象思维的一种歪曲。

形象思维既然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一种思维形式，它和逻辑思维一样，都是客观存在的反映，都必须遵循人们对事物认识的从感性到理性的客观规律。所以，它不但不排除也不可能排除人们认识现实的理性活动。任何思维都是人们大脑认识活动的这阶段向另一阶段的推移，都必然要借助概念、运用抽象，形象思维是思维的一种形式，它当然不能离开这些。我们认为形象思维不同于逻辑思维，并不是说，逻辑思维有理性活动，形象

思维没有理性活动，相反，是在基于它们都具有思维这种共性的前提下，去阐明它们在这一活动过程中的特点，指出形象思维在对事物认识的过程中，这种思维的理性活动始终没有脱离客观具体事物的感性形象。这个过程，不象逻辑思维那样是一个纯粹的抽象化的过程，而是概括化和具体化同时发生、同时进行，是一个概括化和具体化统一的过程。这里，既没有否定概念、抽象、逻辑在形象思维中的作用，也不是用形象来取代思维，而只是说明：这种思维形式的特点是始终伴随着形象，形象存在于这种思维之中。

文艺必须以形象反映社会生活，优秀的文艺必须以典型形象反映社会生活。典型形象是经过艺术概括而出现在作品中的具体鲜明的艺术形象，是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的统一。概括化和具体化的统一，是形象思维的特点，也是文艺的典型化方法。概括化是指作家、艺术家对生活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具体化就是形象的个性化。这两个方面在形象思维活动过程中不是各别的、分阶段进行，而是统一地进行着。关于艺术的典型化，高尔基和鲁迅先生都曾经结合着自己的创作经验，做过精辟的阐明。高尔基说：“假如一个作家能从二十个到五十个，以至从几百个小商人、官吏、工人的每个人身上，抽出他们最特征的阶级特点、性癖、趣味、动作、信仰和谈风等等，把这些东西抽取出来，再把它们综合在一个小商人、官吏、工人的身上，——那么这个作家靠了这种手法就能创造出‘典型’来，——而这才是艺术”。（《我怎样学习写作》第6页）鲁迅先生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我怎样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四卷394页）高尔基说的“抽取”、“综合”，鲁迅先生说的“拼凑”，就是艺术的概括，是指作者根据他的认识对来自现实生活的感性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而这种艺术概括的结果是要创造出“典型”（或者象鲁迅先生所说的“脚色”），即：具有“最特征的阶级特点”和独特的“性癖、趣味、动作、信仰和谈风”的人物形象。所以，在概括化的同时，也就必然要进行具体化、个性化。在这个过程中，作者不是单纯地把各种社会现象的本质抽象出来，而是始终和许多具体的生活现象和人物（如高尔基所说的从二十个、五十个，以至从几百个小商人、官吏、工人到一个小商人、官吏、工人）联系在一起。不过在开始时，作者脑海里浮现的是各种各样的生活原型，后来，随着他对生活认识的深化，这些原型有的被舍弃了，消失了，有的则显现出来，汇合起来，凝聚成新的形象。这种新的形象既是来源于生活的原型，但又和原来的那些人物不一样。他们在作者的脑海里活动起来，作者给他们生命，让他们思考、感觉和行动，使他们愈来愈成熟和明确，直至完成了他的艺术创造。俄国作家冈察洛夫在谈到自己创作时的这一情形说：“作品在脑子里进行着，人物不令人安闲，他们纠缠着，一幕一幕地做出各种样子，我听到了他们谈话的片断……”。屠格涅夫也说：“你感觉在你身旁有谁站着，和你一同走着，——就是这样，一个活人形成了。这有点象梦。你在小说的人物中走来走去，看见自己在他们中

间，——直到他成为我熟悉的老友，直到我看见他并且听到他的声音，我才开始写”。正是因为形象思维的活动过程概括化和具体化是统一的，文艺作品中的典型人物才不会变成抽象原则的化身，而是象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致敏·考茨基》）

许多作家的创作实践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果戈里创作短篇小说《外套》的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使果戈里动起创作欲念的，是当时彼得堡官场上的一则消息：在某机关里，有一个男公务员，他酷爱打鸟，节衣缩食，用工余时间做额外的工作，经过一段长时间，终于积蓄了三百多个卢布，买了一支很好的猎枪。但是，当他第一次坐着小船出去打猎的时候，枪却被芦苇刮到河里去了，他回到家里就病倒了，生命危在旦夕。同事们知道这件事情，就凑钱买了一支猎枪送给他，才使他转危为安。果戈里把这个故事同他在彼得堡机关里看到的许多事情联系起来，它进行加工、改造和提炼。首先，他把原来故事的结尾——同事们凑钱买猎枪一节舍弃了。在果戈里看来，消息中的那个顺利的结局是偶然的、“虚伪”的。在小说里，故事的结局不但主人公的梦想彻底破灭了，连本人也因此而死去，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人物的命运。其次，他把人物活动的具体环境给改变了。在小说里，主人公所在的机关不是消息中报道的那个乐善好施的机关，而是一个极端残酷的衙门，上司是一些又残酷又专制的官僚。主人公在那里是“一个谁也不可可怜的人”，而且死也不单纯是由于外套的丢失，而是在丢失外套之后又遭到了“大人物”的斥责。这就把这个可怜人物的悲惨命运和他所处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再次，他把构成情节冲突的猎枪改为外套。猎枪是一种奢侈品，而外套却是小公务员生活中迫切需要的东西，这就加深了这一情节冲突的社会性。拿现实中的故事和果戈里的《外套》的情节作比较，就不难看出果戈里在创作过程中，是如何根据自己对当时黑暗现实的认识，对现实中的感性材料进行取舍、集中、概括并加以具体化。这就是文艺创作的典型化的过程，也是形象思维的概括化和具体化的过程。

形象思维的反对论者无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否定形象思维的客观存在，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把思维和形象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绝对化了；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把形象思维中认识两个阶段存在的不同形象（原型和典型）混淆起来，把形象思维始终不脱离形象的特点，看成是“不经过抽象”、不要理性认识。这两个方面都说明他们看待问题不是从实际出发，不去研究文艺创作的具体情况，反映了他们头脑里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形象思维的特点，是在思维中自始至终不脱离具体的感性形象。在形象思维过程中，作家始终是在思索、创造形象。所以，我们可以把形象思维理解为是不脱离形象的思维，对形象的思维或者是思维形象，因为它最后就是要创造出能够反映现实生活的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过去有的同志承着别林斯基、高尔基、法捷耶夫等关于“用形象来思考”的说法，把形象思维解释为“用形象来思维”或者“凭借形象来进行思维”，这种解释在语义上是不够明确和科学的。因为别林斯基、高尔基和法捷耶夫，虽然都在不同的情况下采用过“用形象来思考”、“用形象思索”的提法，但他们主要是在于说明下列两个

方面的问题：一是指出和强调文艺以形象反映现实的特点；二是解释艺术想象和说明想象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性。例如，别林斯基在一八三九年的《智慧的痛苦》中说：“诗人用形象来思考，他不证明真理，却显示真理”。高尔基在一九二八年《我怎样学习写作》一文中也用了“用形象来思索”的提法，但他主要是用来说明艺术的想象的。他说：“想象在其本质上也是对于世界的思维，但它主要是用形象的思维，是‘艺术的’思维”。法捷耶夫在一九三〇年《争取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艺术家》的演说中说：“科学家用概念来思考，而艺术家则用形象来思考。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艺术家传达现象的本质不是通过该具体现象的抽象，而是通过对直接存在的具体展示和描绘。”可见，他们主要都不是在说明思维本身的问题。如果我们引用他们的这些提法来概括说明形象思维和他的特点，显然是不恰切的。过去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某些争执，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这种语义上的不明确引起的。

《杜国庠文集》重印

人民出版社最近重印发行了《杜国庠文集》。

《杜国庠文集》是广州的“杜国庠文集编辑小组”编辑，于一九六二年由人民出版社发行的。《文集》编入杜国庠同志一生的主要著作，有郭沫若和侯外庐的《序》，王匡的《后记》。

杜老的文集，是以《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便桥集》三部书为骨干，再加上其他的一些篇章汇编而成的。全书按内容排定次序，共分成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先秦诸子思想的研究，包括《先秦诸子思想概要》、《论〈公孙龙子〉》、《荀子从宋尹黄老学派接受了什么？》、《论荀子的〈成相篇〉》、《从荀子的〈成相篇〉看他的法术思想》、《荀子对诸子的批判》、《中国古代由礼到法的思想变迁》、《关于〈墨辩〉的若干考察》、《阴阳五行思想和易传思想》、《杂言家之作始者吕不韦和〈吕氏春秋〉》、《略论礼乐起源及中国礼学的发展》等十一篇。第二部分是关于先秦以后的古代唯物思想的研究，包括《两汉经今古文学之争论》、《二千余年前杨王孙的赢葬论》、《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及其思想动向》、《魏晋清谈及其影响》、《杨泉的水一元论》、《范缜的唯物思想》、《披着“经言”外衣的哲学》等七篇。第三部分主要是批判玄学的文章，以及近代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包括《论“理学”的终结》、《玄虚不是中国哲学的精神》、《玄虚不是人生的道路》、《评冯友兰的新形上学》、《戊戌变法运动的思想侧面》等五篇。第四部分是读书札记，包括《红棉屋札存》共十三篇。第五部分是逻辑的研究，包括《为什么逻辑离不开认识论？》、《惠施、公孙龙的逻辑思想》、《该怎样看待墨家逻辑》、《墨家的逻辑也没有和认识论分家》、《关于“因明”》、《“因明”没有脱离认识论的立场》、《学习逻辑最好在大辩论中学习》、《要学好〈实践论〉，应该“学点逻辑”》等八篇。

郭老为这本书写的序言，首先写进了他吊唁杜老逝世的两首诗：

铁窗当日着南冠，松柏后凋阅岁寒。
早赋壮怀常落落，晚成大器自磐磐。
东游共席推心腹，西狩同舟沥胆肝。
尽翳成风臣善斲，郢人不作抚斤叹。

生死交游五十年，老兄风格胜前贤。

墨名绝学劳针指，马列真诠费火传。

夜雨巴山窗尚在，风云潮汕榻尝联。

便桥一集成千古，手把红棉读逸篇。

郭老在这两首诗里，抒发了他同杜老“生死交游五十年”的深厚战斗情谊，赞颂了杜老运用马列主义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所取得的卓越成就。

从文集的全部论著来看，杜老的研究，涉及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各个阶段，而以先秦时代为重点。

杜老是“抑孔扬墨”的。认为，孔丘崇尚礼，同时也提倡仁，前者是他所因，后者为他所创。杜老批判了孔丘的守旧和蔑视庶人，但对“仁”的学说仍有所肯定，一分为二地指出在孔丘思想中，落后的因素超过了进步的因素。

杜老认为，儒墨两家，在先秦都是著名的学派。墨子在青年时代曾受过儒者的教育，当他发现了儒家的礼，繁文缛节，不是一般民众所可行，厚葬久丧，也不适合于当时的急务的时候，便毅然离开儒家而另创墨家学派。墨子主张节用节葬，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而又要尊天事鬼。墨子这些主张，虽各明一义，但不是随便杂凑，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一般地说，就是墨子说的“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杜老对荀子思想的研究，同样具有独到见解。认为，由于荀卿广泛地研究了哲学、政治、经济以至于文学，和批判了战国时代百家之学，就是儒家学派，除了仲尼、子弓以外，也不能幸免，所以能够吸收各家的积极的因素，以壮大自己的体系的规模。荀卿受宋钘的影响很大，唯物地接受了宋子的自然天道观，在先秦诸子中，是最富于唯物主义的因素的。荀卿的礼论，大体虽继承着孔子的思想，但把它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法术思想也占荀子思想的重要部分。一方面他把礼的内涵扩大，几乎变成“法”的同义语；另一方面他言礼，也同时言法，有时礼法连称，有时以“礼义”和“法度”对举，礼与法几乎没有轩轻。有时甚至把法估计得极高。他就这样地做了由礼到法（也即是由儒家到法家）的一座桥梁，给韩非奠好了法术理论的基础。

杜老把先秦诸子思想的内在联系，深刻揭示出来。正如他在《先秦诸子思想概要》一书中所说的：“整个的先秦诸子的思想，在客观上现出了一种好象有机的组织的样子——互相制约、互相依存，家和家之间，派与派之际，有着某些斩不断的葛藤。研究诸子的思想，必须‘知人论世’地从这些葛藤中间去找出他们的来龙去脉，才能正确地把握一家、一派、一人的思想的真面目。”从这些论述中，清楚地看出杜老反对把先秦诸子思想看成了不相涉，绝对对立。

杜老把先秦诸子思想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他认为，战国时代学术史上的“百家争鸣”，正好反映着社会史上的氏族贵族和新兴地主阶级的斗争。等到了西汉时候，社会变革完成，思想界也就发生了“尊崇儒术，罢黜百家”的事件。杜老还认为，汉宣帝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是刘邦以来汉家历代皇帝的心传。从这些论述中，又清楚地看出杜老主张从西汉开始，儒法两家思想已经揉杂在一起了，更不存在两者之间的绝对对立。

杜老的著作，充满着革命战斗精神。他在先秦诸子思想研究和其他哲学思想的研究中，清除了许多假马克思主义和有意歪曲历史的资产阶级史学家所造成的阴影和混乱，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如此，杜老在抗日战争末期对于国民党反动政权支撑下猖獗一时的反动玄学思想，更是挺身而出，进行批判。收在《便桥集》中的《论“理学”的终结》、《玄虚不是中国哲学的精神》、《玄虚不是人生的道路》以及收在《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中的《略论礼乐起源及中国礼学的发展》等论著，就是杜老在这个时期写的严正锐利的批判玄学的文章。

杜老的论著所表现出的革命战斗精神，是与他的朴实严谨的治学方法完全一致的。在他的著作中，贯穿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他的每一个论点，都是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分析，一字一句，决不苟且。他对于引文，总是谨慎地引述，从不以随便的概述代替原文。什么哗众取宠，“立异鸣高”，偏爱偏恶，都是杜老所不屑为的。

今天，重读《杜国庠文集》，将会使我们获得更多的教益和启发。

再说比兴

王季思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我在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任教，写了篇《说比兴》，在浦江清教授主编的《国文月刊》第三十四期发表。那篇《说比兴》，今天看来虽然存在不少缺点，有些根据我国诗歌历史发展的实际和个人创作实践的体会作出来的结论，三十多年来仍一直左右我个人的诗歌创作，也为我在理论上继续探讨诗歌创作的问题提供有利的条件。

从《说比兴》发表的那个时代到今天，我们祖国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特别是最近一年多来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有可能回顾自己几十年来走过的道路，对文学史上诗歌创作和理论问题，作一次新的探讨。

实践先于认识。在文学史上总是先有某种文艺创作，然后才有关于这种文艺创作的理论著作。离开我们今天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中叶，我国文学史上出现了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作诗要讲赋、比、兴，就是从《诗经》总结出来的。

《诗经》流传之后不久，文学史上又出现了一部文艺理论著作《乐记》。《乐记》开宗明义就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又说：“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啍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乐记》反复强调客观事物对人心的感动是音乐、诗歌等文艺创作的根本原因，说喜怒哀乐等感情不是人性的本然，是“感于物而后动”。这些观点较好地概括了文艺创作活动的实际，含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南朝梁刘勰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同时期的钟嵘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之舞咏。”都是《乐记》“感于物而后动”的观点的发挥。后世诗人凡是要求“言之有物”、“穷情写物”、“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总是反对吟风弄月、无病呻吟等脱离现实的创作倾向。这就为诗歌怎样正确运用比兴，反映现实，在理论上起捍卫的作用。

比、兴主要是就诗歌的创作方法说的。最早对比、兴作解释的是汉儒郑玄的说法：“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也。”比方于物就是比喻，容易了解。托事于物，我过去以为是后世诗人常说的寄托。寄托其实也是一种比喻，不过隐约一点罢了。因此我说：“比、兴二义实即明喻、暗喻之不同。”今天看来，还是刘勰、钟嵘的说法比较明确。刘勰说：“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兴是指诗人在接触外界事物时引起的感情，比是指

诗人引用类似的事物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前者重在感情的抒发，后者近于理论的证明。它们在性质上既有所不同，在进入诗歌创作的思想活动中一般也有先有后。因此，国风 and 汉魏乐府的兴体，大都在诗的开头。后世民间歌谣还是如此。

但是不是兴体就只能出现在一首诗的开头呢？如果这样理解，那么汉魏以来许多表现诗人真情实感而并不出现在篇首的诗行，都将被排斥在兴体之外。刘勰认为从西汉以来“兴义消亡”，既出于封建文人的偏见，没有看到当时“子夜”“读曲”等民歌，仍然有不少以兴体发端；同时也由于他对兴体的机械理解。汉魏以来诗人不在篇首出现的情景交融之句，如曹植的“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陶潜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等诗行，难道都不合兴义？为什么刘勰会看不到呢？

钟嵘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又说张华诗“兴寄不奇”，陶潜诗“辞兴婉惬”，并没有认为汉魏以来诗人都不会用兴。他反对齐梁诗人的搬弄经史，滥用典故，要求诗人从耳目所接触的景物，吟咏性情，象曹植的“高台多悲风，初日照北林”，谢灵运的“明月照积雪，北风劲且哀”那样，达到了“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的艺术境界，比较全面地总结汉魏以来五言诗人的创作经验，比之刘勰仅仅根据《诗经》的毛公传注来说兴，就前进了一步。

《乐记》对诗人创作活动的概括虽比较符合实际，可是它的终极目的在于“同民心而出治道”，为“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提供理论根据。相传出于毛公的《诗序》就继承它消极的一面发展。《诗序》的部分言论原封不动地从《乐记》抄来，但完全抹去《乐记》里“感于物而后动”的观点，强调“后妃之德”，“先王之化”是“风之始也”，把《诗经·国风》里许多“感物吟志”的风谣，归之于文王、太姒、周公的教化。从毛公开始，经过二千年来许多儒生的又批又注，把一部《诗经》完全曲解为封建说教的著作。

最近我统计了毛公在《诗经》里注明属于兴体的一百十一篇：其国风七十一篇，占百分之六十四；小雅三十五篇，占百分之三十二；大雅四篇，占百分之三，颂诗一篇，占百分之一还不到。毛公在《诗经》里没有注明属于比、赋的诗篇。从朱熹的《诗经集传》看，在国风、小雅里，比、兴和赋体大约各占半数，而大雅和颂诗除个别篇章外，全属赋体。毛公朱熹对赋、比、兴的分别，只能代表汉、宋儒家的一种看法，我们并不全信。但它依然为我们在阅读《诗经》时得到的印象提供佐证：即国风、小雅里用比、兴的诗篇特别多，而大雅、颂诗里几乎全属赋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国风里的许多篇章来源于民间，“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阶级地位，使他们敢于反映现实；而他们在大自然中的生产活动，又使他们在歌唱自己的生活 and 斗争时容易采取比兴的手法，触景生情，托物言志。至于小雅里许多篇章来源于奴隶主阶级里受排挤的人物，他们的阶级地位也比较容易接近人民，面向现实，因而多采取比兴的手法来写诗。至于大雅和颂诗，大都出于王朝士大夫之手，为了装腔作势，替王朝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往往采取赋体。前者是现实主义诗流派的远源，每当文学史上形式主义的诗风泛滥时，少数进步诗人就悲叹“风雅道亡”，“兴寄都绝”，要求继承国风、小雅

的比兴传统。而大雅和颂诗里的赋体则一传为汉代扬雄、班固等的大赋，再传为唐代宋之问、沈佺期等的应制诗。应制者，应皇帝的命令也。皇帝要粉饰太平，诗人就给他写一首《赋得“日月光天德”》；皇帝要歌颂京都，诗人就给他写一首《赋得“山河壮帝居”》。这叫“赋得体”，是汉代大赋的支流。班固说：“赋者，古诗之流也。”这“古诗”其实是指大雅和颂诗里的赋体。鲁迅说“颂诗早已拍马”，一点也不错。

照我们今天的理解，所谓兴，主要是诗人面对现实，激动感情，从而赋予客观景物以主观感情色彩的诗歌创作方法。它要有真情实感，要表现艺术上的创造性，而并不在于它在诗歌的那一部分出现。诗人把他亲身经历而又引起内心激动的景象，构成富有感情色彩的艺术境界，使读者为之感奋，这是作诗要讲形象思维的第一义。“情深而文明”，如果诗人没有亲身经历，没有内心激动，又没有经过创造性的艺术构思，怎么能构成鲜明的艺术形象来打动别人呢？

比是比方，凡是可以比方的东西，在理类上总有相通之处，刘勰用“附理”“切类”来说明它，基本是对的。但诗歌里的比体和理论文章的引例或取譬究竟有所不同。前者是从感情出发引起种种联想，后者是为了理论上的说明来引例或取譬。刘勰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用以说明诗歌创作的比体，是比较适合的。屈原在《离骚》里几乎想把楚地所有的香草都采拾来作衣裳佩带，以此比喻自己的高洁；几乎把楚地所有的恶禽恶草，以及变了种的椒、兰，比作当时结党营私的亡国士大夫；又幻想自己在天国的周游，对伏妃、二姚等神女的追求，暗示自己对理想的探索，真是“诗人感物，联类不穷”，但决不是以此论证当时的政治形势，而是表现诗人强烈的爱憎和坚韧不拔的意志。李贺听了李凭的箜篌独奏，联想起神鱼的出水，老蛟的起舞；联想起女娲炼石补天处，一声哀弦促节，石破天惊，大雨倾注；联想起月中的吴刚正沉醉在迷人的旋律中，直到“露脚斜飞湿寒兔”，还靠在桂树上没有丝毫睡意。这些对乐曲感染力的夸张形容，也带有比喻的性质，但决不是为了说明乐理，而是以此构成瑰奇的艺术境界，表现诗人对李凭惊人的艺术才能的赞赏。

一般说，感物而动，触景生情，诗人的创作活动还逗留在现实的阶段；到了心潮澎湃，浮想联翩，诗人的创作活动就从现实的深度向理想的高度飞跃。前者是诗歌现实主义的基础，后者是诗歌浪漫主义的特征，但在构成诗的艺术形象时又不能截然划分。举例来说，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从“大江东去”到“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虽然已表示诗人心潮的激荡，仍逗留在触景生情的阶段；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处强虏灰飞烟灭”，借周瑜赤壁之战的胜利，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就向理想的高度飞跃。接下的“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以周瑜的少年得志，对比自己的华发早生，事业无成，又是一个联想，不过是从理想的高度跌回现实罢了。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从“千古江山”到“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虽然已流露对孙权、刘裕等历史英雄人物的向往，主要是对景抒情。接下说：“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联想起刘裕的从京口出兵北伐，收复关

中，就跟苏轼在赤壁的“遥想公瑾当年”一样，是理想的飞跃。下片又想起了宋文帝元加年间草草出兵北伐招来的失败，想起了四十三年前跃马南归，金主亮正倾国南侵，“烽火扬州路”的惨痛情景，表示他既要出兵北伐，收复中原，又反对草率出兵，招致失败。最后又想起了廉颇老将的被诬遭谗，抒发他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愤。真是心潮澎湃，浮想联翩。由于作者在联想起这些跟京口北固亭有关的历史人物时，赋予它以强烈的感情色彩，这就跟辛弃疾在《美芹十论》、《九议》等理论文章中引用史例不同。钟嵘说比是“因物喻志”，就诗歌创作说，我看比朱熹说的“以彼物比此物”要确切得多。

兴体赋予诗歌的艺术形象以感情色彩，比体赋予诗歌的艺术形象以理想色彩，它们是抒情诗形象思维的两种主要手法，但并不排斥赋体。叙事诗以赋体为主，但在场景的描摹，细节的刻画时，往往兼用比兴。

随着五七言诗歌在唐宋时期的发展，诗人们对诗歌艺术形象的创造又总结出了意境和传神的理论。前者是梅尧臣说的：“状难写之境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是刘勰“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文心雕龙·隐秀篇》佚文）的论点的发挥。后者是苏轼诗歌创作的经验之谈。他说：“作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他反对形似，要求神似。即要求诗人能表现事物的精神实质，而不要逗留在表面上的描头画角。这些问题，我在别的文章里已有说明，这里就不重复了。

诗歌的艺术形象，除了意境，还有音律的问题。就意境说，诗中有画；就音律说，诗中有乐。刘勰说：“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杜甫说：“晚岁渐于诗律细，新诗改罢自长吟。”都是说在诗歌创作时要注意它的抑扬顿挫，构成跟内容相应的格调，更有效地传达诗人的情绪。此事说来话长，而且已超出了比兴的范围，就带住罢。

关于中国近代史问题的讨论

前不久，广东历史学会举行座谈会，讨论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一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山西大学、内蒙古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学院、南开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开封师范学院、广西民族学院、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学院和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部分史学工作者参加了座谈会。

中国近代史上是否存在路线斗争，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课题，也是给“四人帮”搞乱了的理论问题。座谈会着重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一种意见认为：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农民和地主阶级都没有自己的政党，因此，从原则上、科学上严格来讲，农民和地主阶级内部，都不存在路线斗争。在资产阶级内部，同样不存在路线斗争，只有无产阶级才有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

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近代史上存在着路线斗争。持这种意见的同志，意见也不完全一致。有的同志根据毛主席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和国民党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说明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是在对外反侵略战争中，存在着路线斗争。而大多数同志则从各个方面来论证中国近代史上存在着路线斗争。

讨论会还就中国近代史上农民的作用、资产阶级的作用、人物评价等方面的问题展开了讨论。

论林则徐的历史地位

陈胜 璘

引 言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曾经作过一系列深刻论述，指出这个革命从它的准备时期说起的话，应当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又明确指出，这个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任务的革命，“从林则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①。

毛主席这一论述，科学地阐明了我国民主革命的开端及其任务，又科学地阐明了鸦片战争和林则徐在我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的历史地位。这是运用马列主义，科学地评价我国近代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光辉典范。

林则徐一生最主要、最光辉的事业，正是在鸦片战争时期。而“四人帮”的影射史学，却虚构出什么“鸦片战争时期的儒法斗争”，把我国民主革命开端时期，林则徐与投降派的斗争，变成“尊法反儒”与“尊儒反法”的斗争，完全篡改了我国民主革命的历史，歪曲了鸦片战争和林则徐的真正历史地位。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践踏，是对历史和历史科学的践踏。必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举起反帝斗争旗帜的第一人

历史的面貌本来很清楚，林则徐的英名不是同什么“儒法斗争”、而是同中国人民反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斗争紧紧相连。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第一幅浮雕就是当年林则徐所领导的、在虎门焚毁鸦片的壮丽图景；这是中国人民坚决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伟大行动的历史记录。我国民主革命从林则徐算起，就在于他领导并坚持了这场反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正义斗争。

为什么林则徐能够在关系到中华民族命运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举起反侵略反投降的旗帜，领导并坚持这一正义斗争呢？

恩格斯曾经指出：“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

史变迁的行动。”^②

从当年中国实际来看，促使和推动林则徐禁烟和抗英的历史原因和动力，就是激起中国人民奋起抵抗的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就是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持久斗争的动机和行动。林则徐对待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态度，和人民大众有着基本一致的共同点；对待人民大众的态度，则与清廷腐朽集团有着明显的歧异。这两个方面，使他能够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在人民大众推动、支持和鼓舞下，领导禁烟和抗英斗争，坚持同侵略者和投降派作毫不调和的斗争。他几乎在每一个斗争的关键时刻，都经受了严峻考验，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一八三二至一八三三年，英国鸦片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英国侵略者为制订侵华作战计划对我国沿海的侦查活动也已经正式开始^③。这样的客观形势，林则徐虽未全明，但从捍卫国家主权和反对鸦片侵略出发，他向道光建议搜查侵略者的侦察船，如有鸦片即“传同夷兵当面焚烧”，如敢抗违即派兵“靖其桀骜之气”。这一主张被道光传旨申斥为“妄逞材能”、“所见大谬”^④。但是，林则徐目睹鸦片流毒造成“商民交困”的状况，耳闻民间要求堵塞“来自洋方”之害的呼声，没有因受到指责而放弃自己的主张，继续向道光呼吁：鸦片进口易银，“此尤大弊之源！”必须坚持严防洋船夹带鸦片、严惩偷漏纵越^⑤。

这种正视现实的态度和鲜明的民族立场，使林则徐在一八三六至一八三八年成为严禁派的领袖。马克思指出，由于英国侵略者腐蚀中国当局及其官员，鸦片泛滥成灾，“1837年，中国政府终于到了非立即采取坚决措施不可的地步”^⑥。可是，当一八三八年，辩论黄爵滋的禁烟主张时，道光还举棋不定，而穆彰阿、琦善等反禁烟更是气势汹汹。林则徐“目击鸦片烟流毒无穷，心焉如捣”^⑦！挺身而出，尖锐地向道光指出：鸦片禁与不禁，不仅事关有无“御敌之兵”和“充饷之银”，而且事关生民保障，“自当为亿兆惜之！……岂宜借寇资盗，不亟为计？”^⑧断言若决心禁烟，“查看舆情，并非不可挽救！”^⑨

林则徐在暂时争取了道光对禁烟的支持以后，在极其艰难险阻的情况下，经住了最严峻的考验。

当他受命使粤之际，穆彰阿、琦善就威胁他“无启边衅”。“有识者已为文忠危”^⑩。但是，“为中原除此巨患”的强烈愿望，推动着他决心“置祸福荣辱于度外”。龚自珍提醒他：“无武力何以胜也？”他也深感“欲挽颓波力恐微”^⑪。而广州爆发的反击英美烟贩的万人大示威运动，却大大地增强了他的信心。他警告侵略者：若对抗缴烟，“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⑫毫不动摇地领导了反击英国鸦片侵略的第一次伟大胜利。马克思高度赞扬说：中国采取了反鸦片侵略的非常措施，“这些措施的顶点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没收、焚毁走私的鸦片”^⑬。

当侵略者挑起事端，殴毙华民，抗不交凶、具结，甚而发起武装挑衅，进行战争威胁的时候，林则徐大义凛然，以牙还牙。在接见《澳门月报》编辑时，“提起战争，他仅有的回答是‘我们不怕战争’。”^⑭由于民众支持、士气旺盛、军事有备，一八三九年下半

年，取得了九龙之役、川鼻官涌之役等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一八四〇年上半年，取得了长沙湾和磨刀洋等焚毁敌船的累累战果。同年六月英军舰队抵粤后，林则徐已经于“凡夷舶可入之海口，皆增驻重兵”^⑮，并且公开号召民众卫国保家，“许以人人持刀痛杀”侵略者^⑯，“悬赏缉拿或破毁英船，以及缉拿或杀死英军官兵”。使英寇在粤无法思逞。正如范老所说，这些措施在当时一般统治者看来，是骇人的，但他却看作最可靠的力量。帝国主义的代言人马士之流攻击这是“野蛮而好杀的举动”，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反侵略措施是“人民的情绪忠实的反响”^⑰。

林则徐虽认为这是利用群众力量的“因时制宜”措施。但是，当时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已经腐朽不堪，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人民大众反侵略斗争，却仍处于推动、支持地主阶级抵抗派坚持斗争的阶段。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地主阶级抵抗派、特别是坚持斗争的代表人物林则徐，能够和人民大众“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⑱，并敢于号召“一切民人”起来卫国保家，这就在相当高的程度上，表达了民众的愿望，代表了民族的利益；表明他在关键时刻，高举起了反帝斗争的旗帜。

因此，人民大众也高度肯定和赞扬林则徐。当林则徐遭到革职的消息传到广州时，震惊而愤怒的广州民众，立刻沸腾起来，“填于衢巷”，爱国绅商以“民沾其惠，夷畏其威”等颂牌声援林则徐，抗议清廷的倒行逆施^⑲。

这些声援的怒潮，推动着林则徐继续坚持斗争。留粤期间，他积极推动和协助广东巡抚怡良坚持同侵略者和卖国贼琦善斗争。他向怡良提出过积极布防和发动民众保卫广州的计划；敦促并协助怡良揭发琦善偷卖祖国领土香港的罪行；虎门危在旦夕之际，又激发和支持怡良避开琦善“单衔缮发”号召民众“奋勇杀敌”的赏格告示^⑳。当英军包围广州、琦善频频乞降的万分危急关头，林则徐更无畏地以自己的名义，自己出钱招募并亲自训练壮勇，并冒着英寇“开放飞炮、火箭”的危险，在火线上亲自督战，“期于奋袂一呼，不敢临难苟免”^㉑！林则徐在前往新疆的戍途中，仍积极研究“恢复之策”，痛斥南京和议“殊不堪设想矣！”^㉒在新疆期间，面对着沙俄对我国西北边疆的威胁，发出了要警惕沙俄扩张的呼吁；同时念念不忘“闽粤近事”，到他被释入关后，还坚信“粤民可用”，认定“今之所恃，惟此一端”^㉓。一八五〇年退休回福州后，他又与爱国乡绅一起筹划驱逐英寇，同时热情鼓励林昌彝编录《平夷十六策》等“救世之书”，以期“大用于世”^㉔。他直到临终前数月，还在关心祖国的前途和民族命运。

诚然，林则徐的斗争不可能遏阻中国坠入半殖民地深渊，他的思想也和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有着原则的区别，他对西方资本主义侵华的实质和由此引起中国社会的巨变，还不可能理解，因而也就更加不能了解这时开始的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但是，林则徐在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开始的时候，举起了反帝的旗帜，就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光荣斗争史册上，谱写了光辉的第一页。毛主席指出我国民主革命“从林则徐算起”，把他作为一位划时代的杰出人物给以高度评价，最主要的一点就在于此。

多年来,“四人帮”封禁《林则徐》这部影片,不许宣传真正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行为,表明他们是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

为谋求祖国独立富强的前驱先路

林则徐不愧为近代中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者,还表现在他为了抵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谋求祖国独立富强,在不触动本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敢于揭露并要求改良弊政,保障和支持民族经济的发展,积极筹划并坚持建设近代国防军事技术。因而,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愿望。这种愿望,当时主要还是通过那些认识比较敏锐、具有改良维新意向的爱国知识分子(即有进步倾向的开明士大夫),通过那些代表我国资本主义因素萌芽的爱国的地主商人(即所谓“商民”),以多种形式,强烈地表现出来。林则徐受到他们的影响和推动,并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他们的代表,而成为近代中国维新运动的重要先驱。

林则徐比较“实事求是,不涉时趋”^②,早就同当时有某种改良维新愿望的朋友们一起,揭露、鞭鞑官场的丑恶事物;而且逐步把眼光集中到反映腐朽制度的清朝最高统治集团方面。他不顾道光指责,反对横征暴敛,坚请改良弊政,“暂纾民力”^③;他揭露反禁烟派之所以反对严禁鸦片,在于接受贿赂,肥己私囊;他揭露投降派琦善“懈军心、颓士气、壮贼胆、蔑国威”,与侵略者“彼此别有心交”的卖国行为^④;他对道光也从劝说、怀疑、失望而至愤懑。当道光突然下令停止收缴烟土烟具时,他认为,舍此“试问更有何法办理”?力陈不可“顿更大局”^⑤;面对道光给予他的无理谴责,他表示“不敢不凛天威,亦不敢认罪戾”,痛斥投降派散布的所谓“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的诬枉之言^⑥;而当道光将他革职后,则进一步流露出他和关天培等“一时不能申冤”,还可能被“置之死地”;当道光又表示要抗英,叫他留粤“协理夷务”,还表示对抗英“断无游移”时,林则徐就深表怀疑:“果否游移,仍属难料?”^⑦当道光为了转移人们反对南京议和的视线,牺牲车马、保存将帅,拿问追随者牛镜堂时,林则徐就尖锐地指出:“镜堂议和之请,既已准行”却又回过头来拿他当替罪羊,“反来复去,真是不可捉摸”^⑧!尽管如此,他不敢也不可能离开这个皇帝,最尖锐的批评也只能在私函中发泄。阶级本质决定了他不可能从根本上去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我们也不能苛求他做到这一点。事实上,“无论这种攻击是出于怀疑封建制度还是针对一些丑恶的事物,都只是导向一个结果:动摇、瓦解封建统治,使人相信这个统治是注定要完蛋的。”^⑨这个评论是中肯的。

与此同时,林则徐还对清王朝的财经政策、贸易政策提出许多异议,表明自己在这些方面的主张。他不同意清廷为解决财政金融危机,企图采取损害商民利益的“骤平洋钱之价”和“骤禁洋钱流通”的措施。他指出危机的根源在鸦片。如果骤平洋钱之价,势必使商民因亏折而“穷蹙停闭”;骤禁洋钱流通,则势必“于商民买卖、海关税务,未免皆有窒碍。”他也不同意让外国货币长期在我国市场和官民中流通,认定本国应该流通本

国货币，特别是国家度支如漕费应“概禁折给洋钱”；否则，对我国财政金融的独立自主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也极为有害，故“若论拔本塞源，理应将洋钱全行禁用，方为正办。”怎么办呢？林则徐通过“询诸年老商民”，奏请道光通过自铸银币，建立本国银本位币的货币制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一面发展正常的对外贸易，增加海关的洋银收入，一面逐渐抑制洋钱流通，最后全行禁止，健全财政金融和海关制度^③。当西方经济势力开始侵入我国、外国货币开始冲击和逐渐占据我国市场，清朝的国库收支和货币流通开始遭受破坏的时候，林则徐第一个提出了建立本国银本位货币制度的主张，这是适应政治经济形势变化，保护本国工商业者、保障民族经济独立发展，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先进思想。

迨后，他又不同意清廷把银价日昂归咎于商人自出的“钱票”广为流通，而企图采取禁止钱票的措施。林则徐以苏州、汉口等地调查所得材料，驳斥那些谬论，赞扬这种具有货币性质的钱票，在鸦片引起银荒的今日是一种创造，起了“稍可济民用之不足”的作用，“若不许其用票，恐捉襟见肘之状更有立至者矣！”从而断言“钱票无甚关碍”，并呼吁道光要重视“藏富于民，厉行禁烟”^④。

在广东禁烟和抗英时，林则徐为发展独立自主的对外贸易，不同意清廷不加区别的昏愦行为，对外商坚持实行严禁鸦片贸易与准许正常通商相结合的政策，宣布“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苟知悔改，尽许回头”，对守法的外商“不惟保护安全，且必倍加优待”^⑤。同时，一再反对清廷企图采取封关禁海的盲目措施，指出封关只能使外商转而走私，则海关“正税徒亏而漏卮依然莫塞”；并且特别强调，“华民惯见夷商获利之厚，莫不歆羡垂涎”。公然以“市井之谈”为根据，对道光说：华商因“恪守定例，不准赴各国贸易，以致利藪转归外夷”^⑥！隐约表达了他有意鼓励华商出洋经商的开明意向。这种隐约的表达，在当时来说是很大胆、很先进的。

战后，林则徐进一步看到，要解决国弱民穷的问题，必须重视“商力”，以期“有裨公事，无拂輿情”；特别是看到云南商民熟习开矿，对“朋资鸠集，人人有所希冀”，又使他注意到矿业。他奏请开矿“裕国足民，利用厚生”，并且指出若官府垄断弊病甚多，经久之善策“似仍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成则加奖，歇亦不追。”^⑦这个有利于调动商民积极性的发展民办工矿业的主张，反映了鸦片战争后一部分地主商人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刺激下，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林则徐要求改良维新的意向，在此就更明显地表露出来。然而，这个主张，如同他在战前和战争期间提出的保护商民利益、发展民族经济的主张一样，又是旨在为封建国家财源服务的改良主张，并不能解决中国命运问题。就是日后维新派提出的系统的改良维新方案，在近代中国也是根本行不通的。但是，在决定中国往何处去的历史关头，这些主张无疑是在谋求祖国独立富强。

特别是林则徐的爱国热忱，使他对清朝军备废弛、军事技术落后的状况，深为忧虑。为了巩固国防，他在广东期间，除大力整顿军队，提高军队战斗力之外，还十分重视加强防御设施，大力修建炮台，购买和制造船炮。当他获谴时，就对怡良说：“船炮乃

不可不造之件，贱性不识时宜，恐不免续上辞官表以陈此一节耳”！^③他劝说道光认识“夷性无厌”，继续抗英，并以关税所得，制炮造船，力求“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这种要求兴办近代国防工业以“制夷”的维新主张，道光说这是“一片胡言”，而林则徐却坚持这是事关民族命运的大事。^④

为了抵抗侵略，林则徐到浙江后，日以铸炮演炮为务，将他在广东搜集和研究的制炮技术及八种战船图式授予龚振麟、汪少海等人，推动龚振麟创造了“使英国人吃惊”的新式战船，发明了早于欧洲三十年的铸炮铁模，制造了供重炮用的磨盘炮车。使西方人在事实面前也不能不承认中国是有较高技术的国家^⑤。林则徐在戍途中，仍念念不忘“海疆久远之谋”必须“亟为筹划”，为此他把改造水师，实行海战，保卫海疆的主张系统化，专门写信给苏鳌石等，希望通过他们，提出建设一支有近代化武器装备的海军保卫南北洋的计划：

造大船百只、中小船五十，大小炮位千位，招水军五千、舵工水手一千；

举荐“义勇冠伦、与士卒同苦”的陈化成将军任“水军总统”，挑选富有“肝胆”、“善于将将，筹划周详者，为之指挥调度”；

招募沿海“敢死之士”和“盐民”为水兵。

“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英）所能往者，我亦能往，……有大帮水军，追逐于巨浸之中，彼敢舍舟而扰陆路，占据城垣？吾不信也！”^⑥

这种依靠爱国将士和人民建设近代国防工业（船炮）和近代海军的军事政治胆识，在当时统治阶级中，是独具卓见的。可是，陈化成壮烈牺牲的噩耗，却接踵传来！林则徐悲愤极了！

“小丑跳梁谁殄灭？中原揽辔望澄清；关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鼓声！”^⑦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爱国者做梦也没忘记擂响战鼓、歼灭敌人。龚振麟的发明创造、陈化成的“义勇冠伦”，说明林则徐的主张并不是做不到的。清廷腐朽集团扼杀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破坏了我国国防近代化的建设，甘让“逆焰燎原”，使我国长期处于挨打地位！今天，读到林则徐当年悲愤的诗篇和“忧心如焚”的控诉^⑧，联系到万恶的“四人帮”猖狂破坏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罪行，他们要把我国引向何处？他们同当年的卖国贼有何不同？不是很清楚了吗！林则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为了谋求祖国独立富强，尚且把“祸福生死度外置之”；今天，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我们更应该为改变我国经济技术落后的状况，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孜孜不倦地奋斗！

“向西方学习”的先声

林则徐不愧为近代中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者，还表现在他为了抵抗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为了谋求祖国的独立富强，从“徧访鸦片来由”^⑨开始，以极大的勇气，冲破“天朝”

的图圖，睁开眼睛看世界，向西方国家寻找“制夷”的知识。

当时外国人有个评论说：“天朝”对有外国知识的人反而“轻慢”，所以“中国官府全不知道外国之政事”，连在广州的达官贵人也“不知英吉利人并米利坚人之事情”，而且根本“不去考究”^④。这是实在情形。林则徐也指出：清朝文武“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⑤。他自己则是从无知逐渐走向有知的。

林则徐受命使粤后，千方百计了解敌情和外事。除了亲自做调查和派人做调查之外，还请了四个精通英文的译员，大量翻译外国书报。这是林则徐开眼看世界的最主要途径，是我国近代史上大规模翻译外国书报的创举。

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外国书报，涉及范围极广。现在所知道的约可分为五大类^⑥：

一是为了解军事、政治、经济情报而译的《澳门新闻纸》六册（实为《广州周报》，1839年7月迁澳门）；根据《澳门新闻纸》的材料加工编选的《澳门月报》五辑，以及载有每季度售出鸦片数量的《东印度公司卡片》。

二是为了解对外人评论而摘译的《华事夷言》；以及摘译英国人指责鸦片贸易的《对华鸦片贸易罪过论》（作者塞尔瓦尔，又译作地尔洼，1839年伦敦出版，当年摘译）。

三是为了解世界各国基本知识而译的《四洲志》（实为五大洲事，林沿中国旧说命名。原书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1836年伦敦出版）。

四是为开展外交斗争，摘译滑达尔所著《各国律例》（又译作《万国公法》）。

五是为改进军事技术而翻译的大炮瞄准法等武器制造应用书籍。

林则徐还利用一些外国人住在广州或来广州的机会，派员或亲自向这些外国人直接询问外情、翻译外文：

孟加刺人林律、沙结遭风由闽送来广州，林则徐便派员去找他们了解鸦片栽种、制造、成本、税收等情^⑦。

美国传教士、眼科医生伯驾在广州办眼科医院，派人向他请医及翻译《各国律例》若干段^⑧；在虎门焚烟接见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等人时，向他们询问各种鸦片名称及价格，询问英国海军情形及英国的汽船情况^⑨。

英国医生喜尔等人在海南岛附近沉船获救送来广州。林接见时，询问英国、土耳其等情况，并请喜尔等看他拟好的照会英国女王的稿子，并修改“所发现的一切错误”，态度“非常谦恭”^⑩。

事实证明，林则徐这样做，不但增长了许多知识，而且直接为当时的反侵略斗争服务，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焚烟斗争中，他了解到英、美都有人指责鸦片贸易，虽然不了解其背景和实质，但他觉得这个矛盾可以利用。因而始终坚持严禁鸦片贸易与准许正常通商相结合的政策，坚持维护中国主权的具结斗争，“若不愿具结，或结不如式，万万不准贸易”^⑪；并把愿遵式具结的英、美商船“作为榜样”，“壮中国之声威，而破义律之诡谲”^⑫！同时，通过向裨治文、喜尔等美英籍人宣传中国的正义政策，表示他“对于英国人并无丝毫仇隙，只痛恨那些贩运鸦片的英国人”的态度和坚决为“消灭烟祸”而斗争的决心^⑬。在照会英国女王时也反复说明这些精神。因此，那个曾经批评中国官府完全不知外情的外国

评论家，也认为：“林行事全与上相反”。

在英寇毆毙华民林维喜后，义律自己组织临时法庭，宣布参与者皆非真正凶手，抗不交凶；并无理坚持即使查出凶手也要按英国法律治罪。林则徐把《各国律例》有关部分及时翻译出来，加以应用，严驳义律，指出“赴何国贸易，即照何国法度”，坚持要义律交出凶手按中国法律治罪^⑤。同时，坚决反对清廷腐朽集团放弃交凶斗争的昏妄态度。

在军事斗争中，林则徐对敌情动态比较了解，能比较正确估计敌我双方力量对比，避其所长，攻其所短。他以水勇、火船等敌人“所畏者设法制之”，并根据情报，对英军“迎头探击”；及时向清廷报告并咨会沿海各省防止英军北犯天津；以“现有夷信”为据，说明英军在定海的困境和在国际上的不利条件，坚请道光继续抗英。林则徐在广东还根据并利用当时有利的国际形势，孤立打击英国侵略者。特别是利用了英葡矛盾，及时粉碎了英方企图强夺澳门为据点的图谋，有效地争取了葡方保持中立，在关闸之战中“践其两边不理之言”^⑥。与此同时，林则徐也充分重视敌方“船坚炮利”的长处，大力了解和吸收外国先进技术，改进和提高清军武器装备和自卫能力：

由澳门或新加坡密购英国利物浦制造的钢炮和葡萄牙铜炮；

购买外国船舰作演习之用。仿造欧式战船，于一八四〇年四月二十五日在广州下水，并采取措施，加紧“购料造船”；

林则徐还希望在战场上以“众船会攻一船”之法夺取敌船，在会剿英舰于矾石洋的海战中，林认为“既得胜仗而不能将船夺获，殊为可惜！”并呼吁道光，发动定海军民收复定海，夺其“船炮皆为我用。”

离广州前，还建议按他研究绘制的外海战船图样，购料集匠“赶紧制造”^⑦。

林则徐在吸收外国先进技术时，还注意把中西技术结合起来。他与龚振麟研究仿造欧式战船时，就同时吸取了宋代踏轮行船之法，造出中西结合的战船，使英人吃惊。此外，在水利方面，他搜集收藏有介绍外国经验的《泰西水法》^⑧。在医学方面，他对祖国医学遗产是相当重视的，但也看到西医的长处。他患小肠疝气就曾间接请美国医生伯驾进行西医治疗。他对“汉民每有上夷楼就医”而“彼自秘其术”的情况相当留意，加以考究。他认为：“夷人之医术所以胜于内地者，其病死则斫其尸而观其脏腑，以察其所以不治之故。”^⑨从解剖学方面给西医以肯定。

林则徐几乎什么都想了解。他把《四洲志》交给魏源扩充为《海国图志》，魏源在该书序言中说明：“此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这显然反映了林则徐的思想。他睁开眼睛看世界（“采访夷情”），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师夷长技”），在当时确实是很进步的。更可贵的是，他的目的是为了抵抗侵略（“制夷”），为了谋求祖国独立富强（“久远之谋”）。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正如毛主席指出：“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认为这些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很可以救中国”^⑩。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而林则徐应该就是为他们“创榛辟

莽、前驱先路”的第一人^①。他对西方的了解,虽然还很浅薄、很幼稚,但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突破了“天朝”的禁区,开创了新的风气,提出了新的课题,带动了当时倾向进步的封建士大夫进一步了解世界,启发了后来的爱国知识分子和先进的人们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林则徐发出了学习西方的先声,表明他是近代中国提倡西学的创始者,新学的开路人。

当时,腐朽的清王朝把自己的头脑和眼界禁锢起来,根本看不到和不愿看到外国人的长处,妄自尊大,不允许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以改变中国的落后地位;而当外国资本主义向中国发起侵略的时候,又妄自菲薄,屈膝投降,使中国任人宰割。这种教训是十分沉痛的。重温鸦片战争这段历史,使我们更看清楚“四人帮”把向外国学习诬蔑为“洋奴哲学”,是何等的荒谬,何等的阴险狠毒!

结 论

毛主席指出,近代那些想救中国的人,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②。这个想法,在林则徐思想上就有所反映。

他是要救国的,希望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可是,他的爱国理想没有实现。

他要救国,就想维新,学西方,很想发展民族经济和建设近代国防;可是,他谋求祖国独立富强的愿望也不能实现。

这是因为腐朽的清王朝,已经没有一点振作的精神,甘当帝国主义的走狗以求苟安。结果,从鸦片战争以来,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们,都打过我们,都以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毛主席总结了我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经验,科学地指出:过去,我国长期挨打、失败,“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

总结鸦片战争以来百年之患的原因,肯定林则徐的历史作用,正如列宁在纪念赫尔岑时指出,不是为了讲些庸俗的颂词,而是为了阐明无产阶级自己的任务,为了阐明这位历史人物的真正历史地位。

“四人帮”肆意篡改和封锁毛主席的科学论述,一会连进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的电影《林则徐》也横加封禁,一会又妄图把林则徐当作他们反对所谓“现代大儒”的棍棒,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反科学性及其“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的反革命性!在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下,毛主席关于林则徐的科学论述,随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而公诸于世,这是对“四人帮”的有力批判!今天,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神州九亿争飞跃。当年林则徐发出的“殊不堪设想矣!”“奈何!奈何!”的沉痛召唤,已经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陈迹,而他留下的“不敢稍畏一日之难,致贻百年之患”^③的警世良言,则至今仍有发人深省的意义。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四九〇页。
- ②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四月第一版，第四〇页。
- ③ 一八三二年派出胡夏米侦察船，到中国沿海各口岸进行了为期六个多月的侦查。
- ④ 《鸦片战争》资料（一），第一一〇——一一一，页；《宣宗圣训》卷一〇一。
- ⑤ 《林则徐集·奏稿》上，第一三四——一三六页。
-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八页。
- ⑦ 《林则徐集·奏稿》中，第五七一页。
- ⑧ 《林则徐集·奏稿》中，第五九八——六〇一页。
- ⑨ 《林则徐集·奏稿》中，第五九八页。
- ⑩ 《鸦片战争》资料（一），第三三六页。
- ⑪ 龚自珍：《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云山左房诗钞》卷五《寄酬吴棣华前辈》。
- ⑫ 《林则徐集·公牍》第五九页。
- ⑬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八页。
- ⑭ 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二八八页。
- ⑮ 《鸦片战争》资料（六），第二三——二四页。
- ⑯ 林则徐：《英夷鸱张安民告示》，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
- ⑰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二九六——二九七页。
- ⑱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二九五页。
- ⑲ 《林则徐集·日记》第三七二——三七四页。
- ⑳ 林则徐：《致怡良书柬》，第一四三、一四七、一五〇、一五一、一五八件；赏格告示于1841年2月25日以怡良单衔颁布。
- ㉑ 《林则徐集·日记》第三八三——三八五页；《致苏鳌石书》（1841年6月于镇海）。
- ㉒ 林则徐《致姚春木、王冬寿书》（九月于兰州）；《九月朔夜甘州抚彝书寄第八号家书》。
- ㉓ 林则徐：《复两广制台徐广缙书》（二十八年六月）。
- ㉔ 林则徐：《致林芑谿书》（三十年秋于福州）。
- ㉕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 ㉖ 《林则徐集·奏稿》上，第一四八——一五二页。
- ㉗ 《鸦片战争》资料（二），第五六五——五六六页。
- ㉘ 林则徐：《致怡良书柬》第十二件（十九年五月）；《林则徐集·奏稿》中，第六五八——六六二页。
- ㉙ 林则徐：《致怡良书柬》一二〇件（二十年八月二十三日）；《林则徐集·奏稿》中，第八八四页。
- ㉚ 《鸦片战争》资料（二），第五六三——五六六页。
- ㉛ 林则徐：《壬寅十一月初九夜书第十四号家书》、《十一月廿四日五鼓书第十五号家书》、《十二月十四日寄第十六号家书》。
- ㉜ 《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刘大年《序》。
- ㉝ 《林则徐集·奏稿》上，第一三三——一三五页、第二二四——二二五页、第三八五——三八六页。
- ㉞ 《林则徐集·奏稿》中，第五九八——六〇一页。
- ㉟ 《林则徐集·奏稿》中，第七〇四——七〇五页。
- ㊱ 《林则徐集·奏稿》中，第六四〇页、第七九五——七九六页。
- ㊲ 《林则徐集·奏稿》下，第九六三页、第一一四五——一四九页。
- ㊳ 林则徐：《致怡良书柬》一一九件（二十年八月二十日）。
- ㊴ 《林则徐集·奏稿》中，第八八四——八八五页。
- ㊵ 参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陈大谊：《从鸦片战争到一八六一年中国军事工业》。
- ㊶ 林则徐：《复苏鳌石书》（二十二年于洛阳）；参见《致姚春木、王冬寿书》（二十二年九月于兰州）。

- ④② 《云左山房诗钞》卷六《次韵陈子茂》。
- ④③ 林则徐：《致姚春木、王冬寿书》（二十二年于兰州）。
- ④④ 《林则徐集·奏稿》中，第五七六页。
- ④⑤ 《鸦片战争》资料（二），第四一——四一二页。
- ④⑥ 《林则徐集·奏稿》中，第六四九页。
- ④⑦ 参见：《鸦片战争》资料（二）译文；魏源《海国图志》卷八十三；《鸦片战争》资料（六）齐思和《书目题解》；《鸦片战争》资料（五）《英军在华作战记》原附录二；林则徐《致怡良书柬》第二、第二四、第三七、第四四、第四五、第一二二、第一四一件；陈原：《林则徐译书》，载《人民日报》1961年5月4日。
- ④⑧ 林则徐：《致怡良书柬》第三件（十九年三月十一日）。
- ④⑨ 《鸦片战争》资料（二），第四四八——四八九页；陈原：《林则徐译书》。
- ⑤⑩ 林则徐：《致怡良书柬》第一一件（十九年五月初四），参见李抱宏：《中美外交关系》第二章原注九十九。林则徐对美国传教士的本质及其侵华的阴谋手段，缺乏足够的正确的认识，但他利用一切机会了解外国情况的态度是积极的。
- ⑤⑪ 《鸦片战争》资料（五），第三二一——三二六页。
- ⑤⑫ 《林则徐集·公牍》第一五二页。
- ⑤⑬ 林则徐：《致怡良书柬》第二〇件、二三件（十九年九月）。
- ⑤⑭ 《林则徐集·奏稿》中，第六五六、八八四页；《鸦片战争》资料（五），第三二三——三二四页。
- ⑤⑮ 《林则徐集·公牍》第一二九——一三〇页；参见《海国图志》所载《各国律例》译文。
- ⑤⑯ 林则徐：《致怡良书柬》第三七件（廿年正月卅日）、第一〇三件（廿年七月二十四日）。
- ⑤⑰ 林则徐：《致怡良书柬》第六八件（廿年五月）、第一一〇件（廿年八月初六）；《林则徐集·奏稿》中，第八六一页；《鸦片战争》资料（六），第二三——二四页、第三六——三七页。
- ⑤⑱ 郑丽生：《林则徐外纪·云山左房书目》。
- ⑤⑲ 林则徐：《致莲友函》。
- ⑥⑩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一三五八——一三五九页。
- ⑥⑪ 魏源：《海国图志》叙云：“《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何以异以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故可以说：林则徐是“创西学之始，开新学之路”的第一人。
- ⑥⑫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一三五九页。
- ⑥⑬ 《林则徐集·奏稿》中，第六八五页。

《柳如是别传》缘起

陈寅恪 遗稿

《柳如是别传》又名《钱柳姻缘诗释证》，是著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先生最后的一部著作。全书共约五十万字。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陈寅恪先生的工作和生活给予妥善的照顾，使这位早年双目失明的学者的著述工作，从未中断。对此，他曾多次表示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感激。陈寅恪先生于1969年逝世。他在去世前用了十几年的工夫，研究了大量明末清初的史学、文学材料，终于完成了《柳如是别传》，这种学术钻研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蒋帮的一些无耻文人、政客，因为陈寅恪先生十多年没有发表文章，便大谈他的晚年遭迂，并借此进行反共宣传。这部洋洋数十万言的著作，就是给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使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社会科学领域中重新得到贯彻，《柳如是别传》也将整理出版。我们特地选登它的第一章，供读者了解这部著作的概貌。

编 者

咏红豆并序

昔岁旅居昆明，偶购得常熟白茆港钱氏故园中红豆一粒，因有笺释钱柳因缘诗之意，迄今二十年，始克属草。适发旧篋，此豆尚存，遂赋一诗咏之，并以略见笺释之旨趣及所论之范围云尔。

东山葱岭意悠悠。谁访甘陵第一流。送客筵前花中酒，迎春湖上柳同舟。纵回杨爱千金笑，终剩归庄万古愁。灰劫昆明红豆在，相思廿载待今酬。

题牧斋初学集并序

余少时见牧斋初学集，深赏其“埋没英雄芳草地，耗磨岁序夕阳天。洞房清夜秋灯里，共简庄周说剑篇”之句。（牧斋初学集叁陆“谢象三五十寿序”云：“君初为举子，余在长安，东事

方殷，海内士大夫自负才略，好谭兵事者，往往集余邸中，相与清夜置酒，明灯促坐，捋腕奋臂，谈犁庭扫穴之举。”等语，可以参证。同书致拾天启元年浙江乡试程录中序文及策文第五问，皆论东事及兵法。按之年月节候，又与诗意合。牧斋所谓“庄周说剑篇”者，当是指此录而言也。）今重读此诗，感赋一律。

早岁偷窥禁脔编。白头重读倍凄然。夕阳芳草要离冢，东海南山下溟田。（牧斋有学集壹叁东涧诗集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四十四“恨傍南山烦远祝，长筵朋酒为君增”句下自注云：“归玄恭送春联云，居东海之滨，如南山之寿。”寅恪案，阮吾山葵生茶馀客话壹贰“钱谦益寿联”条记兹事，谓玄恭此联，“无耻丧心，必蒙叟自为。”则殊未详考钱归之交谊，疑其所不当疑者矣。又鄙意恒轩此联，固用诗经孟子成语，但实从庾子山哀江南赋“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脱胎而来。其所注意在“秦庭”“周粟”，暗寓惋惜之深旨，与牧斋降清，以著书修史自解之情事最为切合。吾山拘执孟子诗经之典故，殊不悟其与史记列女传及哀江南赋有关也。）谁使英雄休入彀，（明南都倾覆，牧斋随例北迁，河东君独留金陵。未几牧斋南归。然则河东君之志可以推知也。）转悲遗逸得加年。（牧斋投笔集下后秋兴之十二云：“苦恨孤臣一死迟。”）枯兰衰柳终无负，莫咏柴桑拟古篇。

右录二诗，所以见此书撰著之缘起也。

寅恪少时家居江宁头条巷。是时海内尚称乂安，而识者知其将变。寅恪虽年在童幼，然亦有所感触，因欲纵观所未见之书，以释幽忧之思。伯舅山阴俞觚斋先生明震同寓头条巷。两家衡宇相望，往来便近。俞先生藏书不富，而颇有精本。如四十年前有正书局石印戚蓼生钞八十回石头记，其原本即先生官翰林日，以三十金得之於京师海王村书肆者也。一日寅恪偶在外家检读藏书，获睹钱遵王曾所注牧斋诗集，大好之，遂匆匆读诵一过，然实未能详绎也。是后钱氏遗著尽出，虽几悉读之，然游学四方，其研治范围与中国文学无甚关系，故虽曾读之，亦未深有所赏会也。丁丑岁芦沟桥变起，随校南迁昆明，大病几死。稍愈之后，披览报纸广告，见有鬻旧书者，驱车往观。鬻书主人出所藏书，实皆劣陋之本，无一可购者。当时主人接待殷勤，殊难酬其意，乃询之曰，此诸书外，尚有他物欲售否？主人踌躇良久，应曰，曩岁旅居常熟白茆港钱氏旧园，拾得园中红豆树所结子一粒，常以自随。今尚在囊中，愿以此豆奉赠。寅恪闻之大喜，遂付重值，藉塞其望。自得此豆后，至今岁忽忽二十年，虽藏置篋笥，亦若存若亡，不复省视。然自此遂重读钱集，不仅藉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因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岂意匪独牧翁之高文雅什，多不得其解，即河东君之清词丽句，亦有瞠目结舌，不知所云者。始知稟鲁钝之资，挟鄙陋之学，而欲尚论女侠名姝文宗国士於三百年之前（可参云间杜九高登春尺五楼诗集贰下“武静先生席上赠钱牧斋宗伯”诗云：“帐内如花真侠客”及顾云美苓“河东君传”云：“宗伯大喜，谓天下风流佳丽，独王修微杨宛叔与君鼎足而三。何可使许霞城茅止生专国士名姝之目。”）诚太不自量矣。虽然，披寻钱柳之篇什於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何况出於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牧斋事迹具载明清两朝国史及私家著述，固有阙误，然尚多可考。至於河东君本末，则不仅散在明清间人著述，以列入乾隆朝违碍书目中之故，多已亡佚不可得见，即诸家诗文笔记之有关河东君，而不在禁毁书籍之内者，亦大抵简略错误，剿袭雷同。纵使出於同时作者，亦多有意讳饰诋诬，更加以后代人无知之虚妄揣测。故世所传河东君之事迹，多非真实，殊有待发之覆。今撰此书，专考证河东君之本末，而取牧斋事迹之有关者附之，以免喧宾夺主之嫌。起自初访半野堂前之一段因缘，迄於殉家难后之附带事件。并详述河东君与陈卧子〔子龙〕程孟阳〔嘉燧〕谢象三〔三宾〕宋辕文〔征舆〕李存我〔待问〕等之关系。

此稿既以释证钱柳姻缘之诗为题目，故略述释证之范围及义例。自古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牧斋之诗，有钱遵王曾所注初学集有学集。遵王与牧斋关系密切，虽抵触时禁，宜有所讳。又深恶河东君，自不著其与牧斋有关事迹。然综观两集之注，其有关本事者，亦颇不少。兹略举其最要者言之，如遵王初学集诗注壹陆丙舍诗集下“雪中杨伯祥馆丈廷麟过访山堂即事赠别”诗，“贾庄”注，详述崇祯十年十一年与建州讲款及卢象升殉难于贾庄之史实。同书壹柒移居诗集“茅止生挽词十首”，其第二首“武备新编”，第四首“西玄”，分别注出止生以谈兵游长安，挟武备志进御事及止生妾陶楚生事。（可参列朝诗集丁下“茅待诏元仪”及闰集“陶楚生”两小传。）同卷“姚叔祥过明发堂，共论近代词人，戏作绝句十六首。”其中“高杨”“文沈”“何李”“钟谭”等人，皆注出其事迹。又“钟谭”注中云：“〔王〕微〔杨〕宛为词客，诤肯与〔钟谭〕作后尘。公直以巾幗愧竟陵矣。”等语，可见牧斋论诗之旨也。同卷永遇乐词“十六夜见月”，注中详引薛国观事。注末数语，其意或在为吴昌时解脱。同书贰拾东山诗集叁“驾鹅行。闻潜山战胜而作”诗，“潜山战”注，述崇祯十五年壬午起马士英为凤督。九月己卯（明史贰肆庄烈帝本纪“己卯”作“辛卯”。是。）总兵刘良佐黄得功败张献忠将一堵墙于潜山。十月丙午刘良佐再破张献忠于安庆等事。盖遵王生当明季，外则建州，内则张李，两事最所关心。涉及清室者，因有讳忌，不敢多所论述。至张李本末，则不妨稍详言之也。又同卷“送涂德公秀才戍辰州，兼简石斋馆丈”一题，“戍辰州”注，言涂仲吉因论救黄道周，下诏狱。戍辰州事。注末云：“道周辨对，而斥之为佞口，仲吉上言，而目之为党私。稽首王明，叹息何所道哉？此公之深意，又当遇之于文辞之外者也。”遵王所谓文辞外之深意，自当直接得诸牧斋之口。有学集诗注贰秋槐支集“闽中徐存永陈开仲乱后过访，各有诗见赠，次韵奉答”四首之四，“沁雪”注，及“夏日宴新乐小侯”诗题下“新乐”注，遵王皆引本事及时人之文以释之。同书肆绛云余烬集“哭稼轩留守相公诗”，“留守”注，述瞿式耜本末甚详。同卷“孟阳冢孙念修自松圆过访，口占送别二首。”第壹首“题诗”注，述牧斋访松圆故居，题诗屋壁事。第贰首“闻咏”下注云：“山庄旧有闻咏亭，取老杜诗罢闻吴咏之句。”检有学集壹捌“耦耕堂诗序”云：“天启初，孟阳归自泽潞，偕余栖拂水涧，泉活活循屋下，春

水怒生，悬流喷激。孟阳乐之，为亭以踞涧右，颜之曰闻咏。”遵王注可与此序相参证也。同书伍敬他老人集上“简侯研德兼示记原”诗，附笺语，详述侯峒曾本末及嘉定屠城事。岂因李成栋后又叛清降明，故不必为之讳耶？同卷“路易（长？）公安卿置酒包山官舍，即席有作”二首之一“怀羽翼”注，述路振飞事迹。同书陆秋槐别集“左宁南画像歌。为柳敬亭作”注中载左良玉本末甚详，并及柳敬亭事。同卷“丙申春就医秦淮，寓丁家水阁”三十绝句，其第壹玖首“四乳”注，述倪让倪岳父子本末。第贰壹首“紫淀”下载张文峙改名事。第贰捌首“史痴”“徐霖”注，言及两人之逸闻。同卷“读新修滕王阁诗文集，重题十首”第柒首“石函”注云：“彭幼朔九日登高，寄怀虞山太史诗，石函君已镌名久，有约龙沙共放歌。幼朔注曰，近有人发许旌阳石函记。虞山太史官地具载。其当在樵阳八百之列无疑。故落句及之。”检同书壹壹红豆二集“遵王赋胎仙阁看红豆花诗。吟叹之余，走笔属和”诗后附钱曾原诗，有“八百樵阳有名记”句，当即用此事。同书捌长干塔光集“大观太清楼二王法帖歌”中，“鲁公孝经”注云：“公云，乱后于燕京见鲁公所书孝经真迹，字画俨如麻姑仙坛记。御府之珍，流落人间，可胜惋惜。”或可补绛云楼题跋之遗。同书壹肆东涧诗集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其第壹叁首“壬午日鹅笼公有龙舟御席之宠”诗，注云：“鹅笼公谓阳羨也。”其第叁肆首“追忆庚辰冬半野堂文宴旧事”诗，“看场神鬼”注云：“公云，文宴时，有老姬见红袍乌帽三神坐绛云楼下。”（寅恪案，范锴华笑庵杂笔壹“黄梨洲先生批钱诗残本”条，载太冲批语云：“愚谓此殆火神邪？”可发一笑！又崇祯十三年庚辰冬河东君初访半野堂时，绛云楼尚未建造。遵王所传牧斋之语，初视之，疑指后来改建绛云楼之处而言。细绎之，则如遵王有意或无意牵混牧斋殁子寿耆之言，增入“绛云”二字，非牧斋原语所应有也。以增入此二字之故，梨洲遂有“火神”之说，可谓一误再误矣。详见第伍章论东山酬和集河东君“春日我闻室作呈牧翁”诗节。）诸如此类，皆是其例。但在全部注本之中，究不以注释当日本事为通则也。至遵王初学集诗注壹捌东山诗集壹“有美一百韵，晦日鸳湖舟中作”诗“疏影词”注，引河东君金明池“咏寒柳”词及何士龙疏影“咏梅上牧翁”词，并载陆敕先之语。则疑是陆氏所主张，实非出自遵王本意。其他有关年月地理人物，即使不涉及时禁，或河东君者，仍多不加注释。质此之故，寅恪释证钱柳之诗，于时地人三者考之较详，盖所以补遵王原注之缺也。但今上距钱柳作诗时已三百年，典籍多已禁毁亡佚，虽欲详究，恐终多譌脱。若又不及今日为之，则后来之难，或有更甚于今日者，此寅恪所以明知此类著作之不能完善，而不得不仍勉力为之也。至于解释古典故实，自以不能考知辞句之出处为难，何况其作者又博雅如钱柳者乎？今观遵王所注两集，牧斋所用僻奥故实，遵王或未著明，或虽加注释，复不免舛误，或不切当。据王应奎海虞诗苑肆所载钱文学曾小传略云：

曾字遵王，牧翁宗伯之族曾孙也。宗伯器之，授以诗法。君为宗伯诗注，庾词隐语悉发其覆，梵书道笈必溯其源，非亲炙而得其传者不能。

及同书伍所载陆文学贻典小传云：

贻典字敕先，号觊庵。自小笃志坟典，师〔钱〕东涧〔谦益〕，而友〔冯〕钝吟〔班〕，学问最

有原本。钱曾笺注东涧诗，僻事奥句，君搜访伙助为多。

夫遵王敕先皆牧斋门人，而注中未能考知牧斋之僻事奥句，即有所解释，仍不免于错误或切者，殆非“智过其师，乃堪传授”之人，此点可姑不置论。但两人与牧斋晚年往来密切，东涧诗中时地人之本事，自应略加注明，而遵王之注多未涉及者，则由于遵王之无识，敕先不任其咎也。又观有学集叁玖“复遵王书〔论已所作诗〕”云：

居恒妄想，愿得一明眼人，为我代下注脚。发皇心曲，以俟百世。今不意近得之于足下。

然则牧斋所厚望于遵王者甚厚。今观遵王之注，则殊有负牧斋矣。抑更有可论者，解释古典故实，自当引用最初出处，然最初出处，实不足以尽之，更须引其他非最初，而有关者以补足之，始能通解作者遣辞用意之妙。如李壁王荆公诗注贰柒“张侍郎示东府新居诗，因而和酬”二首之一“功谢萧规惭汉第，恩从隗始诧燕台”之句下引蔡絛西清诗话（参郭绍虞校辑宋诗话辑佚上。）云：

熙宁初，张揅以二府初成，作诗贺荆公。公和之，以示陆农师〔佃〕，农师曰，“萧规曹随”，“高帝论功”，皆摭故实，而“请从隗始”，初无“恩”字。荆公笑曰，子善问也。韩退之斗鸡联句，“感恩从隗始”。若无据，岂当对“功”字也。

寅恪案，王介甫此言可以见注释诗中古典，得其正确出处之难。然史记汉书及昌黎集，皆属古籍，虽出处有先后，犹不难寻检得之。若钱柳因缘诗，则不仅有远近出处之古典故实，更有两人前后诗章之出处。若不能探河穷源，剥蕉至心，层次不紊，脉络贯注，则两人酬和诸作，其辞锋针对，思旨印证之微妙，绝难通解也。试举一例以明之，如东山酬和集壹河东君次韵答牧翁冬日泛舟诗中“莫为卢家怨银汉，年年河水向东流”之句，与最初出处之玉台新咏“歌词”二首之二“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卢家兰室桂为梁”，“头上金钗十二行”，“平头挈子擎履箱”，“恨不嫁与东家王”等句及第贰出处之李义山诗集上“代〔卢家堂内〕应”云：

本来银汉是红墙。隔得卢家白玉堂。谁与王昌报消息，尽知三十六鸳鸯。

有关，固不待言。其实亦与东山酬和集壹牧翁“次韵答柳如是过访山堂赠诗”：“但似王昌消息好，履箱擎了便相从”有关。尤更与牧翁未见河东君之前，即初学集壹陆丙舍诗集“〔崇祯十三年春间〕观美人手迹，戏题绝句七首”其三云：

兰室桂为梁。蚕书学采桑。几番云母纸，都惹郁金香。（原注云：金壶记“蚕书，秋胡妻玩蚕而作。”）
河中之水歌“十四采桑南陌头。”）

及同书壹柒移居诗集永遇乐词“〔崇祯十三年〕八月十六夜有感”云：

银汉红墙，浮云隔断，玉箫吹裂。白玉堂前，鸳鸯六六，谁与王昌说。今宵二八，清辉香雾，还忆破瓜时节。（寅恪案，牧斋“观美人手迹”七首之五云：“笺纸劈桃花。银钩整复斜。却怜波磔好，破体不成瓜。”原注云：“李群玉诗，‘瓜字初分碧玉年’。”）剧堪怜，明镜青天，独照长门鬓发。

莫愁未老，嫦娥孤另，相向共嗟圆阙。长叹凭阑，低吟拥髻，暗与阴蛩切。单栖海燕，东流河水，十二金钗敲折。何日里，竝肩携手，双双拜月。

有密切关系。今之读者，若不循次披寻，得其脉络，则钱柳因缘之诗，必不能真尽通解矣。（寅恪检初学集壹柒移居诗集有“杂忆诗十首次韵”当赋成于崇祯十三年庚辰五月间。

不知为何人而作。岂为杨宛叔而作耶？抑或与河东君有关耶？姑识此疑，以俟详考。）
职是之由，此书释证钱柳之诗，止限于详考本事。至于通常故实，则不加注解，即或遵王之注有所未备，如无大关系，则亦不补充，以免繁赘。但间有为解说便利之故，不得不于通常出处，稍事征引，亦必力求简略。总而言之，详其所应详，略其所当略，斯为寅恪释证钱柳因缘诗之范围及义例也。

复次，沈偶僧雄江丹崖尚质编辑之古今词话，“词话”类下云：

沈雄曰，花信楼头风暗吹。红栏桥外雨如丝。一枝憔悴无人见，肯与人间绾别离。离别经春又隔年。摇青漾碧有谁怜。春来羞共东风语，背却桃花独自眠。此钱宗伯牧斋竹枝词也。（寅恪案，此二诗乃初学集壹壹桑林诗集“柳枝十首”之第壹第贰两首。作“竹枝词”，误。牧斋此诗乃崇祯十年丁丑初夏被逮北行途中所作。）宗伯以大手笔，不趋佻儻，（寅恪案，“儻”疑当作“险”。）而饶蕴藉，以崇诗古文之格。其永遇乐三四阙，偶一游戏为之。

又袁朴村景恪所编松陵诗征肆沈雄小传略云：

周勒山云，偶僧覃思著述，所辑诗余笺体，足为词学指南。其自著绮语，亦超迈不群。

朴村云，偶僧从虞山钱牧斋游，诗词俱有宗法。

寅恪案，沈氏为牧斋弟子，故古今词话中屡引牧斋之说。袁氏谓偶僧所著诗词受牧斋影响。诗固牧斋所擅长，词则非所措意。偶僧于其书中已明言之。（并可参古今词话“词品”上“钱谦益曰，张南湖少从王西楼刻意填词”条。）若如朴村之说，沈氏之词亦与师门有关，则当非受之师父，而是从师母处传得衣钵耳。盖河东君所作诗余之传于今者，明胜于牧斋之永遇乐诸阙，即可为例证。不仅诗余，河东君之书法，复非牧斋所能及。悦取钱柳以方赵管，则牧斋殊有愧子昂矣。偶僧诗词仅见选本，未敢详论。但观王兰泉昉国朝词综壹肆所录偶僧词二首，则周袁二氏之语，颇为可信。寅恪别有所注意者，即兰泉所选偶僧词，浣溪沙“梨花”云：

压帽花开香雪痕。一林轻素隔重门。抛残歌舞种愁根。 遥夜微茫凝月影，浑身清浅剩梅魂。
溶溶院落共黄昏。

又云：

静掩梨花深院门。养成闲恨费重昏。今宵又整昨宵魂。 理梦天涯凭角枕，卸头时候覆深樽。
正添香处忆温存。

沈氏之词有何所指，自不能确言。然细绎语意，殊与河东君身世人品约略符合，令人不能无疑。东山酬和集壹牧翁所作“寒夕文宴，再叠前韵。是日我闻室落成，延河东君居之”诗（自注：“涂月二日”）结语云：

今夕梅魂共谁语，任他疏影蘸寒流。（自注：“河东君寒柳词云，约箇梅魂，与伊深怜低语。”）

若取偶僧之词与牧翁之诗综合观之，其间关锁贯通之处，大可玩味，恐非偶然也。至关于河东君诗余之问题，俟后论之。兹附言及此，不敢辞傅会穿凿之讥者，欲为钱柳因缘添一公案，兼以博通人之一笑也。

西瓯族源初探

梁 钊 韬

一

西瓯族源，向无定论。我曾根据一些文献资料，就东西两字对举，怀疑它与东瓯有关，但千里迢迢，陆上山河阻隔，沿海大浪滔滔，若把两地勉强牵合，实难设想。一九七四年，华南师院张寿祺同志持一外文杂志示我，谓太平洋诸群岛民族使用双身独木舟的航海技术受我国东南沿海的影响，因而使我联想到以前的疑问或有可能解决，但从何进入西江以抵郁林郡，仍无证可据。一九七七年春，我到南宁，参观广西博物馆于一九七六年在贵县罗泊湾发掘西汉初期大型木椁墓的出土文物，看到其中一面铜鼓，发现鼓身上有双身船纹，形式与太平洋上者极为相似，因而将以上各方面资料加以整理研究，草成此文，旨在论述我国东南沿海诸岛屿民族与西瓯的族源关系，并涉及它对太平洋诸群岛民族、文化的影响。

忆三十八年前读人类学家佛累则^①及柯灵顿^②的著作，大致谓太平洋诸群岛民族，在文化起源上与西太平洋海岸民族有关，其中如在巫术宗教起源上有共同的观念。今得铜鼓双身船纹的发现，再忆对其说，更感非无理由。

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重申百家争鸣，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方针，举国欢腾。本文深愿遵此精神，抛砖引玉，希同志们批评指正。

二

西瓯，秦属桂林郡，汉元鼎六年改称郁林郡，领县十二，首县为布山^③，亦即为郁林郡治所在，今贵县之南^④。

贵县地方为一广阔平原，土地肥沃，物产富庶，扼桂江、西江、郁江汇流的要冲，东北可通荆湘、汉水以达中原；西南可经郁江、红水河、北盘江接金沙江抵四川巴县，再沿嘉陵江北上以达陕西；东南顺西江而下，到珠江口，出海与闽、浙、苏、鲁各省及沿海诸岛屿包括台湾省相通；地理位置至为重要。

贵县地方，古代居住着“百越”的一支——骆越族，从史笈记载来说，至秦始出现西

瓯^⑤，秦汉之际，骆越与西瓯还往往并称^⑥，到东汉则渐明确南越之西为西瓯^⑦，其后如《太平寰宇记》则明白指出：“郁林郡为西瓯”。晋人郭璞注《山海经》说：“瓯在闽海中，郁林郡为西瓯”，他指出东瓯越人有一部分散布在闽海中，并与郁林郡的西瓯相对并举。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为什么西瓯始见于秦？闽海中的瓯与西瓯有无关系？从这两个问题开始，探讨西瓯的来源。本文先从春秋战国之际谈起。

三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周显王十四年（公元前355年），楚灭越，“而越以此散，诸王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朝服于楚”。这恰好与郭璞说闽海中的瓯相互印证。

越国亡后，诸“王”或“君”强迫他们的农奴及老百姓散居于东南沿海诸岛屿，其中一部分很有可能从闽海更南下，入珠江口，溯西江而迁至平原沃野的贵县地方居住下来，并与当地骆越人杂处。越国是春秋晚期争霸中原的先进国家，所谓先进，首先是生产力的先进。所以，来到这里的有着先进耕种技术的农奴及其他劳动人民带来了先进的铁器生产工具，并与骆越人杂处，共同劳动，促进了贵县地方生产力的发展。迁来的越国贵族，不论是君或是王，却照样奴役人民，世袭封建领主的统治地位，形成许多封建“君长”统治的族落；这时各君长的势力还没有统一而互相攻击，其中有个叫做译吁宋的^⑧，可能是最强大的一个君长，称为西瓯君。西瓯一名应始于此。

从公元前三五五年越国之亡，至公元前二一四年秦统一岭南，其间经过一百四十一年。贵县地方的骆越与西瓯长期杂处，在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下，生产力当然有所提高，骆越与西瓯的民族融合又必然有所发展。同时，在这一百四十一年期间，吴起^⑨在楚国辅助悼王，曾发兵“南平百越”，把一批楚国贵族、罪人驱逐到岭南地区，因而民族关系除了骆、瓯之外，还有楚人，其中当然还有中原人。所以，楚国文化对岭南地区又有了进一步的影响，各族人民的关系亦产生了较深刻的变化。建国以来，两广地区，特别是贵县至广州的西江两岸所发现的战国墓葬，出土文物大部分与楚国及中原形制相同，说明当时农业和手工业都比以前有较大的发展。

秦统一岭南的战役中，其中有一路军队由尉屠睢率领^⑩，他们从漓江顺流而下，在到达梧州西进至贵县的一段进军水程，处于逆水状态，又遇到西瓯的抵抗，使秦兵大败，屠睢也被杀死。西瓯在对秦兵作战中，促成了译吁宋的统领地位，因而在文献中突出记载了他的名字。这场战役，说明当时西瓯在经济上和作战组织能力上都已相当强大。西瓯之所以强大，不是偶然，而是因为他们来自先进的越国，又经一百多年来受楚国和中原文化的不断影响和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原故。

迨秦以后，经赵佗在南越推行郡县制，在经济、政治及民族融合各方面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当时贵县地方至西江两岸，是南越最先进的地方，在这一地方，自秦以来逐

渐形成的广州方言区，便是各族人民民族融合混血的历史证据。

事实上，西瓯“君长”势力为秦所灭，统一了岭南之后，西瓯在历史上便逐渐消失，郭璞注《山海经》和宋人乐史写的《太平寰宇记》所记载的西瓯，只是追述秦汉之间的往事，东汉以后，在贵县地方逐渐出现了“乌浒”等族称，事见《后汉书·南蛮传》记载灵帝建宁三年，郁林太守谷永的事迹。当时的乌浒被称为“蛮”，可能是当时居深谷间，经济较为落后的原先骆越之民。这时的乌浒人，也许不全然是骆越，还有其他的民族成分，此当别论。

东瓯越人的一部分之所以浮海迁徙到贵县地方，似亦非偶然，因为在其前，沿海至贵县地方的交通已有了先行者，这些先行者不是别人，就是同东瓯人非常接近的民族“倭人”。

四

《论衡·儒增篇》说：“越裳献白雉，倭人贡鬯草”。这里所说的倭人，许慎《说文》指出：“郁鬯，百草之华，远方郁人所贡芳草，合酿之以降神。郁，即今郁林郡也。”可见汉代郁林郡有倭人，称为郁人。然则郁林郡的倭人又从那里来呢？

《汉书·地理志》说：“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如淳说：“如墨委面，在带方东南万里。”这里所说的“如墨委面”即纹面，“带方东南万里”是指朝鲜南部、黄海沿岸至东南沿海诸岛“万里”的地方。《后汉书·东夷传》又说：“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其大较者在会稽东冶之东，与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这里更明白指出倭人的分布，起自韩东南大海、浙江会稽（温州）之东，南至朱崖、儋耳（均在海南岛），其风俗大致相同（纹面是其中之一）。所以，汉代所指的倭人分布区域，单就我国境内来说，就包括了北自山东南至广东沿海诸岛屿。住在这个区域的民族，就是古代的东夷和“百越”。

东夷包括了莱夷和山东大汶口新石器时代的拔齿人^①，即古史中的“蚺齿”^②，他们同台湾新石器时代的拔齿人似有族属关系。沿海“百越”，大致包括江苏的大越、浙江的瓯越、福建的闽越、两广的南越。至于闽、粤沿海的蜑人，据《隋书·列传》四十七说：蜑（即蜒）是古代百越之一，其俗亦断发纹身。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所以越族还包括了蜑。蜑与但或旦相通，大概水上称蜑，陆上称但^③，《淮南子·说林训》说：“使但吹竽，使氏厌穹，虽中节而不可听。”可见西汉时人已知有但人。蜑，不仅福建、广东、广西沿海均有，并且，广西三江及黔南的内陆地区近代还有所谓但人。无论东夷与百越，都有纹身习俗，这同古人因其“法俗多同”而总称为倭人的涵义是相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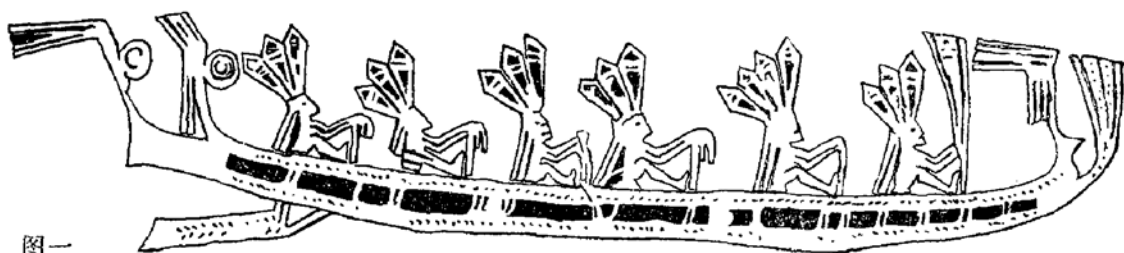
由此可见，郁林郡的倭人大概包括了以上这些沿海民族，他们在新石器时代便沿我国海岸向南迁徙，经台湾南下广东入珠江而到贵县。当然，有些在迁徙途中入长江而到江汉，再溯江至巴县，这又当别论。

关于闽海中的瓯，溯西江而迁至贵县地方，除上述的资料外，还有什么根据呢？人们用什么航海工具进行迁徙呢？下面着重谈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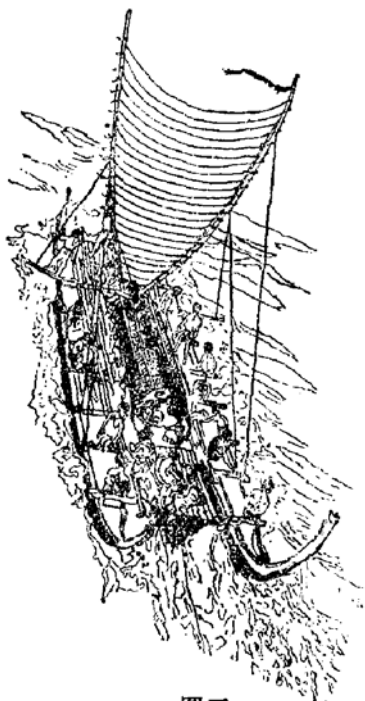
五

贵县罗泊湾出土铜鼓的双身船纹，同太平洋上航行的双身船比较，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罗泊湾的双身船纹，首尾翘起二道，船身表现有十余条宽狭不等的斜行线，乍看起来似乎是船旁装饰，实则是两条船并排，用一些横木将两条船联起来成为双船结构（附图一），具有中国传统的散点透视绘画表现手法，船上的人和船首尾采用侧视的画法，船



身采用俯视的画法，画面已图案化，但仍有透视感。在同一鼓身上的另一种船纹，首尾只翘起一道，显然是单独的船，两者截然不同，即一种是双身船，另一种是单身船。云南晋宁与广南铜鼓的船纹^④，首尾均翘起一道，也显然是单身船结构。广西西林普驮出土的西汉早期铜鼓的船纹^⑤亦为单身船，船首翘起饰以怪鸟；至于船上设有棚台，上坐一



图二

羽人，则与晋宁、广南的相同，为罗泊湾的所没有。三处出土铜鼓的年代，下限都是西汉早期，上限可能罗泊湾的较早。再就船纹比较，罗泊湾的没有棚台，船头的鸟首亦较为古朴。晋宁、广南的船首都类乎鸕首^⑥，看来不仅比较进步，而且说明双身船不可能从云南而来。

双身船是古代沿海岛屿民族在大海大江航行的交通工具。这种双身船，是现代太平洋印度尼西亚、美兰尼西亚、玻里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诸群岛，以汤加、萨摩亚岛为中心，南至新西兰，北至夏威夷的土人用来航行于各岛屿之间的重要交通工具（附图二），原始为独木舟，故称为Double canoes，即“双独木舟”，但实际上，经过数千年的发展，现代所用的已不完全用独木造成，大多数已是复合结构的船。它

们的形式和构造不一样，有些首尾翘起，一端饰以水神，有的饰以象我国流行于西汉至南北朝的鸱首；有的是小型的单独木舟，略保留原始的形状。按它们的构造形式和船首装饰，看来代表着不同时代的形式。

近年来，国外有些民族学者，对这些岛屿的民族进行研究，发表了一些论文^⑤，他们认为二万五千年前，最后一次冰期还未结束，太平洋水位降低的时候，黑肤色人已居住在美兰尼西亚诸岛，后来冰期结束，太平洋水位升高，各岛被海水隔离开来，大约四千五百年前（按即相当于我国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晚期）棕肤色人从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到达汤加群岛。调查者于一九六三年，在汤加群岛发现了从台湾、菲律宾迁去的人留下来的碎陶片，近来又在萨摩亚和玻里尼西亚发现同样的遗物，经过C-14测定，它们的年代为公元前一千一百四十年（按相当于我国殷周之际）。调查者根据玻里尼西亚人的传说，叙述古时有个名叫Ru的水手，得到一个水神的传授，学会了观察风、浪、星、和鸟的航海技术，因而发现了许多新岛屿，迄今夏威夷人仍崇拜这个水神为最大的神，这个水神的名字叫做Tangaroa。此外，玻里尼西亚人迄今仍残留有纹身的风俗，还使用我国古代东南沿海的有段石锛或铁制的同型工具来制作木器。

按台湾省新石器时代文化，具有山东大汶口文化“拔牙人”的特点，也具有浙、闽、粤有段石锛的特点。台湾新石器时代文化是我国东南沿海同期文化的组成部分，原始居民亦系“断发纹身”。近来外国民族学调查者认为，四千多年前太平洋诸岛的民族和文化来自台湾，我认为是符合实际的。三十年前我看到的外国有关印度尼西亚双身船的材料，形式与最近所见到的太平洋上双身船资料及贵县铜鼓上的双船纹的形式极为相似（附图三），但当时这个作者认为来自波斯湾^⑥，显然是错误的。



对于这些近年来的新调查材料，大致上可得到这样的理解：我国鲁、苏、闽、粤沿海地区包括台湾省，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便有沿海居民向南迁徙，其中包括山东的拔牙人及其他百越诸族，陆续向南方迁移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及汤加群岛，再而散布到太平洋诸群岛。什么原因引起这些民族迁移？这和我古代所发生的重大政治变动有关。好比，中原地区原始社会瓦解时期，东夷地区曾发生过战争，如《淮南子·本经训》说：“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势必引起凿齿人的逃亡，逃到海岛上。尧的时候，

正是原始社会解体，阶级社会正在形成中，那就是军事民主制时期，这时，对比较落后的部落，是要俘虏来当奴隶的，战败者只好逃跑。此后，商周之际、越国之灭亡、南越被秦汉统一、东晋南北朝国内民族的大迁移，都是国内或沿海地区的重大政治变动，因而引起沿海的一些经战争失败的部落、被压迫的奴隶、农民乃至贵族等等逃亡出海，散居于岛屿，并继续向南迁徙，这是很有可能的。这同上述国外学者所测定的考古年代，以及双身船装饰艺术所代表的时代，大致上相符。

至于 Tangaroa 的读音，则与广州方言的“𩇛家佬”极为相近，二者的发音仅是 l 与 r 之差，从另一些材料中，可以证明它不是偶然的对音，今天居住于东萨摩亚的波里尼西亚人的语言，有些词句与广州方言相接近，例如，东萨摩亚人称“杯”为 ipu，与广州话“一杯”相近；称“埋葬死人”为 masi，与广州话“埋尸”相近^{②③} 等等。因此，这个“𩇛家佬”水神，应是指闽、粤沿海的越族𩇛人。广州方言，在秦汉以后逐步形成，双身船的鸂首又为西汉至南北朝的艺术形式，因此，以“𩇛家佬”神为代表的古代沿海的𩇛民迁移到太平洋诸群岛的年代，可能在西汉至南北朝期间，他们的航海工具便是双身船。

总的来说，我国从原始社会晚期历经商周之际、秦汉、南北朝等各个时期，东南沿海都有一部分东夷和百越先民，先后移殖到太平洋诸群岛，并把我国航海技术传播到这些岛屿的人民，帮助他们发现许多新岛屿，这是我们的祖先对世界的贡献之一，也是我国与太平洋诸群岛民族友好关系的历史篇章。

六

我国古代东南沿海岛屿的人民，既能航行于太平洋，当亦可溯西江而迁徙至郁林郡。以上关于郁林郡之所以有倭人，以及西瓯来源于散布在闽海中的东瓯等问题的论述，也许可以成为西瓯族源的初步探索。但其中用以说明的材料，关键在于贵县出土铜鼓的双身船纹的发现。

罗泊湾双身船纹铜鼓，还铸有见于我国历史文献的翔鹭纹和羽人纹饰^{②④} 以及其他属于我国民族传统的艺术花纹，并无西方的味道，说明流传我国古代南方的铜鼓，起源于接近中原地区，并曾称霸中原的越国；双身船亦当发源于此。此后，双身船进入了内地，便演变为流行于江南的龙舟。

广州汉墓出土的木船和陶船模型，与双身船不同，皇帝岗西汉木椁墓出土的木船和沙河区东汉墓出土的陶船^{②⑤}，无论船身和船上的房屋和人物均无南方越族的特点，应属于中原文化的特点。罗泊湾铜鼓为古代越人铜鼓，上有双身船纹，证明这种船是存在的，且当为我国古代越人所使用，广州还未发现此种文物，不等于今后不可能发现。

东晋名画家顾恺之所绘的《洛神赋图》^{②⑥} 是双身船，但船上的楼阁和仕女都是中原的形式和形像，船身也变得中原化了，可是我们从这幅画可以看出，沿海双身船进入内地江河之后，除了拆开单独变为龙舟，还因它能载重和航行稳定，因而演变为双舟楼船，

这是中原文化与沿海越族文化融合的表现。今天我们还没有从地下出土过晋代这样的双船实物，可是不等于晋代没有，顾恺之便给后世绘下了证据。

古代远距离民族迁徙，似乎难以理解，但有民族学、考古学和文献资料可据，亦有理由使我们相信。例如，“拔齿人”既见于西汉以前的历史传说，又有山东和台湾考古发现，自晋到清的文献^②，又有“拔齿人”分布在我国西南各省的记载，近代民族学调查报告，“打牙”仡佬族仍然存在于西南各省，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语言亦多变化。他们历数千年之久，迁徙的足迹隐然可见，若非文献、考古、民族学相结合，必不能使人相信这些材料在历史研究上有任何联系。更不能想像我国南北东西数千里，古来各族人民就有这样的来往和密切的关系。

西瓯族源，已作一初步探索，其民族成份亦至为复杂，它包含了古代骆越人，东瓯越人，复杂的倭人，楚人和中原人等等。数千年来，贵县附近一带地方，由于生产和社会不断发展，中原及各族文化互相影响，民族之间互相通婚混血，大部分已融合而成为今天说广州方言的汉族，正如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这一光辉著作中指出的：“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从西瓯族的形成和发展，便足见我国历史上各族人民融合的一斑。

① J. G. Frazer: The Golden Bough: The Magic Art and the Evolution of Kings. 2 vols. 3rd ed. 1935, New York.

② R. H. Codrington: The Melanesians, Studies in their Anthropology and folklore. 1891, Oxford.

③ 《汉书·地理志》。

④ 《清一统志》，清光绪《贵县志》。

⑤ 梁顾野王：《舆地志》：“交趾，周时为骆越，秦时为西瓯。”

⑥ 《史记·南越尉佗列传》：“其西瓯裸貉国亦称王。”

⑦ 《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有西瓯，其众半羸，南面称王”。

⑧⑩《淮南子·人间训》。

⑨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⑪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一九七四年，北京文物出版社。

⑫ 《淮南子·本经训》。

⑬ 刘锡藩：《岭表纪蛮》。

⑭ 冯汉骥：《云南晋宁出土铜鼓研究》，《文物》，一九七四年，第一期。

⑮ 洪声：《广西铜鼓研究》图一二，《考古学报》，一九七四年，第一期。

⑯ 《汉书·司马相如传·子虚赋》，注引张揖说：“鹄，水鸟也，画其象于船首。”《淮南子·本经训》：“龙舟鹄首”，注：“鹄，大鸟也，画其象著船头，故曰鹄首也。”

⑰ Kenneth P. Emory, Ph. D.: The Coming of the Polynessians; David Lewis: Wind, Wave, Star, and Bird; Herb Kawainui: The Pathfinders. National Geographic, Vol. 146, No. 6; December 1974.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Washington, D. C.

⑱ H. S. Gladwin: Men Out of Asia, Chap XXII Of Men and Ships and Great Waters. 1947, New York, London.

⑲ J. A. C Gray: Amerika Samoa: Note on the Samoan Language and Glossary. 1972, U.S. Naval Institute Annapolis, Maryland.

⑳ 《诗经·鲁颂·有苾》；《诗经·商颂·那》；《诗经·鲁颂·閟宫》；《史记·夏本纪》。

㉑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图版柒玖、捌拾，文物出版社版。

㉒ 宋人摹顾恺之：《洛神赋图》，见唐兰：《试论顾恺之的绘画》，《文物》，一九六一年，第六期。

㉓ 晋张华：《博物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清陆次云：《峒谿纤志》。

谈西汉软体尸保存问题

——从马王堆到凤凰山

商承祚

一九七二年长沙马王堆轂侯利苍妻墓发掘出的尸体保存得很完整，原因何在？其说不一。普遍的解释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基本是在密封、缺氧、深埋”^①。其实，密封必然缺氧，缺氧因为密封，是一回事。尽管原理是这样，但我的看法仍然与他们有点出入，而认为是严埋、密封、防腐（棺液）三者，其中防腐占主要地位。

一九七五年上半年，湖北省江陵县楚故都纪南城又发掘了凤凰山一六八号西汉文帝十三年墓葬，其中不仅有五百多件历史文物，还有保存得更为完好的软体男尸一具，棺内亦有大量液体，与马王堆女尸棺内液体颜色大致相同，再一次证明软体尸成果的取得，是与这种紫红色的棺液——防腐剂分不开的。

解放前后，在长沙出土密封得很好的木椁墓，其中俗称“火洞子”（打穿白膏泥层时有可燃气体喷出）的有若干座，但从未闻盗墓人谈过有软体尸这回事。自马王堆、凤凰山的软体尸与棺液伴随而出后，才知道如果没有这种水，软体尸就保存不下来。尸体保存完好的原因，我认为是：防腐剂保证了尸体在棺内不腐的条件；严埋、密封保证了棺椁与外界环境隔绝的条件，内外配合，才能取得这样惊人的效果。

有些同志不同意马王堆一号墓的棺液是有目的注入的防腐剂，而强调是后来渗入的水。他们认为棺内尸体腐化先出现“尸解水”，由于其浓度较大，就和某些固体物质发生潮解一样，棺内潮湿的水蒸气（气相分子）经两千年以上时间的积聚，才达到现在八十公斤的总量。而椁内的水蒸气则是由白膏泥吸收了外界土壤的水分后，又被木炭吸收，并不断蒸发渗入棺内，造成了当前这种情况。我认为这种解说是自相矛盾的。既然承认外界水源不断地进入椁室而后渗入棺内，那么，白膏泥和木炭层起的是吸收水气后把它输送到椁室，而不是与之相反，起隔潮的防护作用，则所谓“密封”，岂不成了空话！再说，漏水必漏气，反过来，漏气必漏水，为不易之理。既然水蒸气可以持续不断地渗入

棺内，有无“缺氧”的可能？如其是这样，则最后剩下来的只有“深埋”了。单凭这一项，是肯定不能保存软体尸的。

女尸在解剖前尚有三四点三公斤重，可见腐化时产生的“尸解水”不多。若棺内原是干燥，这少量尸解水早被包裹的衣物吸尽，因知潮解数量有限，比如一斤盐总不至潮解达四、五斤，更不可能无限度地吸附水分，到达一定饱和程度，潮解就会中止。

在封棺后一段时间里，尸体腐化过程尚未能完全抑制细菌活动和继续产生腐败气体时，温度会随时升高，棺内温度和压力也会比椁室为大。如果棺有孔隙，在水的气相分子不断运动时，那只有棺内的水蒸气往外逼出，绝不可能在温度较低、压力较小的椁室向棺内渗入，这原理是大家知道的。

我认为棺内的液体并不是从少到多，反过来是从多到少，用棺内的晶状物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开棺时，有许多大小白色颗粒类似白矾的透明结晶体附着在包裹物上，凤凰山男尸棺中也是这样。结晶体的形成，必须经过蒸发后，溶液的水分减少而浓度增加到一定程度时才有可能。因为结晶与潮解是互相矛盾的，是不能同时产生的。

“渗透论”又认为椁室的湿度很大，所以才造成水蒸气渗入棺内的有利条件；并据护椁的木炭经过干燥后失重达百分之三十八来作为水源所自。可是他们忘记在发掘此墓时正当长沙多雨季节，在揭开墓椁前后曾下过几场雨，即使木炭不直接受水的影响，也会受潮湿空气的影响，这就不能从雨后木炭的含水量来确定墓室的湿度。

由棺木的选料、构造开始，以至层层髹漆一系列的工序，都达到很高质量。从内棺具有高度密封性来看，乃谓八十公斤的水量为水气所渗入，是没什么根据的。试问：水气既然可以渗入，当然可以逼出，如果水气经过两千多年陆续出入和互相调换，既不会有颜色，更不会有浓度的臭味，可是今适得其反。密封可以防水防气的相互出入棺室，倘得不到保证，软体尸当从何而来？

此墓发掘后不久，医学工作者曾用现代防腐剂 and 棺内液作对比试验，两者的杀菌强弱能力简直没法相比，于是断言：棺椁“密封”是主要的。液体为酸性，有轻度的抑菌作用，但不能起关键性作用。直至目前，仍有人坚持这种看法，且有相当影响。在当日作一种试验是有必要的，问题在所作的结论，未必符合古代的实际。其理由是：药剂效力与新鲜程度和是否参有杂质等因素都有关系。棺液是二千年前制剂且经过使用，已成为失效的废液，怎能用这试验的结果来推断原剂的杀菌功能就是这样的呢？！

不承认棺液是防腐剂的同志还提出几个矛盾问题，作为他们的又一理由，即使用防腐剂与同时使用吸水剂——木炭的矛盾；使用防腐剂与浸泡华丽的包裹物的矛盾；防腐剂的使用与缺乏文献记载的矛盾。这些问题我认为并不难作答。

首先，此墓的木炭是用于椁的外围，与白膏泥同起遏制椁外的潮气使其不能钻进椁内的作用，而不是用来吸收椁内的水分的。棺内防腐，椁外遏潮，互相配合，只有对条件有利，并无排斥的矛盾。其次，尸体用华丽精美的衣着等物包裹，似不宜把她浸泡在水里的。要知道这种厚葬原出自封建迷信，与随葬品一样，供死者带往阴间享

用，是从封建迷信观念出发，他们认为衣着与尸体可以同等防腐，又有什么矛盾呢？至于古代使用防腐剂并非未见于文献记载^②。作为科学、文化、考古、艺术工作者，就是要根据出土文物来补充、纠正文献之不足，这样的事例，目前不断出现。

根据以上分析，马王堆一号墓的棺液不是从外部渗入的水气，而是当日特制的一种防腐剂，殆可断言。

凤凰山一六八号墓的发现，又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注意的新问题。该墓埋得并不深，不到十米，不及马王堆女墓深度的一半，但因有高质量的夯土层，就与那未经破坏的深埋墓起同等护椁作用，可统称之为“严埋”。此墓椁室有积水，深达七六厘米，这些水，我认为是在当年五月入葬时遇雨积存下来，而不是葬后渗入的，所以清而不浊。木椁拼结不严密，以至某些部位有一指宽的空当，幸有两层填土，上层为五米多的青灰泥，下层为五花土。凡填至十厘米左右就夯实一次，把墓坑严密封闭，在夯土层中，发现树叶、竹根、竹筒，保存得良好如新。可见严埋能使空气隔绝达到这样的程度，可与马王堆一号墓相媲美。尸体不仅软组织富有弹性，而且四肢大小关节都可弯屈，内脏未腐，其它部位也良好，这些都非女尸所能及。棺液约一百公斤，颜色与气味与女尸棺液相类似。两液的成分，马王堆属酸性，凤凰山属硷性。男尸全身无毛发，面部和四肢呈绛红色，间有绿色，这种迹象，可能从硷性防腐剂反映出来的。据参加开棺工作的同志说，用手接触棺液时，皮肤有麻辣感，将棺液倒在草地上，几小时后草就枯黄了。可见这种硷性液体至今仍保持着强烈的杀伤力，在当日新制成的力量，可想而知。

我国在战国时代，在医药应用方面已逐步发展起来。到了汉初，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华佗已能采用含有麻醉成分的草药配制麻醉剂的“麻沸散”。因此，在其前发明高效率的防腐剂，非不可能。由于各种配方不同，有的效果良好，有的比较差，甚至完全失败，是符合科学研究情况的。凤凰山墓，是迄今发现防腐剂中效果相当好的一个配方。我们相信，此后仍会有软体尸发现。

解放后出土的战国墓中，有的尸体保存方面与一般遗骸的形状有所不同，可能使用过防腐剂而未获成功。今试举三例提供参考。

一、长沙左家公山战国木椁墓未进过水，即所谓“严埋”、“密封”墓，棺内骨架保存完整，还附有残余肌肉，面部特别多，因之面貌隐约可辨。身上用薄绸包裹，没有明显的衣服痕迹，头骨内大脑约保存三分之二，小脑将近全部，视感神经存在。^③

二、长沙杨家湾六号战国末期木椁墓是女墓，因白膏泥层出问题，椁内积水积泥。棺内满贮清水，遗骸为黑色糊状物所掩盖，骨架有小部分腐蚀，头骨内有残余小脑。^④

三、长沙子弹库出《帛书》那座战国木椁墓是座“火洞子”，曾于一九四二年被盗，一九七三年湖南博物馆重加清理，除遗留下来盗剩的文物以外，并发现一幅《人物御龙图》。棺内有大量积水与积泥，是三十年来进入的，但骨架保存完整，尸骨上有不少部位还有干缩的肌肉碎块附着。^⑤

左家公山的墓主尸体是用帛缠，不着衣服，连衾被也没有，与“绞衿”^⑥之制有同有

不同，为未载入丧仪的一种葬制，可补文献之不足。报道未提棺内有水，那就是干燥的了，可能用的是另一种防腐剂。

杨家湾墓满棺清水，骨架用帛缠不着衣服，与左家公山墓同。因当日从事此项工作的同志缺乏经验，对棺水不重视，把它弃去。肌肉腐化而水清无味，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从以上三墓骨架的情况来看，如光靠密封而不采用防腐剂，骨架的保存，特别是肌肉的附着，有无可能？

马王堆、凤凰山两墓所用的防腐剂主要是中草药制剂，加上既溶解了尸体包裹物上的杂质，又溶解了尸体本身的氨基酸，就使得液内成分十分复杂，要比较精确地分析化验出它的各种成分是困难的，但绝不能因此而否定棺液所起的作用。随着软体尸的再次发现，证实了防腐剂于古有之，是古代劳动人民和医学工作者留下来的宝贵资料，我们要不断而又耐心地采取各种方式方法化验它，相信总有一天能弄清楚防腐剂的有关情况。

我不是一个理化工作者和医学工作者，只能在事实面前提出这样的一种理论，当否？请同志们指正。

附 记

一九七七年五月，南京太平门外发掘出明徐达五世孙徐儒及其原配、续配共三个墓。徐儒棺外有椁，为浇浆墓，内外空气隔绝。棺椁内皆有清水，棺深于椁。棺水离盖约十余厘米，水有樟脑味而兼微臭，樟脑味棺比椁浓。尸体荐以芽灰及灯芯草。尸体完好。考徐达卒于洪武十八年（公元一三八五年），五十四岁，则徐儒当生活于嘉靖中业。从棺水来看，知明代有用香料作为防腐剂，樟脑为其中之一种，是否还有其它药物配入，不得而知。

-
- ① 《长沙马王堆汉墓女尸进行了解剖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马王堆汉墓女尸研究的几个问题》。《文物》一九七三年第七期。
 - ② 杨伯峻：《略谈我国史籍上关于尸体防腐的记载和马王堆一号汉墓墓主问题》。《文物》一九七二年第九期。
 - ③ 《长沙左家公山的战国木椁墓》。《文物参考资料》一九五四年第十二期。
 - ④ 《长沙杨家湾六号墓清理简报》。同上期。
 - ⑤ 《长沙子弹库战国木椁墓》。《文物》一九七四年第二期。
 - ⑥ 《礼记·丧大记》。

致 读 者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粉碎了“四人帮”的一年多来，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提出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克服“四人帮”造成的严重困难，我国各条战线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发生了深刻变化。被“四人帮”摧残得“万马齐喑”的理论学术战线，也开始出现了欣欣向荣的生动局面，有如千帆竞发，万木争春。

但是，对“四人帮”在理论学术战线留下的污泥浊水，对“四人帮”强加于理论工作者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对“四人帮”造成的理论思想方面的颠倒混乱，切切不可低估。如果说，列宁是几乎用他的毕生精力来打扫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马厩，那么，我们要消除“四人帮”留下的污泥浊水，要砸烂“四人帮”强加的精神枷锁，要彻底肃清“四人帮”在理论学术领域的流毒，也还是要做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原理，也是被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实践检验过的科学真理。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为篡党夺权而结成的“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对这一指导我们革命运动的革命理论怀着刻骨仇恨，他们利用已被篡夺的那部分权力，网罗种种党羽，通过种种渠道，采用种种手法，时时、处处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着干”，同他们的帮派体系相呼应，形成了一套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篡改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现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正在深入发展，在斗争中除了要进一步揭露“四人帮”破坏党的理论工作的滔天罪行，批判“四人帮”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的修正主义谬论，还要总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和阐述，进一步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威力，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克服由于“四人帮”的破坏而产生的轻视革命理论的错觉，发展和壮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宏大队伍，为胜利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完成党中央提出的新时期的总任务作出贡献。

《学术研究》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学术刊物，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宣告复刊的。为了使这个刊物能够适应上述形势和任务的要求，我们给自己提出下列的方针，作为编辑部的工作准则：

（一）坚持完整地、准确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一切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特别是“四人帮”，他们的拿手把戏，就是采用篡改、歪曲、

伪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打着极“左”的旗号，掩盖其极右的实质。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完整的思想体系来理解和掌握，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努力反映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研究成果。

（二）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是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无产阶级坚定的阶级政策，是繁荣社会主义科学和艺术的正确方针，刊物要在坚持六项政治标准的前提下，提倡学术问题上不同学派和不同观点的自由讨论，以促进社会主义学术的发展，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三）坚持批判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当前要着重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揭批“四人帮”，批判他们的修正主义谬论，揭露其假左真右的反动面目，把他们搅乱了的理论问题纠正过来，划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理论界限。

（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我们要提倡有的放矢，言之有物，实事求是的战斗风格，要反对“四人帮”的帮八股、帮风、帮气，要反对说空话，说废话，要反对主观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学风。

（五）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提倡批判地继承中国的和外国的文化遗产。

从编辑部的工作来说，在贯彻执行这一编辑方针的工作中，我们决心努力抓好百家争鸣这个环节。“四人帮”费尽心机把自己打扮成“理论权威”，又最善于接过革命的口号和方针，另搞一套，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反修的旗号搞修正主义，可他们就是不但不许宣传、连口头上也不敢提一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似乎有点奇怪。其实，说怪也不怪。因为他们既要靠两个工厂（“帽子工厂”和“钢铁工厂”）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自然不敢提双百方针，即使口头上讲一讲，也会有碍于他们搞的那一套“一家作主”、“老娘专政”，不利于他们篡党夺权。现在，我们已经打倒了“四人帮”，砸烂他们强加的精神枷锁，也就有可能认真贯彻执行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双百方针。我们在把《学术研究》办成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阵地的努力中，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把《学术研究》办成哲学社会科学界百家争鸣的园地。

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我们愿意同广大作者和读者一起，响应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学习、学习、再学习，团结、团结、再团结”的伟大号召，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这个伟大历史使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编者

学术研究

一九七八年第一期

五月廿日出版

编辑者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荔湾北路222号

出版者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刷者 广东新华印刷厂

发行者 广东省新华书店

定价：每册0.50元

本期刊逢单月廿日出版